

目 录

黄埔建军	覃异之 [1]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奇中 [20]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 [40]
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	覃异之 [54]
滇桂战争	黄绍竑 [57]
刘镇华的一生	米哲沅 [78]
徐树铮之死	吴锡祺 [107]
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	吴晋航 [111]
一九三六年成都事件	何北衡 [122]
虹桥事件的经过	董昆吾 [131]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 [134]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 [144]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154]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70]
-------------------	---------

附注

对《黄埔建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六八页

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一九页、第三十辑二四一页

黃埔建軍

覃異之

一、黃埔軍校的建立

黃埔軍校是按照苏联紅軍的建軍原則和作战經驗來訓練幹部的新型軍事學校。它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也是苏联援助中國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标志。

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經李大釗同志的介紹，在廣西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談的時候，馬林即曾向他提出了關於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的建議。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曾通過黨刊《向導周報》，對孫中山幻想利用軍閥力量、企圖從軍事投機中取得勝利的錯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軍隊，革命才能獲得成功。例如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向導周報》第九期載有“國民運動、革命和革命宣傳”一文，其中批評孫中山先生“只是時常依靠別的有力分子對他的感情為轉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還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夠反臉，明天或成仇敵”，並且指出“堅強的紅軍能夠組織成功，便因為有真正革命精神。……所以紅軍是一個真正革命的軍隊，無論何時，都能為保護社會革命的紅旗而死。”

由於共產國際的建議和中國共產黨的督促，同時也由於革命形勢的迫切需要，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即積

極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並决定利用黄埔島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設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

当时在广东的粵、滇、桂等系軍閥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揮，实际上他們各据防区，把持財政。他們对于軍校的筹建，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破坏。因此，关于创办军校所需的人力、財力和物力，孙中山先生一筹莫展。例如军校开办时，孙中山先生批發了三百支粵造毛瑟槍，但却只交涉到三十支，勉强給衛兵守衛。黄埔建军計劃确定之后，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面派了数十名优秀軍事幹部到军校担任教育工作，一面又无条件地撥給军校二百萬元現款作为开办費。各种軍械也是苏联无代价地从海參崴分批运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調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許多优秀黨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並参加軍事工作。孙中山先生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軍校的筹建工作才得以順利实现。

孙中山先生除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外，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潛，而以蔣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蔣介石当时無論在党在軍，都是后輩，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军校副校长，已經是“不次之迁”。但是蔣介石不願在程潛之下，对这个任命很不滿意，就离开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極。这时张靜江、戴季陶等出来替他撑腰，张还亲自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說情。孙中山先生这才改派蔣介石为粵軍总司令部參謀长兼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还仿照苏联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在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度，並派廖仲愷为党代表。这个制度規定，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須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經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

全无效。有了这种制度，党的主义和政策的貫徹就得到了保證，就使軍校真正成为培养革命幹部的工具，而不致变为軍閥官僚的工具。后来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一起推行到国民革命軍各級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軍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北伐軍获得輝煌胜利的根本保證。

黃埔軍校于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設政治、教練、教授三个部和軍需、管理、軍医三个处，另設政治总教官和軍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最初为戴季陶，后来戴离开广州，由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厚的官僚，他把政治部当作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幹部，同党代表廖仲愷也很少打交道，同苏联顧問也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就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官僚机构。因此，学校員生都一致提出撤換邵元冲的要求。这个問題經過廖仲愷、蔣介石和加伦將軍的会商后，决定請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作政治部主任。于是，中共中央就决定調周恩来同志担任了这个工作。

軍校其他各主要部門負責人还有：教練部主任李濟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軍事总教官为何应欽，軍事教官有刘峙、张元祜、顧祝同、錢大鈞、陈繼承、胡树森、沈应时、陆福廷等。政治部秘書为聶荣臻、魯易。教育副官为季方、陈誠、徐坚。学生队总队长由邓演达兼任，副总队长严重；队长茅延楨、呂梦熊、金佛庄；区队长有蔣鼎文、严鳳仪、倪弼、惠东升、郇子举、郭俊、曹石泉等二十四人。軍事幹部多半是从李濟深的粵軍第一师抽調的，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是从李濟深所办的西江講武堂調过来的。

應該指出的是，軍事教官都是出身于保定軍官学校等旧的軍

事学校或者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学校，有许多是从軍閥部队过来的。他們不仅带来了軍閥部队的腐敗作风，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对革命也是疏远的，甚至是敌視的；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柏龄，他是蔣介石最亲信的右派头目之一，也是学生所最討厭的人。

苏联顧問方面除鮑罗廷和加伦將軍經常給以帮助外，派在軍校工作的有：顧問长（总顧問）契列班諾夫（当时同學們称呼他为“柴顧問”）、步兵顧問白礼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喀拉觉夫等。

軍校招生工作除在广州能公开进行外，当时因全国各省都在軍閥势力控制之下，只能秘密就地考試或者动员青年学生来广州投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各地組織在这一工作上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考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区党委所遴选介紹的党团员以及革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广州直接招收的学生不多。第一期新生由于选择的标准比較严，只录取了四百七十名，后来又收录了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二十余名，因此第一期学生共約五百名。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有的仅具有中学程度，还有連小学也沒有上过的。但是从学生的政治条件来看，他們的家庭成分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级佔絕大多数，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据統計，第四期学生中，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佔百分之二十八，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级佔百分之五十四，民族資产阶级佔百分之十八。黄埔学生所以能够在統一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和北伐战争中表现出旺盛的战斗精神並且能够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的拥护和协助，除了軍校政治工作对他們的影响而外，他們本身的阶级成分也是一个根本因素。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先生親臨主持。五百多個學生，一律穿著蘇聯式的黃卡其布軍服，整齊嚴肅，精神煥發，軍容極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新型軍隊，對於當時在場的各系軍閥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孫中山先生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真正革命武裝隊伍，沒有廣大人民的基礎；現在無論那一個部隊，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據之實，剋扣軍餉，剝削人民，貪圖私利，貽害蒼生，使我的革命主張不能實現。我做了驕兵悍將的傀儡，成為人民的罪人。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為得完成我們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實行工農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與民眾相結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為人民的武力。這就是創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主旨，也就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使命。”

二、黃埔軍校的教育內容和各期概況

黃埔軍校第一、二、三期的學程規定為一個月入伍教育、六個月正式教育；從第四期起，入伍教育期限延長為半年。教育內容是政治課程和軍事課程並重。一般學生的政治課程規定為：三民主義淺說、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國政治經濟狀況、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世界革命運動簡史等等。至於政治班，則除了上列各項課程之外，還有：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際政治經濟狀況、蘇聯概況、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原理、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結構、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中國青年運動、宣傳鼓動工作的意義和作用、軍隊政治工作等等。每門政治

課程最多的講十六次，每次兩小時；最少的講四次。教員按照各門課程的授課次數編寫講授提綱，在規定時間內講完。學生上課時當堂作筆記，既無書本，也沒有講義。

除了各門政治課程之外，還經常舉行講演會，集合全體學生聽講。講演的人除孫中山先生外，國民黨方面有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邵元沖等；共產黨方面有周恩來、譚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周恩來同志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員的講演很受同學們的歡迎，他們每次講演時，大花廳（即大講堂）里都擠得滿滿的，軍校的工作人員也都自動地去旁聽。國民黨右派分子邵元沖的講話最不受歡迎，人們把他叫作“催眠術教官”。

蔣介石為了使學生和官兵養成對他個人的偶像崇拜，經常集合學生、官兵進行所謂“精神講話”。他當時還兼任長洲要塞司令，並住在要塞司令部里，要塞砲台前面豎着一面大紅旗，旗上有一個斗大的“蔣”字。要塞司令部和軍校相距不到一里路，可是蔣介石每天上、下班，總是警衛森嚴。他披着一件拿破崙式的斗蓬，前面有一個副官開道，四個服裝整齊的武裝士兵跟在他後面，威風凜凜，好似戲台上大將出征的神氣。如果學生、官兵在路上遇見他，沒有向他敬禮，他一定要追究，給予處分。

在軍事教育方面，蘇聯顧問對黃埔軍校所付出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軍校創辦之初，為了適應當時革命形勢的需要，必須在短時間內儘快地訓練出一批軍事幹部。但是按照傳統軍事教育制度，培養一個初級軍官約需三年時間，而且軍校的軍官既是舊的軍事學校出身，他們的軍事教育知識都是舊的一套，要求他們打破常規，以革命的方法來進行教育，也是很難辦到的。但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導下，這個問題勝利地得到了解決。

苏联顧問根据紅軍建軍的經驗，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和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安排了各項軍事科目的进度和日程，並且定出詳細实施办法。此外，苏联顧問还提供紅軍最新的資料，重行編訂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在术科教育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級队长对于新的术科內容都是生手，都必須由苏联顧問講解示范。因此，每教一个新科目之前，都先将各級队长集合起来，由苏联顧問亲自教練，把他們教会之后，再讓他們回到各队去教学生。在野外演習时，苏联顧問常給学生作講評。那时学校还没有沙盘設備，他們就用树枝和石头摆在地上代替沙盘，对学生詳細說明怎样作是正确的，怎样作是錯誤的，給同學們的印象很深。

第一期学生，連同入伍教育在內，學習了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畢業，畢業时仍为四个队，共四百九十三人。后来又把原定編入第二期第六队的軍政部講武堂一部分学生一百四十六人提升到第一期，因此，第一期人数增加到六百三十九人。講武堂学生有三百多人，当軍校第一期畢業时，他們有一部分学生要求併入黃埔，但全体官长反对，內部曾因此引起風波。当时由于急需下級軍官，而講武堂学生的学、术科成績又較好，所以这一百四十六人併入黃埔軍校后，特准提前畢業，並按照第一期畢業生的待遇分配工作。

第一期六百三十九人中，据李奇中同志估計，現已死去五百五十三人，只剩八十六人。

这一期畢業生除大部分派在本校教导团分別担任連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班长、文書、上士等职外，其余还有一部分派在校本部和政治部服务，一部分派在第三期学生队担任区队长，一

部分派到其他部队和军事机构（如海军、医院等）任政治工作，一部分派在各农民、工人团体（如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广州工人纠察队等）担任军事训练工作，一部分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少数派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当时同学们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不管什么工作都肯干，并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而且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

一九二四年八月，军校继续招考第二期学生四百五十人，开始分科（第一期不分科），编成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四个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毕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招考第三期学生一千二百二十四名，编为一个人伍生总队，升学后编为十个步兵队（其中一部分是后招收的）、一个骑兵队。从这一期起，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半年入伍期满，才转为军官学生。第三期学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毕业。

教导团成立后，军校由于调走了许多干部，乃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了一个下级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旧军官加以政治训练，作为补充。

一九二五年十月，招考第四期入伍生二千三百一十四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入伍生团，以后又成立了第三团（其中一部分后来编入第五期）。这时革命根据地已经统一，为了团结革命力量，统一军事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把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月一日，第四期入伍生升学，编为步兵科第一、第二两团和工兵科、炮兵科、经理科、政治科等四个大队。十月，第四期学生毕业。前三期学生毕业后，分发工作范围只限于第一军。从第四期起，由于学校改制，毕业生就分发到

各軍担任軍職。因此，學校改制，對於在國民革命軍全軍範圍內推廣新的軍事教育制度和軍事組織，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三月，陸續招考第五期入伍生二千六百二十名。這時全國正處在革命高潮，各省青年投奔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日益增多。為了擴大入伍生的招考和訓練，學校成立了入伍生部，同時籌備招考第六期入伍生。這期間又成立了高等教育班，主要是訓練各級參謀人才（只辦了兩期）。第二次東征勝利後，在潮州成立了分校，抽調當時駐在東江的各部隊的行伍軍官加以訓練（共辦了兩期）。北伐軍克服南昌後，臨時成立了一個軍官訓練班，收容俘虜軍官千餘名施以訓練。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公開叛變革命後，黃埔軍校的性質也就起了變化——它已由為革命服務的軍事學校變成了為反革命服務的軍事學校了。到了第七期畢業，黃埔軍校就被蔣介石宣布停辦了^①。據不完全統計，第六期共有學生四千八百九十九名（分為黃埔、南京兩個部分）；第七期共有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分在南京和武漢兩處畢業。黃埔軍校前後七期共培養了一萬五千四百餘名軍官人才。

中國共產黨在黃埔學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優秀學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產黨。在各期學生中間，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都起着核心和骨幹作用。例如第一期學生中就有八十多個共產黨員，第四期政治班四百六十人中就有九十九個共產黨員。第一期學生中的陳賡、蔣先雲，第四期學生中的林彪等共產黨員，在學生中

^① 據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十號時事日誌載，黃埔軍校於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奉總司令令停辦，由第八路司令部派員接收”。

間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學生中的進步組織——“革命青年軍人聯合會”，就是由共產黨員蔣先雲、陳賡、王一飛、周逸群等負責領導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在文藝活動方面也很活躍。例如學生自己組織的“血花劇社”，曾經自編劇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為題材的話劇，得到群眾的好評。這個劇社的領導和骨幹，多半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

軍校各期學生的籍貫以湖南、廣東兩省為最多。前四期學生中，湘籍學生佔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二，粵籍學生佔百分之十七點一〇；如以七期學生平均統計，則以粵籍學生居首位，為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七，湘籍學生次之，為百分之二十五點五二；再次為浙江（百分之七點二〇）和江西（百分之六點二四）等省。

此外，還有一個事實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就是軍校學生中有一部分外國籍學生，如第四期有朝鮮籍學生二十四名，七期共有三十四名；還有一部分越南籍學生，七期共有十三名；並有少數蒙古、新加坡等外籍學生。這一事實表明，黃埔軍校在為亞洲其他殖民地國家培養革命幹部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黃埔軍校除了培養出七期軍官人才之外，一九二四年底成立教導團，也是一件大事。當時教導團的新兵大部分是從浙江、江蘇、湖南等地招募來的青年工人和農民，工人中有不少絲織業工人，共編成兩個團。教導團的各級幹部都由第一期的教職員和畢業生擔任：何應欽任第一團團長，王柏齡任第二團團長，錢大鈞、劉峙、顧祝同、沈應時、蔣鼎文、劉堯宸分任營長；陳誠、郭俊、惠東升、鄧子舉、宋元竟等分任副營長和連長。第一期畢業生除少數擔任連長外，其餘分別擔任副連長、排長、副排長、特務長。第一團黨代表為繆斌，第二團黨代表為王登瀛，營級、

連級黨代表由第一期畢業生分別擔任。

教導團的編制採用三三制：每團三營，每營三連，每連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戰鬥兵。團部直屬部隊有兩個機關槍連、一個特務連以及偵探隊、通訊隊、衛生隊、輜重隊各一隊。作戰時一般都是以連為作戰單位，由軍官持駁壳槍任前驅，士兵持步槍跟着軍官前進。每連有軍官九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共產黨員，他們在戰場上不僅身先士卒，還要監督其他官兵作戰。這一支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部隊，在統一革命根據地的各次戰役中，成為革命軍的主要力量，能夠以少勝多，每攻必克，充分表現了革命軍隊的英勇頑強的特色。

教導團發展得很快，成立後幾個月之內便擴大成為兩個師（師長何應欽、王懋功）；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就編成了一個軍，即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三、黃埔軍在戰鬥中鍛煉成長

國民黨改組後，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綱領。因此，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買辦勢力也就加緊勾結起來，陰謀推翻廣州革命政府。廣州的商團原是英國帝國主義直接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買辦的武裝，以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國民黨右派分子）與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其首領。他們與英國香港政府和軍閥陳炯明勾結，利用商團名義，向香港德商訂購大批軍械，由一丹麥輪船運來廣州，陰謀暴動，妄想恢復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孫中山先生接得密報後，立刻派黃埔學生乘軍艦前往沙角攔截，把這批軍械押回黃埔軍校。廣州商團兩次罷市要挾發還，並開槍射擊十月十日國慶節的遊行群

众。同时，駐广州的英国总領事也向广东的革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公然以武力干涉相威胁。于是，广州的局势突然严重起来。孙中山先生对商团的态度，开始还不够坚定，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决心採取坚决的镇压政策。十月十四日派出黄埔軍校学生，开始軍事行动，其他各軍也随同动作，把商团包围在西关一带，经过一天的激战，就全部肃清。在平定商团的斗争中，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自衛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商团叛乱的削平，严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从而使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黄埔学生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第一次锻炼，提高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軍閥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緒。黄埔学生战斗精神的旺盛、軍紀的严肃，給广州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埔軍校成立之初，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本来是很不巩固的。那时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有軍閥陈炯明盘据着。他们在英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援助下，准备打回广州，消灭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倡議和支持之下，广东革命軍队举行了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軍校的学生。由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为骨幹的黄埔学生軍的英勇作战，和共产党员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到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佔領了潮汕。在这次战役中，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棉湖之战最为激烈。革命軍以千余人抗拒号称万人的敵軍，苦战半日，终于在友軍的配合下，把敌人打垮。苏联顧問对全体官兵講話时，对这次战斗給以極高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员負伤的有連长郭俊、刘畴西等多人。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楊希閔、劉震寰的滇桂軍與英帝國主義及雲南軍閥唐繼堯勾結，圖謀顛覆廣州的革命政府。為了削平叛亂，東征軍兼程回師廣州，留守黃埔軍校的第三期入伍生也同時出動。六月十二日開始總攻擊，在廣州的工人及近郊的農民幫助之下（如鐵路工人罷工，使敵軍不能及時調動軍隊），僅半天的時間，便將楊、劉叛亂削平，革命政府乃轉危為安。

第一次東征勝利及平定楊、劉之後，在共產黨倡議之下，將廣東根據地原有的“大元帥府”的革命政權改組為“國民政府”。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並以黃埔軍校的学生為骨幹，將所有參加革命的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時候，黃埔軍校的教導團已擴編成兩個師，後來又將許崇智的粵軍改編成為一個師，合併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陰謀暗殺，全校師生悲憤萬分。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下，黃埔軍校的学生和部隊，與友軍配合並依靠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廣大人民的支持，解散和重新改編了廣東軍閥許崇智指揮下的粵軍，並把右派頭子胡漢民和許崇智驅逐出境。

一九二五年十月，廣東革命軍又舉行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周恩來同志任總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的黨代表。十月九日，部隊逼近敵人重要據點惠州城。十月十三日開始攻城，戰鬥非常激烈，第四團團長劉堯宸及副營長共產黨員譚鹿鳴等都是在攻城時陣亡的。十月十四日傍晚，終於將号称東江天險的惠州城攻下。從此，長驅直入，二十一日佔河源，二十二日佔紫金、五華；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大破敵軍萬余於河

婆。至此，陈炯明军队的主力消灭殆尽。最后追歼残敌于福建边境的永定，完全收复东江全境。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员唐同德等多人牺牲。

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农民的支持对第二次东征的迅速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各地农民协会号召之下，男女老幼踊跃给东征军抬机关枪、挑弹药，还热情地把糖稀饭送到阵地上。行军时有些农民兄弟还端着喂马的饲料边走边喂。农民对革命军队的热情使同学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在历次战役中，黄埔学生都组织了宣传队，在战场附近的农村和城市进行宣传。共产党员傅维钰、李劳工等，当时都是负责领导宣传工作的。李劳工就是在敌后宣传中被反动派杀害的。

当时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如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查队，多半是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沙基惨案，黄埔学生死难的有文超代等多人。

四、两条道路的斗争

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威望的增高，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这就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敌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黄埔军校的反动分子，也就日益露出了反革命的苗头。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共产党为了改造在革命政府之下的各军军人的意识形态，发动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组成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

陈赓、王一飞、許繼慎、左权、陈啓科、黄鰲、李汉藩、楊其綱、袁策夷、刘云、张际春、余洒度等；教職員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楨、魯易、胡公冕等。这个組織的活动范围很广，不只限于黄埔軍校，也不限于陸軍；当时滇、桂、湘各軍所設的軍官学校，都直接或間接接受了它的影响。这个組織在平定楊、刘叛乱战役中，对于瓦解楊、刘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这个組織却成了軍校中以蔣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眼中釘。在第一次东征时，賀衷寒、繆斌等反动分子就在戴季陶的影响下並在蔣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組成了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以与青年軍人联合会对立。这个反动組織的主要人物除了賀、繆二人以外，还有楊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鄧悌、賈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杲、胡宗南、桂永清、蔣伏生等。教職員中王柏齡、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錫坤、张叔同等，以及虎門要塞司令陈肇英、海軍將領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長吳鉄城等也都加入。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由蕭叔宇、段錫朋和西山會議派童理璋、喻育之等發起組織孙文主义学会，与广州互相呼应。国民党在改組初期分化为三派，到了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时候，大体上又合流了，他們相互之間虽然有矛盾，但是在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共活动方面差不多是一致的，仅仅在程度上略有差別而已。

青年軍人联合会在成立之初，为了照顧国共合作的精神，規定凡是黄埔軍校的同学，都是青年軍人联合会的当然會員。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参加这个組織的分子就有意識地退出了青年軍人联合会。这样，就很自然地把青年軍人联合会純潔化了，它就

成为純由共产党人組織領導的团体，不过名义上还是受軍校校长和党代表的領導。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与青年軍人联合会时常發生摩擦，明爭暗斗，非常激烈。这个反动組織平时專門監視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的活动，甚至在深夜里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有一次林振雄同李汉藩發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槍向李开了一槍，幸未打中。此事当时引起了大風潮，事后虽由廖党代表将林振雄撤职查办、李汉藩記大过一次而告結束，但双方的斗争还在繼續發展。学校的風潮虽然暂时平靜下来，可是东征軍从广州出發，一直进到潮梅，孙文主义学会就同青年軍人联合会一直摩擦到潮梅。由于周恩来同志領導有方，一路上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潮梅底定之后，賀衷寒同李之龙有一次在梅县集会上發生冲突，一直鬧到蔣介石那里，結果把李之龙調回軍校工作，賀衷寒也受到撤职处分。第二次东征时，双方又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打了一次大架，形成势如水火、不可調和的局势。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蔣介石才下令同时取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軍人联合会（双方自行解散通電見《政治周报》第十期），另組黃埔同学会，把黃埔軍校的学生和教职員的組織統一起来，由蔣介石直接領導。青年軍人联合会虽然从此解散了，但孙文主义学会不仅仍然用黃埔同学会的形式借屍还魂地存在着，而且这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一直到大革命时代还散佈在全国各省市，幹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成为蔣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力量。

蔣介石深深懂得掌握軍权的重要性，有了軍权就有了一切。因此，蔣介石在东征以后，就千方百計地寻找机会，企圖把黃埔

軍校和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排擠出去，以此作為實現反革命陰謀的先決條件。於是，蔣介石經過周密的計劃和部署，和孫文主義學會骨幹分子倪弼、陳肇英等共同策劃了反共反蘇的大陰謀——中山艦事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指使其爪牙用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一個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要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中山艦開到黃埔後，他們就散布謠言，說共產黨要舉行暴動，推翻廣東革命政府。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就誣蔑“共產黨陰謀暴動”，調動軍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以及蘇聯顧問辦事處和住所，並逮捕了李之龍等共產黨員五十餘人，同時拘捕了黃埔軍校中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隨後就強迫他們退出第一軍，從而竊取了第一軍的軍權。

中山艦事件以後，蔣介石接着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提出了限制共產黨的所謂“黨務整理案”。六月，蔣介石就以這個“黨務整理案”作為武器，要黃埔軍校的幹部和學生填表聲明黨籍，不准跨黨。這一反動措施更加引起了學生群眾的憤怒。有些學生本來並非共產黨員，却在填表時自動填上了共產黨的黨籍，聲明脫離國民黨黨籍。

自此以後，黃埔軍校學生中兩條道路的鬥爭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千方百計地企圖收買黃埔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但是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都能堅定地站穩立場，沒有墮入圈套。例如蔣先雲就是蔣介石竭力企圖收買而始終收買不到的優秀黨員之一。蔣先雲是黃埔學生的主要骨幹，能力既強，威望也很高。他從軍校畢業後就被蔣介石調去當他的隨從秘書和總司令部警衛營營長。蔣介

石曾採取各種手段，威肋利誘，企圖迫使他脫離共產黨，但是他始終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離開了蔣介石。他後來於北伐時在葉挺部隊中任團長，在河南打張作霖時於東西洪橋的一次戰役中壯烈犧牲。蔣介石還利用同鄉關係來拉攏金佛莊同志，不止一次地暗示他脫離共產黨。但金佛莊同志也未為所動。一九二六年克復南昌後，蔣介石調金佛莊同志赴浙江做敵後工作，他經過南京時被孫傳芳捕殺。蔣介石當時雖然同孫傳芳打仗，但還有信使往還，有人認為金佛莊之遇害，是蔣介石運用曹操殺彌衡的手法把他殺死的。照當時情況看來，這是很有可能的。又如共產黨員胡秉鐸也因何應欽收買未遂，後來竟被殺害了。當然，也有少數共產黨員因立場不穩而被收買過去的。當時政治主任教官蕭楚女同志曾以“個人主義的三十六變”為題，在黃埔軍校作了几次長篇講演，就是從側面來揭露蔣介石的這個反動陰謀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進行“清黨”、公開叛變革命後，黃埔學生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平時表現進步的學生，大批遭到監禁和屠殺。蕭楚女同志因患肺病在廣州東山醫院養病，被軍警捕去後掛在汽車後面拖死。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和政治部宣傳科長楊其綱同志於四月十五日在廣州被捕，不久即遭槍決。從此，白色恐怖籠罩了全中國，國共合作完全破裂，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新的階段。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後，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從此分裂了。向左走、繼續堅持革命的黃埔學生，如林彪、徐向前、左權、陳賡等無數共產黨員，成了紅軍的領導骨幹，成了黨和人民的優秀兒女；向右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成了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支柱、人民的罪人。這個政治分野上的對照是十

分鲜明的。

那里有共产党，那里就有光明，有力量；离开了共产党，就会失去灵魂，就会迷失方向——我们今天回忆黄埔军校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又向我们再一次地展示了这一条真理。

对本文的补充和订正

一、“黄埔建军”题目应加“注”。

注：“本文由近代史研究所姜克夫同志提供部分资料并曾在黄埔同学会负责的黄雍先生补充。”

二、第二页第十七行倒数第三字之前应加：“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句。

三、第三页倒数第七行倒数第四字前应加：“（当时亦称特别官佐）”。

四、第六页第十三行第十一字前应加“作风和当时广东军阀一样，在”。

覃 异 之

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 奇 中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方面努力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方面建立革命軍，积极准备北伐。当时广东的軍事形势是：在公开敌对方面，叛逆陈炯明所屬的林虎、洪兆麟等部割据东江地区，其另一部分邓本股部則割据南路高雷八属和琼州島地区，他們勾結北洋軍閥和英帝国主义，企圖夺取广州，消灭革命势力，佔据整个广东地盘。在内部方面，广东境内各派駐軍，包括广东本省軍隊和滇軍、桂軍、湘軍、贛軍、川軍等等，情况复杂，只知各自爭夺地盘，截留稅款，开设烟賭，扩充实力，並未打算做革命的事情。其中滇軍楊希閔等，甚至暗中勾結叛軍，拥兵自大，驕橫跋扈，对孙大元帅的命令阳奉阴违。駐軍中虽有少数將領如粵軍陈銘枢、湘軍譚延闓、程潛和滇軍朱培德等忠于孙大元帅，但力量太薄，不大济事。另外还有在英帝国主义直接培养下的商团武装势力，阴谋活动，破坏革命。总的看来，当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迫切希望广东革命根据地脱离危险状态，获得巩固，以便早日实行北伐，完成国民革命，无奈革命的軍事力量过于薄弱，而新創立的黄埔軍校又尚未形成一个力量，大有心余力絀之感。为了使駐粵各派軍隊改造成 为 革命

軍，實現內部團結統一，集中力量北伐，孫中山先生曾經不得已而採取過說服和妥協的方法，例如對叛逆陳炯明，只要他放棄割據，服從政府，參加北伐工作，即可不咎既往。但是這種說服、妥協的辦法只有極小部分發生效果，大部分失敗了，因此，不得不對廣東革命根據地採取武力統一的手段。現在把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幾次戰役情況分述如下：

一、平定商團叛亂

陳廉伯是英國匯豐銀行買辦，以陳為首在廣東形成了買辦資本家集團勢力，為英帝國主義的利益服務，並且組織武裝商團，同革命勢力相對抗。這個集團，最初採用了兩面派手法：一方面表面上服從孫大元帥；另一方面則勾結陳炯明、楊希閔等各派軍閥，私販軍火，從中獲取暴利（從英國人手中用低價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報廢軍火，再以幾倍的高價轉售給各派軍閥）；同時，暗中利用走私軍火中的一部分來增編和武裝商團，陳廉伯自封為商團團長，並派具有政治野心的前廣州公安局副局長陳恭受為副團長，組織商團司令部。陳廉伯等借口廣州駐軍分子複雜，時常發生搶案，商人利益失去保障，要求政府准許商人武裝自衛，用商團來代替駐軍和警察擔任商業區街坊的守護責任。他們在驅取了商人武裝自衛的特權以後，就得意忘形地大事擴充武裝力量，以佛山為主要基地，分別在佛山和廣州西關編練武裝隊伍，朝着軍隊形式發展，並同陳炯明和楊希閔訂立密約，獲得軍事幹部的供應。在武器方面，他們只靠走私已不能滿足需要，就正式同英帝國主義訂立密約和軍械供應合同，據說供應的數目是步槍十萬枝，還有各種重武器。

陈廉伯等的阴谋野心逐渐暴露，从英帝国主义那里买得的军械分批运入佛山和广州。孙大元帅正在韶关督师北伐，获得上项情报后，当即电令黄埔军校协同海军实行拦截和扣留。黄埔军校执行了这个命令，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初截获了一批很大数目的商团军械，并予以扣留，存放于黄埔。这是数目较大的一批，至于小批偷运就防不胜防了。

商团军械被扣后，陈廉伯乘机兴风作浪，竟敢胁迫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被扣军械。陈恭受并代表陈廉伯于八月下旬在佛山召集广东全省商团首领开会，决定用商团总部名义通令全省实行罢市，并用武力驱逐各县县长，宣布独立，成立商人政府。商团这些行为显然是叛乱的行为，广东的革命派主张采取断然手段平定这次叛乱。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正面支持商团的叛乱，公然行文给广东政府，说什么不得使用武力对付商团，并且命令驻在白鹅潭海面的英国舰队进入作战状态。孙中山先生对英帝国主义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无耻行为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但是对商团的叛乱，却在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玩弄下妥协了；这种妥协的结果，适足以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使其更加嚣张。

十月十日，广州市民一万多人举行国庆游行大会，走到太平路的时候遭到商团开枪扫射，死伤数百人。太平路并不属于商团所辖武装自卫区域，而武装商团竟任意扩张自卫区（商团武装自卫的西关，等于外国租界，不受政府约束）。他们不仅对市民群众进行大屠杀，并在街上张贴佈告，公开要求孙中山先生下野，请陈炯明回省主政。

孙中山先生在韶关闻悉广州商团武装叛变，广东革命政权危在旦夕，心甚焦虑，于是星夜回师广州镇压叛乱，挽救革命危

局。

孙中山先生根据敌情和政府軍駐防情况，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軍楊希閔部的廖品卓（又名廖行超）师負責剿灭广州市西关区的全部商团；命令駐防佛山的滇軍胡思舜部胡思清师負責剿灭佛山市全部商团。

胡思清遵行大元帅命令，派旅长罗廷标执行平剿任务。罗廷标以全旅兵力暗中包围了佛山商团各駐紮地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法，經過較少的战斗，就完全解决了佛山市的商团，繳获步枪六七千枝，摧毁了商团基地，但是掌握实权的陈恭受，却据說用巨款买通滇軍而从容逃往香港了。

滇軍师长廖品卓並未服从孙大元帅的命令。他的駐軍防区包括广州市西关区在內，而西关正是商团在省城的基地，廖品卓不但不遵令进剿，反而予以包庇，掩护商团輸入和屯积粮弹。孙大元帅对滇軍的违令行为暂时予以容忍，另派李福林军队和湘軍去进剿。李福林原先也是同商团勾結的，現因情势变化，乐得受命，还可借此从中取利。李部多是土匪出身，善于巷战。湘軍与李部經過一天多的战斗，沒有攻进西关。因为西关所有街道都建有耐燬的铁柵或木柵閘子，构成了街坊式堡垒，頗为坚固；这些堡垒原先本是用来防御土匪的，現在却被商团利用当作反抗政府的障地。商团憑借街坊堡垒並得到滇軍暗中支援，实行頑抗，很有曠日持久之可能。

孙大元帅看清了这个危险局面，决心採取非常手段以求速决，当命令吳鉄城的警衛軍和黃埔軍校学生担任清剿任务，並針對街坊堡垒的战术使用火攻。警衛軍和黃埔軍校学生于十月十五日实行火攻，放火烧燬了西关的商店和住宅約計千余戶，才把这

种街坊式堡垒攻破。商团在无险可守之后，就把武器交给滇军廖品卓部，滇军让叛乱分子逃走。至此，广州全部商团被肃清了，商团的武装叛乱就算平定了。

在攻入西关前后时间，吴铁城的警卫军、李福林的福军、湘军、滇军，都趁火打劫，不但作战区的西关被他们连烧带抢地洗劫一空，就是靠近西关没有划入作战区的街市如金银珠宝手饰店舖所在的小市街一带，也被抢劫一空。经过负责巡查市区和维持军风纪的黄埔军校学生劝告和制止后，抢风始息。广州商人当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这是由于买办资本家集团武装叛乱所造成的灾祸，在政府方面来说，是不得已的事情。英帝国主义曾为这次事件动员舆论，诬蔑孙中山先生实行烧杀政策，不是在搞革命。其实，孙中山先生这种断然的非常手段，正足以显示他的革命气魄。

这里叙述一下在扣械期间发生的一个插曲：广东驻军知道黄埔军校扣留的商团军械存放于黄埔的消息后，纷纷要求分发给各军。孙大元帅曾为此事写了几封信给蒋介石（详见蒋介石印发的孙中山通信手扎），叫他认真考虑这件事。但是蒋介石对孙大元帅这些指示没有认真考虑，对各军的要求置之不理，以致引起各军不满。孙大元帅特为此事召集过会议，听说有一滇军将领（好像是范石生）在会上骂蒋介石并且拔出手枪向蒋射击，经孙大元帅严加制止，风波才告平息。结果，所扣枪械全部分给了各军，黄埔军校并未留用一枝，因为黄埔军校所需的一切武器都已由苏联供应了。

二、平定陈炯明叛乱，第一次东征

孙中山先生在南下护法、組織軍政府、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一手培植陈炯明作为粵軍首領。不料陈炯明忘恩負义，不忠于革命事业，更不忠于革命領袖孙中山先生，突行叛乱，砲击观音山总统府，迫使孙中山先生避难于永丰兵艦（后改称中山艦）。后来陈炯明在被各省入粵支援革命的部队打走以后，就盘据东江，形成对抗局面。陈炯明在叛变之时，业已勾結了北洋政府，窃据东江后，又勾結英帝国主义，从汕头获得英帝国主义的軍火接济来扩充实力。到一九二四年末，政府虽然多方对他进行說服工作，他仍不悔悟，並且气势洶洶，命令部队向淡水推进，企圖进攻广州。因此，广州革命根据地內，在去掉了武装商团这个心腹之患以后，当时的唯一敌人就是陈炯明，必須把这种反动势力消灭，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才能保証革命順利前进。

討伐陈炯明、平定东江的任务，本来应由滇軍担任，因为滇軍兵力雄厚，战斗力强，很有把握打倒陈炯明；同时，滇軍胡思舜軍的主力曾万鍾一个师和四个独立旅都駐在惠州地区，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出击也比较便利。但是，楊希閔等拒絕接受攻打陈炯明的任务，不願为了革命利益而暂时离开广州、韶州、惠州等地去打仗，他們惟恐这些肥沃地盘被別人侵佔。此时最高統帥孙中山先生臥病北京，鞭长莫及，无法促使楊希閔等接受东征任务。形势十分紧迫，滇軍既不肯打仗，别的部队力量又不够，不得不提前使用黄埔軍校教导团这个新兵队伍去应付紧急局面。于是政府派黄埔軍校校长蔣介石为东征总指揮，以軍校教导团为主力，並派粵軍陈銘枢、許济两部协助，来完成东征任务。后来滇

軍虽然表示願意担任左翼的攻击任务，但政府已經看清他們“坐山观虎斗”的毒辣态度，所以在作战計劃上根本沒有把滇軍算在里面。

一九二五年一月，由浙江、湖南等地招募来的新兵編成了两个教导团，由黄埔軍校的教职員和第一期畢業生担任各級幹部，編制仿效苏联紅軍三三制並实行党代表制。兵器全是由苏联供給的，有步槍、重机关槍、手机关槍、十响驳壳槍、手榴彈和山砲等等。由于时机紧迫，新兵教育采取了非常手段，使用在苏联軍事顧問指导下所編訂的新式典、范、令和速成練兵法进行訓練，一开始就教新兵練队、用槍、瞄准、射击、擲手榴彈等战斗动作，不教一般制式动作；同时利用行軍在沿途施行宿營警戒、利用地形地物等項教練。这样，新兵在極短时期內就鍛炼成为富有战斗能力的战士。

苏联軍事顧問团，从新兵团的編組、教練、行軍以至作战，都是参加的，他們行軍时从未騎过馬，都是步行（第一次东征时，只有两匹馬归两个团长騎，蔣介石坐轎子，所有顧問和各級幹部一律步行）。作战时他們都亲临前綫，到各个陣地上进行指导。

二月上旬起，两个教导团沿广九铁路綫举行野外演習，一边行軍一边教練，每天只走一、二十里。在行軍途中，士兵和連、排、班长都不知道是出發打仗，还以为是在操練和演習。到樟木头車站附近，就离开铁路綫向东前进，到达龙崗后，再前进一段路程就是淡水。

淡水战役

陈炯明的洪兆麟部，派有一个旅的兵力进驻淡水，作为进攻广州时主力集结的掩护。当黄埔军校教导团（以下简称黄埔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到达淡水附近时，由于地方民众的协助，远道报信，发现上述敌情后，决定对当面之敌进行攻击，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要在敌人后续部队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城。

淡水之战是考验黄埔军的头一关。黄埔学生和士兵除了实弹射击演习以外，都还没有听过枪声，毫无战斗经验，现在头一关就碰上攻城战，胜败如何，很难预料，所以在攻击部署上必须极其周密慎重。首先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挑选了奋勇队（即敢死队）担任爬城任务。这个奋勇队由官长十人（其中国民党二人，为营党代表蔡光举、连党代表冷欣；共产党八人，为连党代表刘畴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李奇中、张隐韬、李汉藩、郑洞国）和士兵一百名组成，分成若干攻击组。以教导第一团为攻击主力，教导第二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防御敌人后续部队接近淡水城的任务。

二月中旬某日（大约是十二日）拂晓开始攻城，战斗激烈，约在正午左右攻入了淡水城内，经过巷战后，全部敌军缴械被俘。这一仗算是打胜了，但是死伤颇大，奋勇队在接近城墙和爬城搏斗时伤亡更大，官长中蔡光举阵亡，刘畴西被打断了左臂，还有几人受伤，士兵则伤亡半数。

正当第一团歼灭了城内敌人的时候，洪兆麟的后续部队果然赶到了，同第二团展开战斗，团长王柏龄临阵逃走，部队也有一部分退下来。幸得第一团从速整理了战后的部队，派第二营营长

刘峙率领全营反攻，把敌人打跑，才稳定了淡水城的佔领。当刘峙率部反攻时，正值黄昏时候，发生一个偶然的奇事：敌人在昏暗中误认刘峙的队伍是从淡水城逃出来的自己人，等到两方靠拢，黄埔军上刺刀冲锋时，他们措手不及，只好败退。黄埔军乘势猛追，敌人狼狽逃窜。

淡水战役，是在採用速战速决法、使用奋勇队爬城以及砲兵协同作战等条件下取得胜利的。

平山附近击溃洪兆麟主力的战斗

黄埔军在淡水略事休整补充后，根据人民群众探报，得知洪兆麟率领他的全部万余人向淡水前进。黄埔军于是从淡水城向东前进，迎击敌人。事先对洪兆麟的战法特点作了研究，知道他是“以三冲”出名的，即经常使用連續举行三次以密集队伍猛烈冲锋的战法把对方冲垮，牺牲多少，在所不顾。黄埔军根据这个特点採取对策，认为只要站稳陣脚，打退敌人的冲劲，就有取胜可能。

二月十七日上午，两军在平山附近的山区遭遇，展开大战。黄埔军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採用新战术，即是运用偵探部队代替騎兵在前衛的較远前方搜索前进，求与敌发生接触，以誘使敌人主力过早展开並迷惑其主攻方面，同时便于自己的主力从容地佔领有利陣地和选择主攻方面。洪兆麟的部队果然名不虛传，勇敢善战，冲锋的密集队伍象潮水一样，奔騰洶湧，猛烈異常。黄埔军除發揮高度的革命意志和坚毅沉着、有进无退的战斗精神以外，还在火力上加以严密的配备来迎击敌方的“三冲”。洪兆麟的部队在黄埔军密集火力杀伤之下，死伤虽然惨重，但仍然前仆

后繼地連續猛冲，有不少官兵从火网空隙中冲到了黄埔軍面前，但是当他們發現黄埔軍的槍上都上着白晃晃的刺刀，而他們自己沒有刺刀的时候，就吓得回头就跑。洪兆麟的所謂三冲法宝遇着劲敌，沒有發生效果，沒有冲破黄埔軍的陣綫，只好全綫后退。黄埔軍乘势进行反击，一举击潰了洪兆麟的主力，立即轉为追击战。洪兆麟部潰退后，一直沒有能力重新組織战斗，大約是退向林虎防区要求收容去了。

黄埔軍到达海丰时，当地农民群众集会盛大欢迎，旋經陆丰于二十六日进据普宁、揭阳，沿途农民送茶送水，当挑运伏，热烈支援“学生軍”（东江的人都称黄埔軍隊为“学生軍”）。至此，黄埔軍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

棉湖、河婆战役

叛逆陈炯明原有两股軍隊，窃据潮汕地区的洪兆麟这一股，已被击潰；另一股号称四五万人，由林虎、李易标統率，窃据梅江流域的梅县、兴宁地区。陈炯明对于洪兆麟一万多人竟被两千多新兵打败这一事实很不服气，想使用林虎、李易标两部大軍一举消灭黄埔軍，于三月上旬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寻求决战。

黄埔軍在揭阳、普宁地区休整了半个月，在老百姓的热烈支援下，探悉陈炯明傾巢来犯，迫进潮汕地区，正好以逸待劳，向前迎击。三月十一日敌我双方到达棉湖、鯉湖附近之綫，就在这一綫展开大战。

黄埔軍的作战，是以第一团攻击敌之正面，第二团攻击敌之右侧背（即我軍的左翼），以粵軍許济旅的一个团（人槍約五六百）为預备队。当时我軍对于林虎等的战法了解不够，只知道比

洪兆麟穩重，同時兵力比洪多三倍以上。因此黃埔軍雖然在精神上抱有必勝之心，而在戰術上卻無取勝的充分把握。

三月十二日拂曉，第一團在棉湖西北山地與林虎主力遭遇，當即展開極其劇烈的戰鬥，戰綫逐漸延伸到數里之長，陣地變換幾十處之多，戰鬥的時間從拂曉到下午四時左右，一直沒有停歇過。由於第二團團長錢大鈞（前團長王柏齡在淡水退卻被撤職，由錢接充）行動遲緩，未能及時向敵人側背進攻，敵軍因而能夠傾全力對付第一團，致使第一團遭受壓力太大，傷亡慘重。全團官兵傷亡三分之一以上，僅第一營就有營長蔣鼎文受重傷，第一連連長余海濱、副連長劉赤忱陣亡，副排長全部受傷，只剩下黨代表李奇中和特務長邢國福兩人率領殘存士兵三十多人撐持陣地，整個陣綫幾呈動搖之象。有一處陣綫被敵人突破，敵軍衝到團部指揮所附近，團長何應欽親自率領衛士隊手槍排進行反擊，才把衝入之敵打退，衛士死傷多人，情勢極其危險。把預備隊許濟的一團兵力用上去之後，不到半小時就混亂了，仍未能穩定戰局。這時，蔣介石和蘇聯顧問也在團部指揮所，眼見這種情況，頗感憂慮。蔣介石向何應欽說：“何團長，你要堅持，必須想辦法挽回局勢，我們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敗了，我們就一切都完了，再無希望返回廣州了，革命事業也得遭到嚴重的挫折。”蔣介石說了這幾句話之後，就轉過頭去詢問砲兵連長陳誠：“為什麼六門大砲都打不響了，能不能再試一試？”隨即偕同蘇聯顧問跟着陳誠前往砲兵陣地。

事情真有这样的湊巧：砲兵連長陳誠把一門山砲加以調整，裝上砲彈，對準正聚集在團部指揮所前方小河對岸的幾百敵軍，親自拉火，果然一砲打響了，砲彈正落在這群敵人中間爆炸，打

死了几十个敌人，敌人一哄而散，向后奔逃。接着几門砲一連打了几砲，都打响了，而且打中了目标，几处敌人都后退了。于是黄埔軍陣地上精疲力竭的官兵突然兴奋起来了，振起精神，奋勇反攻，把全綫敌人打退到稍远的地方，但是也再无力前进追击了。这时已近黄昏。黄埔軍正在調整陣地，預防敌人再来进攻，並且内心惶惶之际，突然看到敌人紛紛后退，全綫退却，而且極為慌张，感到奇怪。

情况原来是这样：第二团在进出鯉湖附近后等候蒋介石的命令，久候不得，虽然听到右翼剧烈的槍砲声，但团长錢大鈞不知当机立断，坐失良机。后来該团的营长刘尧宸实在忍耐不住了，独自率領本营前进，走不多远就發現敌情（正是林虎的总預备队和指揮所位置），立即展开战斗。錢大鈞听到刘营战斗的槍声，才命令全团迅速加入战斗，实行猛攻。这时已近黄昏，正是第一团由于砲兵最后發生作用、举行反攻的时候，林虎全心对付棉湖方面，沒有想到側后方会遭到这样猛烈的袭击，事出意外，手足无措，只好被迫后退。后面一乱，很快就影响到前方，林虎、李易标全部頓時陷入混乱状态，全綫潰退。

第二团袭击成功，第一团乘势追击，两团在傍晚取得了联系。至此，棉湖大战，黄埔軍又获得了胜利。这一仗基本上决定了第一次东征的勝負，尔后虽有河婆、五华、兴宁等战役，仅是尾声而已。苏联随軍顧問对棉湖战役作評價时，非常称赞第一团的战斗精神，認為可以同苏联最优秀之紅軍某师媲美。

佔領五华、兴宁、梅县，結束第一次东征

黄埔軍在棉湖、鯉湖击潰林虎等部主力后，就轉为追击战。

林虎在河婆組織了一次微小的抵抗，目的在掩护退却。黃埔軍追擊到河婆，排除了林虎部的抵抗后，便重新部署。苏联顧問建議採取奇襲戰法，從速結束戰爭。作戰部署是，第一團取捷徑奇襲五華而佔領之，然後從速向興寧前進；第二團緊緊尾隨潰退之敵追向興寧，估計陳銘樞旅可以同时到達興寧，協同攻擊，殲滅敵人，佔領興寧。

第一團從安流鎮出發，循山徑小道，一夜急行軍，第二天拂曉前就到达了五華附近。五華是林虎的后方，敵人不多，但軍需物資不少。五華的敵人並不知道棉湖方面的戰況，更不知道黃埔軍已臨近大門口，所以黃埔軍于拂曉發起攻擊后，很快就把敵人肅清而佔領了五華縣城。第一團完成佔領五華的任務后，僅留小部擔任警戒，大部立即轉向興寧前進。

第二團尾隨潰退之敵追擊到達興寧時，陳銘樞旅也同時到达了，首先把在興寧城外神光山的敵人擊敗，並立即實行攻城。第一團也从五華趕到，協同作戰。這次戰鬥是黃埔軍集中兵力最大的一次，氣勢也盛，戰勝敵人，當然不成問題；但是只是佔領了興寧城，徹底摧毀了陳炯明的巢穴，而敵軍却並未被殲滅，很大一部分逃往閩邊去了。

第一次東征勝利結束。黃埔軍在興寧舉行孫總理逝世追悼大會后，即分兵進據梅縣，一邊向閩邊警戒，一邊整補。

滇軍本來是答應擔任東征軍的左翼攻擊任務的，但是果然不出所料，一直到戰事結束，未見他們有任何行動，他們是在坐山觀虎鬥，希望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尤其希望黃埔軍被陳炯明吃掉。

三、平定楊、刘叛乱

一九二五年滇、桂两派軍隊在粵駐防的情况是：滇軍范石生部已回滇打唐繼堯去了；楊希閔部的廖品卓師駐廣州，趙成梁師駐韶關；胡思舜部的胡思清師駐佛山，曾萬鍾師和四個獨立旅駐東江惠州等地；朱培德部駐廣州。楊希閔名義上是滇軍總司令，但實際上可以勉強指揮的只有他本人的部隊和胡思舜部。朱培德部是忠心于孫大元帥的，惟兵力較弱。桂軍以劉震寰為總司令，全部駐在西江，與滇軍約定，桂軍士兵不到廣州滇軍防地。

楊希閔、劉震寰兩人密切勾結，驕橫跋扈。孫中山先生開辦黃埔軍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楊、劉兩人認為這是同他們的私人利益不相容的，多方陰謀進行破壞，主要是阻發經費，企圖扼殺這個軍校。廖仲愷為了黃埔軍校的經費問題，不知同楊希閔講過多少好話。在扣留商團槍械事件上，因爭論這批槍械的分配問題，楊、劉等未能達到最滿意的目的，遂對政府表示不滿；後來又看到蘇聯供應的槍械只分配給黃埔軍隊，不分配給滇、桂軍，他們更由不滿而發展為仇恨。於是楊、劉等人處處與政府為難，既包庇商團造反，又拒絕執行東征的命令。孫中山先生逝世後，楊、劉等人更是無所顧忌，野心更大，竟進而勾結北洋政府和英帝國主義，打算實行叛變。當黃埔革命軍以少勝多地打垮陳炯明，收復了東江地區以後，楊希閔等認為革命勢力將日益壯大，對他們的反動活動更為不利，因而叛亂之心更加急迫。五月中旬，反動頭目在香港皇后酒店召集會議，楊希閔、劉震寰親自主持，邀請陳廉伯、陳炯明、鄧本殷、唐繼堯和段祺瑞的代表參加，香港英國殖民政府的代表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大家會商叛亂計

划，企圖联合向革命政府进攻，推翻革命政府，建立反动政权。

楊希閔从五月中旬起，开始集中兵力，部署作战。他把駐在韶关的赵成梁师調到广九铁路綫佈防，把駐在佛山的胡思清师調到广州白云山一带佈防，把廖品卓师从广州市区扩展到郊区佈防，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陣綫。

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汪精衛等还想採取妥协的方法来挽救危局，曾派邹魯赴港請楊、刘两人回省，商量改組大本营。但是楊、刘打了胡、汪一記耳光，非要推翻革命政府不可。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革命派以廖仲愷为首，則同共产党和群众站在同一立場，主张实行討伐。后来胡汉民等为形势所迫，也只好同意下討伐令。

黃埔軍校奉到討伐楊、刘的命令后，决定採取速战速决、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針，先解决广州地区全部滇軍，再解决惠州地区的滇軍和西江地区的桂軍。作战部署是：以第一、第二两团为主力，秘密而迅速地撤离东江，集結广州附近，配合粵軍一部准备攻击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一带及广州市区之敌，佔領广州；黃埔軍校在校的学生队和入伍生团队配合海軍攻击广九铁路綫之敌，並努力向右翼延伸，同教导团取得联系，协同攻击前进，歼灭敌人，並限六月十日前各部分別完成作战准备，預定十一日拂晓开始攻击。

十一日拂晓，教导团在白云山、龙眼洞一带同滇軍展开战斗，黃埔軍校的学生和入伍生队伍也于同时登岸攻击广九綫石牌一带之敌，海軍艦队也同时用远射程大砲向車陂、石牌等地之敌猛烈射击。滇軍师长赵成梁的指揮所設在石牌車站，海軍的大砲对准石牌車站發射，命中了目标，打毀了車站，当然就把赵成梁的指揮

所摧毀了，趙成梁本人逃命不及，也被打死了。这样就使得趙師無人指揮，戰綫陷入混亂，这就給予从黃埔過江登岸的學生隊伍一個發揮戰鬥威力的機會。學生隊乘勢猛攻，突破了趙師的陣地，趙師開始潰退。教導團方面，戰鬥進展也很迅速，經過劇烈戰鬥後佔領了龍眼洞、白雲山，隨即夺取了瘦狗嶺，滇軍全綫潰退。教導團和學生隊取得聯繫，協同追擊，滇軍潰不成軍，紛紛繳械投降，或丟棄武器，藏匿民家，或四散逃竄。到十二日，所有叛亂的滇軍全部肅清了，革命首府的廣州又掌握在革命勢力手中，使革命政權轉危為安了。

這次戰役，得到人民群众的幫助很大，例如鐵路工人實行罷工、怠工，破壞滇軍的運兵計劃，郊區農民向陣地的革命軍送茶水，市區居民打“紅帽子兵”（滇軍的軍帽是用紅布做帽圈的）、繳“紅帽子兵”的械等。

駐防惠州一帶的滇軍沒有來得及協同廣州地區叛軍作戰，當廣州地區的叛軍被歼滅以後，這一部分叛軍就陷於孤立無援。朱培德奉令去招撫收編時，因叛軍有少數官長表示不服，還是打了一小仗才告解決。

西江地區的劉震寰部由粵軍和廣西李宗仁軍解決了。至七月間所有參與叛亂的滇軍和桂軍完全徹底肅清了，楊、劉叛亂事件至此結束。

四、第二次東征

一九二五年七月初，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後，把駐在廣東的軍隊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黃埔軍隊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以蔣介石為軍長，周恩來同志為政治部主任。第一軍這時只

編成两个师，以何应欽为第一师师长，王懋功为第二师师长兼广州衛戍司令。这时由于平定了楊、刘叛乱，又整肃了粵軍，革命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

叛軍陈炯明部在第一次东征时被击潰后，即退匿閩边，后来从香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那里得到援助（据说槍枝万多枝、子弹数百万發和大量現款），並得到段祺瑞政府給予的軍餉三十万元，实力遂得恢复。他們乘着黃埔軍隊撤离东江、回师广州平乱和駐惠州的滇軍被改編、撤出惠州的时候，又乘隙卷土重来，佔据潮、梅、惠州整个东江地区，並集結重兵于惠州，憑借惠州險要作为基地，企圖夺取广州。

国民政府决定徹底消灭陈炯明反动势力，命令蔣介石执行这个任务。十月一日，蔣介石率領国民革命軍第一軍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的第四团（当时第二师担任广州衛戍勤务）出發，于当月上旬末到达惠州附近，准备先击破惠州之敌。

陈炯明的全部兵力几乎都集中在惠州地区，企圖利用惠州險要进行頑抗，折損革命軍兵力以后，再反守为攻，一举歼灭革命軍。

革命軍于十月十一日先行扫蕩了惠州城外之敌，佔領了飞鵝岭。以第一师为总預备队，第二师的第四团为攻城部队，十二日开始攻城大战。在攻城大战中，由于蔣介石求胜心急，在砲兵的射击还没有給攻城的步兵造成有利条件以前，就硬性地严令步兵發起冲锋，企圖援淡水战役先例，迅速接近城牆，实行爬城。第四团部队在敌人的密集火力封閉下，連續不断地冲锋。一排人倒下了，第二排跟着冲上去；第二排死完了，第三排又紧跟着冲上去。这样連續不断，前仆后继，一会儿就牺牲了好几百人，始終

沒有冲到城墙脚下；偶有一两人侥幸漏过弹雨冲过了护城河的石桥，也在尚未到达城脚之前就被打死了。第四团官兵这种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真是所謂惊天地而泣鬼神了。但是用这样的攻击方法，一連两天，都未奏功，並且伤亡很大。像这种只有損失、毫无战果的战斗，蔣介石也觉得太无意义，不忍再繼續下去了，因而暂时停歇一下，研究对策。

为什么会弄成这种局面呢？

这是一个战术問題。这是由于蔣介石缺乏战术知識（他不懂战术，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得最多），不懂得步兵、砲兵协同作战的原則，只憑主觀冲动行事。砲兵营长陈誠也不懂砲兵战术，不向蔣介石作合理的建議，只知一味盲目地順从。当攻城战开始时，苏联顧問曾建議先用砲兵施行重点的面积射击，摧毁敌人設在城墙上的重机关槍陣地並打开一处城墙缺口，給步兵开辟入城进路或者掩护步兵接近城脚，然后实行爬城攻进城去。但蔣介石拒絕接受苏联顧問的意見，說是沒有这么多砲弹，認為想用砲弹去打垮城墙是絕對办不到的，並且举出淡水战役之例来証明他的想法。因此，蔣介石叫陈誠按照攻淡水时的战法使用砲兵，多打城内的目标，尽可能地制压攻城地点城墙上的敌人火力。現在蔣介石經過了重大牺牲的惨痛教訓，才重新考虑苏联顧問的建議，改变了砲兵的使用方法。

砲兵集中火力射击一点，經過一天多的不停轟击，果然摧毁了几处重机关槍陣地，並且打开了一处城墙缺口。我軍步兵攻城队这时才能接近城墙实行爬城，佔領城墙上陣地向城内射击，並且从被打开的缺口冲进城去扩大战果。攻城部队冲进城后，紧接着就命令总预备队派一个团迅速入城，經過剧烈的巷战，才把城

內敵軍全部歼灭。敌人除死伤的以外全部被俘，因为惠州城四面被围，他們无法逃出。十月十四日，革命軍完全佔領惠州。惠州战役，是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革命軍佔領了惠州，歼灭了敌人的主力，尔后整个东江的收复也就沒有較大的战斗了。

惠州之役，双方伤亡惨重，在革命軍方面，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陣亡，营长以下全部幹部几乎伤亡殆尽，除勤杂炊事兵以外沒有剩下几个战斗兵。当总预备队派出的一个团进城接替战斗时，因城外死尸堆集如山，用爬城的梯子架在死尸堆上才能爬过去，在这个地点流的血，变成了一道黑色泥浆沟渠，足見死伤之多，战斗之烈。

惠州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命令何应欽率領第一师向海陆丰、潮梅地区前进，仅在海丰附近打了一个小仗，以后就沒有遇到什么抵抗了。至十一月底，整个东江地区的敌人完全肃清了。至此，就結束了陈炯明的叛乱历史。

战争结束后，何应欽任为东江綏靖委員，組織綏靖公署，代表蒋介石掌握东江地区的軍、政大权。

五、肃清南路叛軍

叛軍邓本殷部执行陈炯明命令，盘据广东高雷八屬和海南島。当革命軍第二次东征时，邓本殷部向北进扰，侵及阳江以北、以东地区，使广州受到威胁。国民政府派陈銘枢、俞作柏两部往剿，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把邓本殷的前进部队打退。由于邓部势力相当大，南路地势又复杂，陈銘枢等的兵力不能胜任，政府复令朱培德为总指揮，增大兵力，以求取胜。朱培德的作战部署是：陈銘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

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陈章甫部为右翼侧支队，几路进剿。十一月七日佔領阳江，二十日佔領高州，二十三日佔領廉江。邓本殷退守海南島。十二月二十日克复琼州，收复海南島。至此，邓本殷部完全被肃清，南路地区也平定了。

从此，統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完全完成了。

中山艦事件前后

包惠僧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叛變革命的第一个阴谋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誣蔑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中山艦艦長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並扣捕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絕大多數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軍，从而窃取了第一軍的軍权。現在將这一事件的亲身見聞叙述如下。

(一)

一九二五年七月，广东軍政府在平定楊、刘叛乱之后，即进行改組，成立了委員制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被推为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八月間廖仲愷被刺后，汪复兼任黃埔軍校党代表。蔣介石則負一部分、或者可以說大部分軍事責任。重大決策，全由國民党中央执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委員會負責，不可能、同時也不必遇事都由蔣介石來決定。在廖仲愷未被刺以前，一切問題有他周旋于汪、蔣之間，還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廖仲愷被刺以后，汪精衛做他的主席，蔣介石搞他的軍事，双方就有些貌合神離的樣子。特別是在第二次東征時，蔣介石在前方作戰，关于黃埔軍校、廣州衛戍司令部、新成立的海軍局等軍政機構的人事調配以及其他重大問題，都由汪精衛負責處理。汪、蔣之間的关系到这时就更加疏遠了。

当时蒋介石的几个亲信人物之间也有内部矛盾。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是一个贪污腐化、狡黠诡譎的人，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梓及海军方面的陈策、欧阳格等勾结一起，狼狽为奸。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同西山会议派也有联系，他们的首領是蒋介石。王懋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原是許崇智部的一个旅长，以出卖許崇智、投靠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任为第二师师长並代理广州衛戍司令。但王懋功与王柏龄以权利冲突，积不相能。王柏龄到处攻击王懋功，說“王东成是以‘反水’起家的，校长相信他，将来是要吃亏的”。王懋功对王柏龄也是一样，逢人便罵王柏龄是“一个貪財好色、貪生怕死的小人，打仗的逃跑將軍”。他們見面时相互笑罵为“狗屎”。王懋功与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为了走私的問題，也有利害冲突。王懋功与广州市公安局长吳铁城为包賭、包烟、包娼的問題也有矛盾。他們彼此之間几乎相視如仇人。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大本营直轄的海軍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都沒有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海軍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局长、处长职务，由參謀团与国民政府商洽决定，派张靜愚为航空处处长，李之龙为海軍局局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軍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武汉、上海等地工作过；国共合作之初，他在广州曾担任过鮑罗廷的翻譯。黄埔军校成立后，他奉共产党的命令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第二次东征軍出發时，他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轉任海軍局局长（沒有經過蒋介石的同意）。他当了

海軍局局长以后，把陈肇英走私的勾当，报告了汪精衛。汪精衛就下了一个手令給海軍局，严禁軍警机关走私，並令海軍局厉行緝私。李之龙奉命之后，即把虎門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扣留起来，人員拘禁，貨物充公，陈肇英以下有走私嫌疑的人員，都受了处分。这样，陈肇英就与李之龙結下了不解之仇。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間我任教导师党代表期間，有一次同蔣介石、王柏齡（当时是教导师师长）到虎門、东莞检閱部队时，陈肇英由广州同我們一路到虎門。陈肇英当时一面向蔣介石訴苦，一面託王柏齡央求我向李之龙說項，希望李不要与他为难，請他把船只放回。

李之龙兼中山艦长，也是爆發“中山艦事件”的原因之一。这只兵艦原是永丰兵艦，因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先生曾在永丰兵艦避难，改名中山艦，是为了紀念孙中山先生蒙难的。陈策、欧阳格都做过中山艦艦长。它是国民政府惟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艦，也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自从李之龙兼任中山艦的艦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軍警机关和人員，都是一个威胁，在蔣介石看来也不順眼。因此，李之龙就成了众矢之鹄了。

黄埔軍校沒有建立預算和決算制度，开支經費都由蔣介石信笔乱批。他用錢的手面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齡当教育长时，也和蔣介石一样，狂嫖烂賭，还有三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王柏齡調教导师师长后，邓演达繼任教育长，把王柏齡任內亏空的情形报告了蔣介石，並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因此王柏齡与邓演达結成了不解的冤仇，所以后来中山艦事件發生时，邓演达也曾被監視起来。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举行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事先，黄埔軍在汕头选举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选举完全采取

自由选举的办法，用无記名投票的方法进行。选举結果，当选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当选者較少，連賀衷寒也落选了。选举完結以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們就罗唆起来。蔣介石看見共产党如此得人心，也大吃一惊。他就硬派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团、营长十余名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並打电报給国民党中央及汪精衛轉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汪精衛把蔣介石的請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資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並报告大会通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經开过两天，蔣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只出席大会作了一次軍事报告，其余的会都沒有参加。代表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举中央委員。在选举之前，汪精衛在黄埔軍校召集了一次党軍系統的党团會議，参加这个會議的是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方面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表，一共不到二十个人。汪精衛召集这个會議的主要动机，是要听取蔣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見。但是蔣介石始終緘默，不表示任何意見。冷了半天的場，汪精衛才开口說：

“党軍方面的候选人，我們希望蔣先生能提出意見，我們的意見是，除了蔣先生及何敬之（应欽）同志應該当选外，还有王茂如（柏齡）、王东成（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蔣介石就截断了汪精衛的話头說：“我还是在軍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員，也不應該当中央委員。一个軍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軍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斯基。王柏齡和王懋功更沒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員，我倒沒有什么意見。”蔣介石从开始一直到散会，态度始終很不自然，好象是有千言万語說不出来的样子。

第二次全国代表會議以后，有一天早晨，王懋功到东山去見

蔣介石彙報公事，蔣介石突然下令解除王懋功衛士的武裝，並送他三千元的旅費和一張船票，限令他即刻上船，驅逐出境，即以劉峙調升第二師師長。後來據錢大鈞說，沈應時（蔣介石的親信，二十師的副師長）有一次問蔣介石關於處置王懋功的原因，蔣介石笑着說：“王東成的環境不好，為了保全他，所以教他離開廣州。”

（二）

蔣介石在潮、梅底定後，把軍事、政治都作了一番新的佈置。在他準備回廣州之前，新右派就天天製造謠言，說什麼“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又說什麼“汪精衛、王懋功都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準備倒蔣，正在黃埔軍校查賬，說蔣介石有貪污”；還說什麼“國民政府準備宣布共產，所有私人財產都要沒收”。諸如此類的含沙射影、挑撥離間的謠言還有很多。我最初聽到的這些謠言，是從王柏齡那里播弄出來的。

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前，我同王柏齡都在東莞駐防，彼此來往頻繁。有一天他約我在他家里吃晚飯，飯後他的話匣子開了，談了很多嫖經和賭經，最後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老兄，你知道嗎？昨天毛縣長（東莞縣長，蔣介石的大舅子）從廣州來，聽說廣州方面反蔣的謠言很盛，你聽到什麼消息沒有？”我聽了覺得很奇怪，便說：“誰反蔣？這個謠言從那里來的？應該追究一下。”他又說：“你大概是裝糊塗吧，這個謠言老早就有的。你想，除了汪精衛，誰還能反蔣呢？天下竟有這樣不平的事，校長東征西剿打下來天下，他做了主席，今天還要反蔣，真是豈有

此理！”我接着說：“这样的謠言，我确实沒有听見過，如有，真應該严查究办。”他又說：“那你真是孤陋寡聞了，这些謠言，不仅广州有，东莞也有。”我越听越覺得离奇，就說：“如果你的話真有根据，汪精衛就是自找死路，广东的军队不都是我們的嗎？”他才哈哈大笑說：“可不是嗎？”

当夜我回到政治部，即打电话到广州方面問情况，好几处的电话都沒有打通，最后打到我家里問夏松云，因为她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常同陈延年同志一塊兒工作，如有什么事，她可能知道一点。她在电话里說：“今天下午还在文德路彙报工作，广州方面並沒有有什么特殊的新聞。”我是一个神經過敏的人，听了王柏齡所传的謠言，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王柏齡，据司令部的值日官說，他一大早回广州去了。我更感到奇怪，即召集各团中我們的負責同志到政治部彙报。我把王柏齡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也听到同样的傳說。总的情况表明，这些謠言多半是出于王柏齡的亲信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口。这样一来，我認為問題應該搞清楚，我即准备回广州。但是那几天刚刚湊巧有暴風雨，商船淨了江，我回广州或回黄埔都沒有船，电话也不通了。我即打电报給校长和校党代表，說我因有要公面陈，請派船到东莞接我。

第三天，黄埔軍校派来一只小火輪到东莞来接，我即坐船先到黄埔去看蔣介石。約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我即笔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会見蔣介石，向他报告說：“王师长已回广州去了好几天，我从王师长、毛县长及其他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奇怪的謠言，說广州有反蔣的空气，又說校长与党代表有矛盾。我听到这些謠言，感到奇怪与不安。我想这些謠言很危险，即令仅仅是謠

言，也應該進行查究，予以澄清。如果是事實呢，那就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我們就要着手鎮壓。”蔣介石聽了我的話之後，帶着微笑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的意見當然不錯，不過我還沒有聽到這樣多。我今天夜晚要給學生講話，我們一路到校本部去，你可以同鄧教育長談談，並要他給你安排住宿、吃飯。”我說：“我同校長到校本部去看過鄧教育長後，即就原船回廣州，我還要去看看汪黨代表。”我們就一路步行到了軍校。我同鄧演達除了寒暄以外，談了一點關於二十師訓練的情況。我同鄧雖然認識很久，但是一直沒有交談過，這是第一次打交道，我們也不便深談。我辭出後即坐原船到了廣州。

我回到廣州家裏的時間還不到七點，即打電話給汪精衛說我要去看他。汪精衛親自接電話，他說：“周主任新從汕頭回來，我約他在國民政府吃晚飯，同席的有陳公博、繆斌，請你也來吃晚飯。”我馬上到國民政府，同他們見了面，閒談了一下就吃飯。吃完了飯，談了一些不着邊際的問題就散了，因為有繆斌、陳公博在坐，我要說的話也不好同汪精衛說。臨散時，我同汪精衛約定明天再去看他，說有一些人事上的問題請他決定。他答應說：“校長今天夜晚就回來，我明天早晨到他家裏去，你也來一起談談好不好？”我答應了，才分手。

我從國民政府出來即到文德路去找陳延年同志，他正在主持工作彙報。夏松雲也在坐，她告訴我說：“前天夜晚你在電話上說的話已報告給陳延年同志了。”我把陳延年同志拉到另外一間房裏，把王柏齡在東莞酒後所說的一切都告訴了他。陳延年同志說：“我想這是新右派製造的謠言，王柏齡就是謠言的發動機。他現在既在廣州，你也可以在廣州多住些時，同他多多接

近，看他还說些什么。你得到什么情况，同傅烈同志联系。”傅烈同志是四川人，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广东建立的一个情报机构，即由他負責。当夜我等夏松云开完了会一路回家，她說：“广州市这几天風平浪靜，你疑神見鬼幹嗎？”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因同汪精衛有約，急急忙忙地吃了点东西，就跨上車到东山蔣介石家里。我进門正遇着汪精衛从楼上下來，他表示很誠懇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說：“政治訓練部需要一个副主任，因为陈公博兼職太多，工作很忙，政治訓練部的工作又多，他顧不了，要一个副主任負实际責任，我想請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如何？这个工作比二十师的工作重要一百倍，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复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葫蘆里卖的什么药，我就很世故地回答說：“我对工作完全服从汪先生的意旨，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見，不过我从东莞回来，有一些情况要給汪先生报告。我們什么时候談？我希望快一点。”他看了表，迟疑了一下說：“已經九点半鐘了，十点鐘我还要到中央党部开会，今天沒有時間，明天早晨再通電話約時間好了。”我也只好同他分手，上車回家。

汪精衛为甚么要調我当政治訓練部的副主任呢？这是一个新發生的問題。因为当时党代表的职权很重，不仅有監督所屬人事、經費的权責，还有权監督同級主官，在必要时可以作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級。这样的制度認真执行起来，主管人事、經費的师长、团长、連长，就不能剋扣軍餉，也不能随便动用經費、任用私人。当时蔣介石所用的中上級幹部大多数是保定軍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云南講武堂出身的僱傭軍官，都是以升官發財为目的的；为了革命而来参加这里軍事工作的，除了共产党

人而外，那就寥若晨星了。共產黨員為革命事業而忠實執行革命政府的法令，是絲毫不苟的，尤其各級黨代表在士兵同志中的威信很高，他們誰都知道任何命令沒有黨代表副署是無效的。各級將領大部分都是作賊心虛，所以對黨代表制度都感到惶惶不安。為了便於私圖，他們就設法破壞這個革命制度，陰謀取消黨代表。最初他們不敢公開直接反對制度，就先從反對人、反對共產黨員開始。蔣介石為了防備共產黨人，就提拔一些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如繆斌、張靜愚、賀衷寒等任黨代表。他們這些人當了黨代表，無非是同那些同級軍官一起吃喝嫖賭。蔣介石和王柏齡等想把二十師的共產黨人都排擠出來，好造成他們的清一色的黑暗勢力，所以同汪精衛談到將我調職的問題。

有一天大早，王柏齡到我家里來找我，態度很頹喪。他還沒有坐下就開口說：“黨代表，事情搞壞了，我們在東莞酒後亂談的那些話，你就認真地報告了季山嘉顧問，季顧問就当成了一樁大事，告訴了汪黨代表。汪黨代表很生氣，他跑到校長家里辨別是非，並指定是我造謠生事。校長是什麼也不知道，今天五點鐘就打電話要我去，大發雷霆地罵了我一頓，還要我把事情的經過和消息的來源，當面向汪黨代表報告明白。我當時對校長說：‘話不是這樣說的，包黨代表可以作證。’我想請你替我負點責任，不然我恐怕呆不下去了。”他說到這里，幾乎要哭出來。其實我並沒有見季山嘉，季山嘉的消息是從陳延年同志那里得來的。我便答复王柏齡說：“我沒有見季顧問，你同我講的話，我是報告過校長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同汪黨代表講。我認為這樣的事是要搞清楚的，應該追查消息的來源。我請校長查究謠言的來源時，校長還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既然話說穿了，你就

應該把謠言的來源向校長和黨代表說明白，這樣，不就完了嗎？還要我負什麼責任呢？”他又說：“這個話講的人很多，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一個傳一個，沒有那一個能負責交出真實憑據來。如果一個一個地攀扯起來，牽涉的人很多，反而不好。我想只好請你對校長說，這些話不是我說的，或者說不是我一個人說的，就減輕了我的責任，校長就不會對我生氣了。”我心里想，這個家伙天天在那里製造謊言，還要我替他扯謊。我又顧慮到如果我不敷衍他一下，對於將來的共事就是一個裂痕。我就答應同他到蔣介石那里去一趟。

我同王柏齡一路到了蔣介石家里，蔣介石的態度還很平靜，他帶笑地問我：“你同季顧問怎樣說的呀，叫汪先生感到不安。”我回答說：“我沒有見季顧問，我也沒有同汪黨代表談這個問題，我僅把我聽到為謠言報告校長。”蔣介石聽說我沒有見季山嘉，就有点奇怪的表情，他說：“你們去看看汪先生，把話說清楚，叫他安心就好了。”我們坐了一下，就一同去看汪精衛。汪精衛不在家，我們就分別回家。

我們在廣州一連住了三個星期，中間陳肇英還來看過我一次。我問他：“船放回去沒有？”他說：“沒有。”我告訴他說：

“我同李之龍說過，他說要請示主席再決定。”陳肇英很不高興地說：“我看他總不能沒收吧，這又不是那個私人的東西，就听他去吧。”我因為以前到虎門檢閱軍隊時，他曾經隆重地招待我們，為了還他的情，我就請他在我家里吃晚飯，還請了王柏齡、詹大悲作陪，打了八圈麻將。第二天他又請我們到西園吃飯，隨着，王柏齡又請我們吃飯。我同他們這樣昏天黑地地混了幾天，而不知道他們就在這幾天中發動了三月二十日事變。

(三)

三月二十日早晨約在八點鐘前後，新任二十師副師長林振雄同入伍生團團長張叔同先後到我家來看我。他們向我說：“外面有几條馬路戒嚴，從惠州會館到造幣廠這一帶斷絕交通，十字路口都架着機關槍，第五團全付武裝向省議會急進（海軍局在省議會內），不知出了什麼事故，黨代表知道嗎？”我听了他們的話，想不出是什麼事故，就打電話到蔣介石家里問情況，接電話的是蔣介石的秘書陳立夫，他說：“校長不在家。”林振雄、張叔同走后，我再打電話到蔣介石家里問消息，還是陳立夫接電話，他這次才告訴我說：“校長昨天夜里三點鐘就出去了，不知是處理一件什麼緊急公事，他此時在造幣廠。如果有事，你可以到造幣廠去見他。”我又打電話給王柏齡，他家里沒有人接電話。

約在十點鐘左右，我把所有的情况用電話報告周恩來同志。他為了明了情况，就到造幣廠去見蔣介石。他帶着四個武裝衛士，到了造幣廠就被繳械。周恩來同志見着蔣介石，蔣介石告訴他說：“李之龍及中山兵艦有叛變的嫌疑，幸亏發覺得早，李之龍已被捕，中山艦解除了武裝，第一軍的所有共產黨員，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已集中看管。”

周恩來同志從造幣廠回家之後，他同我通了電話，我馬上到他家里彙報情况。周恩來同志叫我去看看王柏齡和劉峙（第二師師長），去了解一點他們的情况。

我去看王柏齡時，他家里警衛森嚴，樓上樓下都布滿了武裝衛兵。他住在文德路附近新建的一所房子里，與李之龍是樓上下鄰居（李之龍住二樓，他住三樓），到他家里要從李之龍的門口

过。順便看去，見李之龙的房門开着，並沒有一人，家具什物都是乱七八糟，好像抄了家似的。我通过警衛崗哨到三樓見到王柏齡，我問他：“茂如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怎么不打我一个招呼呢？”他得意洋洋地說：“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衛、季山嘉勾結在一起，要把校長騙上中山艦送到俄国去。中山艦正在升火待發的关头，被我們發覺了，即將中山艦解除武装，李之龙已被捕了。我們大家都很憤慨，如果他們要抵抗的話，那就是一場血战了。”我問：“同海軍局打嗎？”他說：“也許不止是海軍局吧。”我就又順着他的語气問：“就你所說的情况来看，就應該把汪精衛、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他說：“校長不肯这样幹，汪精衛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師。”我同他又胡扯了一番才辭出。

到了下午七八点鐘的时候，全市已戒严，我又去看刘峙。刘峙見面，也很客气。我同他握手坐下，問他：“今天究竟是怎么样的的一回事呀？”他到是很平心靜气地說：“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長的意思为意思，校長命令我幹什么，我就幹什么。”我們不着边际地談了一会，我就回家了。

我剛到家，夏松云就告訴我說：“陈延年同志派人來通知，叫你少出門，夜晚不要住在家里，行动要簡單輕便一些，不要坐汽車，不要帶衛兵，也不要到他那里去，有事他派人來通知你。我們門口有几个便衣偵探来来去去，你知道吗？”当天夜晚我在西濠口亞洲旅館开了一个房間住了一夜。我們共产党人一連也紧张了几天。

事后才知道，中山艦事件，完全是王柏齡、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梓、吳鉄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三月十九日下午，蔣

介石回广州，当夜三时（即二十日上午三点鐘）到造幣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級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佔領海軍局，並解除海軍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佔領中山艦並解除中山艦武装的任务；吳鉄城所部監視汪精衛、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們預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們就以第二师、新編第一师（吳鉄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但是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的反动阴谋沒有預先料到，也沒有作任何准备，事出突然，所以我們在任何方面沒有反抗。就是刘峙把第二师各級党代表捆起来的时候，大家还都很从容地說：“我們問心无愧，不知为了什么？見了校长再說吧。”这些被捆綁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是周恩来同志到造幣厂看見了，向蔣介石提出質問，蔣介石才下令把他們解开了。蔣介石当时还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說：“誰叫捆他們的？豈有此理。”

李之龙新婚不久，十九日夜間陈肇英、王柏龄带着十几个人破門而入，他夫妻俩从睡梦中惊醒，被他們从床上拖到地下，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頓，然后捆了起来。李之龙最初喊叫，他們就在李之龙的口里塞滿了乱紙破布。陈肇英还亲自动手打李之龙和捆李之龙，並且吆喝着說：“校长的命令，把这个忘八蛋捆紧些。”蔣介石把李之龙关了很久，才释放他出来，派他随北伐軍到前方工作。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政府时代，李之龙曾經写过一篇“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①，揭發蔣介石这一阴谋活动。

① 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統一战线》，171—18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山艦事件以後，蔣介石以排擠共產黨人爲目的，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黨務整理案”，並解除了季山嘉的聘約。但蔣介石在這一次事變後不久，即將王柏齡免職，限令立即離開廣州，以錢大鈞繼任二十師師長。陳肇英也被免去虎門要塞司令，並責令離開廣州；吳鐵城被免去本兼各職，送虎門要塞監禁。歐陽格、陳策、徐桴等都受了處分。蔣介石曾親自到汪精衛家裏，好像是負荊請罪的樣子，表示仍請汪精衛繼續負責。汪精衛稱病，表示消極，從此既不問事，也不見人。約在四月中旬，汪精衛輕裝簡從，悄悄地離開廣州，乘船到了香港。事有湊巧，汪精衛由廣州上船時，正遇着胡漢民也搭乘這只船到香港。胡漢民自廖案發生之後，與許崇智被驅逐離粵的同時，就被蔣介石軟禁在黃埔，到此時才釋放出來。從此，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局面就開始形成了。

記舒宗鑒等談中山艦事件

覃 異 之

关于中山艦事件的真相，我曾从当时任民生艦艦长的舒宗鑒先生和任黄埔軍校軍械处长的邓士章先生处了解到一些情况。他們都是当时亲历这次事变的人。下面是他們（主要是舒宗鑒先生）所談的情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夜間，舒宗鑒接到海軍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电话，要他把民生艦开到黄埔候命。当时民生艦正在河南进行小修，他把这一情况向李說明后，李說：“蔣校长有命令，急于要用，你还是开去吧。”第二天（十八日）上午他去看李之龙，想問明白这次究竟担負什么任务，李也不知道。

十八日下午，舒宗鑒遵照命令把民生艦开到黄埔碼頭，中山艦也随后开来了。两艦开到后，他和中山艦代理艦长张慎桐都先后到黄埔軍校教育长邓演达那里去詢問，邓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两艦調来，叫他們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問參謀长王蔭（蔣介石的老师）。于是，舒宗鑒便去找王蔭，可是王蔭当时也搞不清楚，后来才通知他說：“民生艦的任务是装运軍火。”同时邓士章也接到紧急通知，要他把庫存的軍火迅速装上民生艦。邓士章說，当时他为这件事很着急，还匆匆忙忙临时找了許多女工来搬运的。当时装上民生艦的軍火，据舒宗鑒回忆，計有三八式步槍一万支、俄式重机关槍二百挺。舒宗鑒說，这是苏联接济中国革命

的第二批武器，当初这批武器运来时，也是派民生艦去接运的。

民生艦把軍火装完以后，就奉命开到黄埔对岸的新洲海面停泊。中山艦在黄埔停泊不久，就开回广州去了。可是，当天（十八日）夜間，中山艦又开到黄埔来，但是这次並沒有停泊在黄埔軍校碼頭，而是停泊在省河的东保村海面。舒宗鑑說：“当夜我接到欧阳格的一封信，通知我說他奉广州衛戍司令（蒋介石兼）的命令，担任艦队指揮官兼中山艦艦长，要我和中山艦协防。值得注意的是，中山艦原来的艦长就是欧阳格的哥哥欧阳林，是在当时不久之前被欧阳格吓跑了的。由此可見，欧阳格企圖掌握海軍实力，是有預謀的。我接到欧阳格的信后，心中很怀疑，便到要塞司令部去見王參謀长，想問明情况。正談話間，陈繼承（第一軍第二师团长）匆匆进来报告說：‘据报中山艦要攻击黄埔軍校。’大家正在疑惑，又有一人进来报告說：‘中山艦企圖逃走。’当时我不知道究竟要發生什么事情。”

十九日一早，中山艦已开到黄埔碼頭。舒宗鑑便按照海軍礼节，到中山艦去看欧阳格。舒宗鑑說：“我登上中山艦，大吃一惊，看見所有海軍的党代表都被捆绑起来了，同时又看見不久之前因走私案被撤职的虎門要塞司令陈肇英也在艦上，得意洋洋地同欧阳格在一起，我心里感到不解。欧阳格看出我的惊異情緒，便馬上对我解释說：‘这是政治問題，与带兵的人无关。’”

舒宗鑑从中山艦回到民生艦后，約在上午九、十點鐘的時候，蔣介石就由广州乘江風号汽艇来到黄埔。舒宗鑑說：“当时蔣介石先到民生艦查看軍火是否装載妥当，並对我說：‘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把軍火交給任何人。’他离开民生艦后就到要塞司令部去，大約一小時左右，又乘中山艦向虎門駛去。二十日上

午，張靜江由廣州乘小汽船來到黃埔海面，他問我：‘蔣校長現在那里？’我說：‘昨天中午乘中山艦到虎門去了。’大約中午時分，中山艦又由虎門開回黃埔，蔣介石和張靜江一起離艦到了黃埔軍校。”

蔣介石在他所布置的这个阴谋实现以后，接着又玩弄了一套手法，把欧阳格扣押起来，把这次事件的责任推到欧阳格身上，說是受了他的蒙蔽，並且發表電文解釋誤會，表示認錯，企圖借此掩蓋天下人耳目。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則繼續造謠說共產黨企圖用中山艦把蔣介石送到蘇聯去，以混淆視聽。記得蔣介石曾在軍校的軍官飯廳對軍官們說：“這個事件（指中山艦事件）我現在還不打算公布，將來我死了之後，你們會知道的。”儘管蔣介石對於他一手製造的這個栽贓陷害的陰謀自己不敢招供，儘管他怎樣設法蒙混掩飾，可是蔣介石是中山艦事件的主謀，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處心積慮、蓄謀已久、並且經過周密布置所製造出來的，用不着等到他死后再來做結論，這在當時已經是鐵証如山了。

滇桂战争

黃紹竑

滇桂战争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云南唐繼堯的部队以解决駐粵滇軍为名，想霸佔两广，首先侵入广西，与广西李宗仁、黃紹竑的部队在广西境内的战争。在这次战争里，参加李宗仁、黃紹竑方面的还有駐粵滇軍范石生的部队，参加唐繼堯方面的还有陆荣廷残部沈鴻英、林俊廷的部队。第二次是一九三〇年，站在蔣介石方面的以龙云为首的滇軍和以陈济棠为首的粵軍，与反对蔣介石的以李宗仁、黃紹竑为首的桂軍（即原第七軍系統）和以張發奎为首的粵軍（原第四軍系統）、唐生明为首的湘軍（原第八軍的一部分）在广西境内的战争。

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云南、广西、广东的局势：在未写滇桂战争本题之前，需要把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云南、广西、广东的局势叙述一下。云南自护国战争出兵四川，袁世凱死后护国战争结束，入川滇軍被以熊克武为首的川軍所反对，因而引起川滇战争。滇軍入川有两个軍，第二軍被川軍击败了，軍长赵又新战死。顧品珍的第一軍仍然很完整，他見四川的局势不能久駐，並受了熊克武的运动（云南在前清是受四川协餉的省份，熊克武答应仍旧协餉並筹开拔費，想利用顧品珍来倒唐繼堯），未奉唐繼堯命令就撤回云南，駐在滇东一带。唐繼堯見顧品珍的举动有異，乃用滇东督办的名义来羈縻他。顧尚犹豫，他的部下楊綏（团长）反唐

最力，对顧說：“要做就做督軍，做什么督办？”于是率兵向昆明进發。唐繼尧的大部实力都在顧品珍手里，无法抵抗。唐乃自动下野，經越南逃香港，往依中山先生。顧品珍为什么反对唐繼尧呢？主要是因为唐繼尧当时亲信陆军小学的学生，並把他的兄弟唐繼虞的地位提得很高，顧品珍的部下多是云南講武堂学生，心甚不平。

唐的部下李友勳（当时任警备司令）、龙云（当时任团长）拥唐最力，圖謀反顧不果，在云南站不住脚。那时正值孙中山先生討伐广西陆荣廷，到桂林筹备北伐，号召各省参加討陆和北伐。李友勳和龙云乃率領所部由滇南的蒙自县經广南府入广西的西隆县，繞入貴州的安順县、荔波县，从那里又进入广西，与黔軍谷正伦部队会攻柳州。他們沿途裹胁，已有七八千人。

唐繼尧根本就不信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北伐，他到了广州又回香港。他知道李友勳、龙云在柳州部队已有七八千人，就秘密来到柳州煽动他們回滇驅逐顧品珍。不但龙云、李友勳贊成拥护，連駐在桂林的滇軍李烈鈞部下的胡若愚、张汝翼也受了唐繼尧的煽动。他們率領部队共約一万多人，經庆远府，从广西境内向西进發回滇。这样，就明明是拆孙中山先生北伐的台。孙中山先生見他們背叛，就下令沿途部队制止。桂軍刘震寰私自把他們放过了（龙云与刘震寰的关系就在这时候發生的）。我們也奉到制止唐軍西进的命令，但我們正被广西自治軍击败，实力有限，駐在凌云县，对过境滇軍实无可奈何。我們的司令馬晓軍与唐繼尧是日本士官同学，反以礼貌相迎。李友勳在中途失队，被自治軍打死了，回滇軍隊全部为龙云掌握。唐軍进入云南，与顧軍在昆明以东作战。顧品珍在前綫督战中，被拥唐的土匪袭击打

死，顧軍因而潰退。唐繼堯重回昆明掌握了政权（这时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唐繼堯自封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大本营曾任命他为副元帅，他並沒有接受。这是云南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一段情况。

注：上面这段情况是根据龙云委員对我所說的来写的，我以前知道得並不詳細，其中仍或有錯誤遺漏。

顧品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虽然被打死了，他的部下还有很多不肯投降唐繼堯的，但在云南又站不住。那时正值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号召西南各省討伐陈炯明。顧品珍的部下如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范石生、蔣光亮等部（当时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是旅长，蔣光亮是警备司令，范石生、楊蓁是团长）响应中山先生討陈号召，由云南經貴州进入广西的柳州。那时广西陆荣廷（两广巡閱使）、譚浩明（广西督軍）皆已出走，由大本营委派的桂軍总司令刘震寰、省长馬君武亦因粵軍的撤退而离开广西。广西到处都是反对客軍的民团和陆、譚残部，总称为自治軍，公推林俊廷为总司令。他們以反对客軍入境为号召。三楊、范、蔣的滇軍經過广西境內时也受到他們的一些阻击，但終于由柳州經潯州下梧州，入广东討伐陈炯明。这就是一九二五年以前广西的概况。

陈炯明縮短战綫，以主力在梧州、肇庆之間佈防。入粵滇軍将其击潰，沿西江长驅直下，与粵軍許崇智部、湘軍譚延闓部会师佔領广州。陈炯明残部退往东江，固守惠州。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委任楊希閔为滇軍总司令，許崇智为粵軍总司令，譚延闓为湘軍总司令，刘震寰为桂軍总司令。滇軍盘据广州市，把持石井兵工厂和一切稅收机关，大本营仅能在河南（即广州珠江的南

岸)發号施令。当时滇軍在广州的气焰不但为粵人所痛恨，也为远在昆明的唐繼尧所不安。因为駐粵滇軍口口声声要為顧彼齋(顧品珍号)报仇，唐繼尧恐怕它实力日益强大，終有一日会要回云南搞他的乱。这就是一九二五年以前的广东概况。

第一次滇桂战争

唐繼尧对两广的野心：唐繼尧前次在四川失敗后又被顧品珍赶跑，現在虽然重回云南掌握政权，但对于四川已不敢再問津了。貴州、云南都是南方貧瘠的省份，他虽自己称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但这样的局面是不能滿足他的慾望的。那时两广局面正如上面所述的那样混乱，入粵滇軍都是他的旧部；三楊、范、蔣虽与他作对，但他們的部下各級幹部都与他有千絲万縷的历史关系。因此，入粵滇軍一方面是唐繼尧的仇敌，唐恐怕他們将来回云南替顧品珍报仇；一方面又是唐繼尧駐在广东的潛在力量，可以利用来霸佔广东。据龙云委員說：“当时楊希閔部下的廖行超(楊的主力旅长)、蔣光亮部下的赵成梁(蔣的主力旅长)，早就联络好了。”又值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大本营由胡汉民(那时廖仲愷被刺案尚未發生，胡尚未出国)、譚延闓、楊滄白、許崇智、程潛主持。这种好似群龙无首的局面，就引起了唐繼尧染指两广的野心。

唐繼尧出兵两广的兵力部署：唐繼尧出兵两广，是先分两路进兵广西，企圖把广西佔領之后再会师进攻广东。一路是由云南的广南府进入广西境，佔領百色县(右江上游的枢紐县份)，然后由右江沿岸直趋南宁，主力是龙云和胡若愚所部三万余人，号称五万，龙云任总指揮。一路由貴州的榕江县进入广西境，佔領

三江縣、融縣，然後沿融江右岸直趨柳州，先頭是雲南著名匪首吳學顯部七八千人，後續是唐繼堯、張汝翼主力三萬多人，亦号称五萬人，唐繼堯（唐繼堯的胞弟，叫唐三）任總指揮。

唐繼堯對李宗仁、黃紹竑的籠絡恐嚇：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李宗仁、黃紹竑部已佔有廣西梧州、玉林、潯州、南寧、柳州等重要城市，但桂林、平樂尚為沈鴻英部所盤據。沈鴻英與吳佩孚是有勾結的，實力頗大。李宗仁、黃紹竑部僅佔領柳州、南寧兩個孤城，城以外的地方仍為陸榮廷、沈鴻英的殘部所據。忽由香港來了一個雲南代表，是我們的同學，叫做文俊逸。他帶來唐繼堯的信，內容無非是黔桂鄰省、互相敦睦的一套應酬話，他並在口頭透露一些要假道廣西、解決駐粵滇軍的意思，主要是來觀察廣西情形，探探我們的口氣的。我與他應酬一番，他就走了。不久又派來一個代表叫高尚春，也是我們的同學，情形就大不同了。他帶來川滇黔聯軍總司令唐繼堯署名的委任狀，委任李宗仁為廣西第一軍軍長，黃紹竑為廣西第二軍軍長。他要同我們商量共同出兵解決駐粵的滇軍，並說：沈鴻英方面和駐粵滇軍的內部都已經由駐粵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秘密聯絡好，大軍一入粵境，他們就在內響應，要我們不要打沈鴻英。這些話雖然是对我們施行恐嚇，但也有些真實性。他的態度十分傲慢，開口閉口都稱聯帥，好似我們已經是他的部下似的。那時我們對沈鴻英的軍事行動正待發動，為保持秘密起見，只好暫時與他混，同時密電大本營預籌對策。等到討沈軍事行動已經發動，那姓高的知道事無可望，並受到我們的冷遇，乃悄然溜回香港，而唐繼堯的部隊也就動員入桂了。

討伐沈鴻英：在一九二三年這一年里，我們的戰略是聯沈鴻

英打击陆荣廷。因为当时陆荣廷再回广西重整旗鼓，他的资望老、实力大（沈名义上仍为陆的部下）、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均为其盘据。沈鸿英部仅据有平乐各属，我们仅佔有梧州、潯州、玉林等地。那时陆荣廷驻在桂林，我们利用沈鸿英去打桂林，把陆荣廷又一次赶出广西，我们则乘机攻佔桂州和南宁城，把陆氏重整起来的局面打破了。但沈鸿英佔領桂林，把陆氏赶走後，实力也大大增加，成为我们省内最后最大的敌人。唐繼尧出兵两广的野心既已暴露，我们就必须全力迅速地把沈军彻底消灭，才能有力量应付入侵的唐军。前两年我们对于广西内部为军事行动是不求助于粤军的，这回因为关系太大，我就同李济深商量（他是西江善后督办），希望他派兵共同討沈。他派陈济棠的一旅参加。討沈军事由白崇禧担任前敌总指挥。賀县战役的胜利是得助于陈济棠部队的。但粤军因顾虑广州西江下游的滇、桂军（即楊希閔与刘震寰两部，不久楊、刘即叛乱），所以在佔領賀县后就把陈济棠的部队調回去了。白崇禧帶領我們的主力佔領平乐，攻下桂林，一直追到湖南的城步县、武岡县，沈鸿英的主力算是基本消灭了。同时李宗仁在柳州方面也把沈军余部追到貴州边境。但是龙云的部队同时也入境，佔領百色县，沿右江向南宁前进。我手里沒有一些得力部队，怎么办呢？

用地方团体应付唐军和退出南宁：那时我军几乎全部追击沈军，远在东北的边境，确实无法阻止由西北乘虚入侵的唐军。我们只好授意省議會、商会和其他团体去电唐繼尧婉詞拒止。唐氏的复电有“本帅大計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等語。我们並訓令駐南宁伍廷闓所部（仅有一团）保存实力，等待敌人接近城边，才退出南宁，向宾阳县方向逐步退却，与敌人保持相当距

离，不可与敌人破裂，以迟疑敌人的进攻，等待主力到来，然后反攻。同时一面电大本营迅速派兵西上，並电白崇禧迅速回军。当时如果大本营能够迅速派兵增援，南宁是不至于退出的，以后的局势也不至于那样困难。

大本营派兵西上的考虑：大本营为什么迟迟不能派兵西上呢？自然是因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驻粤滇军虽说是因反对唐繼尧而出来的，但他們的内部与唐繼尧有很复杂的关系。当时广州的粤军、桂军、湘军、滇军，其中以滇军势力为最大，万一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大局。究竟派那省军西上呢？滇军的范石生平时口口声声要回云南为顧筱斋（品珍）报仇，要为他的父亲报仇（据范說，他的父亲是被唐繼尧害死的；但据龙云說，范的父亲要来广州，唐繼尧已發給出境护照並送了旅費，范父是因病在滇越边境的河口死的，与唐无关），范的总指揮楊泰又是当时顧品珍反唐运动的主謀者，自然以派范石生军西上增援为最恰当。这样並可以分散駐粵滇军的力量，而有利于以后的局势。但是等到大本营作出决定，時間已經迟了，我軍已經退出南宁。

范石生草拟的討唐通电：范石生部队由广州乘船到貴县集結，我同李宗仁到那里和他們商量，首先要發一个联名討伐唐繼尧的通电（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电文是范石生亲自起草拟的：“（銜略）去岁曹吳未灭，我大元帅孙公，以北伐討賊为职志，东撤惠博之围，予陈炯明以自新；西頒副元帅之命，予唐繼尧以振拔。陈既負固东江，不自悔悟；唐复按兵滇境，严拒宠命。及至曹吳复灭，我大元帅簡从北上，号召和平，为国憂劳，以致薨逝。正举国地裂山崩、痛悼哀毀之际，唐繼尧乃敢妄冀非分，擅自称尊，出兵豳龙，圖佔桂粵，希冀顛复我革命政

府，搗乱我西南和平。凡有人心，莫不髮指腎裂！本月佳日奉讀胡（漢民）、譚（延闓）、楊（滄伯）、許（崇智）、程（潛）諸公江日通電，殷殷于繼續大元帥遺志，努力革命工作，並力辟唐繼堯假借名義，禍國叛黨。足征整飭紀綱，義正詞嚴。宗仁等不敏，誓督飭滇桂子弟，力從諸公之後，為擁護我黨主義，先驅殺賊。海枯石爛，此志不渝！謹佈區區，諸維亮察！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范石生、楊綏同叩佳印”范石生本是清末秀才，後入雲南陸軍講武堂畢業，好談軍事，又好弄筆墨，自命能文能武，以宋朝的范仲淹自居，常用“軍中一范”的圖章向通信的朋友夸耀。

我們的戰略和部署：唐軍的計劃是分兩路同時佔南寧、柳州後，會師下廣東。但龍雲的部隊已佔領南寧，而唐繼虞的部隊尙逗留在貴州，未進入廣西境內，實際的時間相差一個多月。這樣就使我們能以劣勢的兵力（唐軍號稱十萬，實有六萬，我、范兩軍那時實數僅是三萬多人），得有從容應付的機會。我們的總方略是要把龍雲、唐繼虞兩部分各個擊破，在廣西境內予以殲滅，然後范石生軍乘勝回雲南驅逐唐繼堯。而對已經佔領南寧的龍雲部隊也是用各個擊破的戰略，首先把他突出在賓陽附近高田圩的部隊殲滅，然後圍攻南寧，把他的部隊全部殲滅。我率一部和范石生軍擔任這方面的攻擊任務，李宗仁擔任柳州方面的防禦任務，白崇禧則迅速殲滅沈鴻英軍，然後把部隊向柳州集中。

八塘二塘之戰：我們首先是要把龍雲突出在賓陽縣附近高田圩的部隊殲滅。范石生所部四個旅共約一萬五千人，由貴縣經覃塘圩、黎塘圩、新圩越過南寧、賓陽大路南側的高山，向南寧、賓陽大路（那時尚未有公路）的六塘、五塘前進，任務是截斷賓

阳附近敌人的后路和阻止南宁方面敌人的增援。我所部伍廷黧一个团、俞作柏两个团和邓竹林、罗浩忠两个多营共四千多人，由宾阳的正面进攻。我同范石生行军到了黎塘圩，这是两路的交叉点，分手的时候范石生对我说：“季宽，好兆头，我们一定胜利。”我问：“什么好兆头？”他笑着说：“昨天是覃塘，今天是黎塘，这样巧的好兆头，那得不胜利呢！”（“覃塘、黎塘”与“擒唐、犁唐”谐音。）我们大笑分手了。

我率邓、罗两营到了宾阳附近的河田圩伍廷黧的阵地，正与高田圩的敌军对峙着。俞作柏两团也由柳州调来，在宾阳城附近。我视察了地形，认为敌人占领着高田圩的隘口，地形险要，正面不易攻击，遂命令俞作柏率两个团绕到崑崙关的后面，与正面前后夹攻。高田圩敌人不得不向八塘撤退，而南宁增援的敌人共约四五千人也到了八塘，与我部的追击队伍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我们俘虏了好些人，敌军残部向南宁溃退。如果范石生军能如期到达六塘、五塘，那股残敌一个也跑不了，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二塘之战了。这时柳州李宗仁的电报来了，说唐繼虞所部的吴学显已经入境向柳州进攻，我们边境部队节节败退，柳州是一座空城，要我马上把俞作柏的全部调回去。我同范石生商量，范说：“季宽，不要紧！你尽管调好了，南宁方面我完全负责，你只带一些象征的部队到南宁维持治安好了。”范石生见我的兵力不大，枪械又不好，也能在八塘打了很大的胜仗，因此更增加他的骄气。我把俞作柏调回柳州，把伍廷黧和邓、罗等部调在五塘第二线整顿，支援范军对南宁的攻击。

八塘的残敌退到了二塘（距南宁二十里），与南宁龙云的主力在二塘占领阵地，准备决战。范石生军全力由拂晓战到午后四

五点钟，都未能将其击破，伤亡很大。范石生急了，写信要我部迅速增援。我軍离作战陣地尚有三十多里，正在前进中，楊蔡率領他的警衛团駁壳槍队从右侧高地方面把敌击破了，敌人退守南宁城和城北高地的鎮宁炮台（陆荣廷用鎮南关二十一生的大炮筑成的）。

围攻南宁城和失败：敌軍自二塘战败后，即固守南宁城不敢出战。南宁城南北尖长，好似一个橄欖形，南端紧临邕江，北端接連长崗岭的鎮宁炮台，城外的週围都有濠塹，攻击不容易。范、我两軍的兵力仅能控制东面和北面，而西面和南面仍然是敞开的。范軍担任北面到东門之綫，我軍担任东門到南門之綫。那时我們两軍各有两三門山炮，而且炮弹很少，不能用炮兵轟击。范石生用云梯爬城和用地道轟城，都沒有成功，徒受伤亡。城内除龙云全部之外，还有陆荣廷旧部林俊廷、譚浩清、譚澄（两譚都是譚浩明的同胞兄弟，譚澄是很勇敢的）二三千人。不久胡若愚所部万余人到了，我們料到他們必定出击，也电柳州把俞作柏所部調回来，尚在途中，敌人就出击了。

龙云利用譚澄为先鋒，縫城出击（譚澄陣亡），把范軍的一点突破，然后大队由北門、东門、南門湧出，我全綫都被冲破。范軍伤亡很大，被俘亦多，旅长楊萌陣亡（据龙云說，楊是受伤被俘，送医院后才死的，身上有港幣貳万元，除用以厚殮之外，还充了龙軍的軍餉）。我部在东門、南門之間，南临邕江，北方长崗岭高地既为敌人佔領並向邕江北岸压迫，我軍就不能向邕甯大路撤退，不得不由沿江小路撤退。范軍路途不熟，見我軍沿江撤退，也就跟着撤退。沿江溪沟多，路径杂，撤退極为困难。这时如果敌人銜尾直追，我們即使不全軍复沒，也就够受的了。幸

而龙軍突破之后不再追击，因为他的伤亡也大，同时，俞作柏部队也到了八塘附近，他不能不顧慮。这样，我們才能退到离南宁九十里的蒲庙圩北岸，想从事整理。我們到了蒲庙圩对岸，恐怕敌人追击，背水作战不利，我控制有汽船民船，就連夜渡过蒲庙圩，再整頓队伍。

偷襲南宁：龙云知我在蒲庙圩整頓，乃由南宁附近渡过邕江，由南岸向蒲庙圩进击（南岸的地势平坦，容易进军）。我与范石生、楊綏商量：敌人既然出城，我們把队伍整頓后，要决心与他决战。計劃已定，七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与楊綏到預定陣地上視察，見范軍仍然是零零落落，士气不振，尚未进入陣地，而敌人已到达陣地前方二十多里了，明天拂晓必定向我攻击，我們作战是很沒有把握的。我对楊綏說：“映波（楊綏号），这样怎么是好呢？”楊說：“我們回去同范軍长商量吧！”我主张把部队連夜渡回北岸，同时由我挑先鋒队（即由部队中挑选勇敢官兵）乘夜偷襲南宁，其余全部向南宁前进，使敌军对蒲庙圩扑空，又不能渡过邕江尾追（因船舶都在我手里），这样即使不能襲取南宁，一定迫使南岸敌人的主力退守南宁。这是反客为主、爭取主动的計劃，他們都很贊成。先鋒数百人于次日拂晓就到了南宁城外，向南門攻击。敌人紧閉城門，不敢出战，果然調南岸主力回城防守。这日黄昏，我們大队都到了，又把城的北面、东面围起来，恢复了前几天的形势。

楊綏的妙計：上次围攻的失敗，一方面是由于范軍的將驕卒惰，一方面是犯了兵法上的“頓兵坚城之下”的錯誤。这回重围南宁，范軍的驕气沒有了，而惧怕的心理却增加了。我們預料敌人不久必定出击，而且柳州吃紧，我軍又要抽調回去，决战是不

可能的了，怎么办呢？我們煞費商量。楊綏說：“敵人志在下广东，从我們軍隊現在的情况来看，正面很难阻挡得住，不如正面仅留少数監視部队，把主力撤至高峰隘（南宁北面五十里的高山）、甘圩一带险要山地，控制南宁城西北方面的側后，那里地形险要，容易据守，諒敌人不敢輕于攻击。即使敌人向我們攻击，我們可以向武鳴及右江右岸撤退，难道敌人把我們送回云南去嗎？如果敌人不顧我們而东下，我們就佔領南宁並在后面尾追。敌人一定不敢这样做，必定固守南宁，等待唐繼虞攻击柳州，然后会师东下。这样，我們不但可阻止龙云的东下，也有時間和力量先行解决唐繼虞的部队。”我們都很贊成楊綏这个計劃，立刻就秘密調动。不久龙軍也知道我們的計劃和行动，他們有人主张以主力向宾阳、迁江前进，策应柳州方面的唐繼虞，以一部坚守南宁，与范石生对峙。这原是很好的計劃，如果实行，真是要我們的命，但是为什么不实行呢？原因在于他們內部的矛盾。滇軍將領素来不滿意唐繼虞，如果唐繼虞軍在柳州胜利了，唐繼虞以联帅的胞弟地位，自然要在各人之上。因为这样，他們就在南宁坐視，不去策应，从而使我們柳州战役能够胜利。我这时因病須回梧州稍事休养，由李宗仁率鍾祖培前来接替。

柳州的防御战：我回梧州不久，柳州即告吃紧，唐繼虞、吳学显先后由貴州进入广西境內。李司令石愚在边境拒止，因众寡不敌，节节败退。敌人佔領三江县后，沿融江直下柳州。我急电白崇禧所部由湘桂边境赶回柳州，电李宗仁把伍廷翼、鍾祖培两部由南宁赶調柳州，电李石愚縮短防綫，固守柳州待援。不幸李石愚中弹陣亡，仅有张任民、石化龙、石楚琛等幕僚和林竹舫、呂煥炎所部两千多人防守柳州。柳州城西、南、东三面为柳江环

繞，形如半島，北正面兩江之間距離不過五六里，用很少的兵力就可以防守，我們很早就準備了堅固的工事，碉堡纔之外有外壕，壕里、壕外都佈滿毛竹簽，以代替鉄蒺藜。吳學顯所部七八千人初到，不知道情況，猛然一沖，不但被我們火器打死、打傷很多，很多士兵的腳底板也被毛竹簽戳傷。他們只好在外面坐困，我們也不出擊。

柳州的突圍戰：吳學顯既攻我不破，我又不出擊，他也重蹈我們圍攻南寧時“頓兵于堅城之下”的覆轍。他們也不知道我軍調動情況，戒備就很松懈，正在等待唐繼虞主力的到來。我們的援軍從南寧六天就秘密趕到了柳州的南岸（平常行軍要九天），我也由梧州乘船到達那里。我召集部隊長會議，決定次日拂曉出擊。那些部隊長說：“部隊連日強行軍太疲勞了，休息兩天再打吧！”我說：“萬萬不可以！敵眾我寡，他的主力還在後頭呢！必須在當前敵人不知道我援軍到達，不作戒備的時候突然出擊，才有把握將吳學顯擊敗，然後才有時間和力量應付唐繼虞的主力。如果遷延時日，吳學顯知我援軍到達而加戒備，唐軍主力又到達，即使白總指揮部隊（他是前敵總指揮）調來了，也沒有什麼把握。我們本着南寧攻城失敗的教訓，料定敵軍攻城日久，兵心已懈，而且還不知道我援軍的到達，必無戒備，出擊必定成功！”他們听了以後，再沒有什麼說的。我乃下令于次日拂曉由正面分兩路出擊，並以一部在上游渡過柳江向馬廠（城北十幾里）攻擊，截斷敵人後路。果然敵軍猝不及防，被我軍突破了，有些官兵還在散兵洞里抽大煙呢！復經馬廠方面的伏擊，吳學顯所部被解決了一半，其餘潰不成軍，向沙浦方面逃竄，據守沙埔圩，等待唐繼虞的主力到來。我軍乘勝追擊，追到沙埔圩就停止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的部队亦仅四五千人，出击时也有伤亡，如果再追击前进，就要与唐繼虞的主力遭遇了，于我军是不利的。沙塘圩是各方面道路的交叉点，北面二十里通沙浦圩，西面四十里通柳城县，南面四十里通柳州，东面二十里通东泉圩，直通中渡县，是白崇禧主力回来的道路。我令一小部监视沙浦的敌人，一部仍回柳州防守，主力向东泉圩秘密移动，集结待机。我这样处置，如果唐繼虞主力到得早，进攻柳州，我主力就在他的侧后攻击；如果唐军向我主力攻击，我就避免作战，逐步向中渡县撤退，与白崇禧主力靠拢后再行决战；如果唐繼虞主力到得迟，我就等白崇禧主力到来后再向沙浦攻击。

沙浦大捷：我在东泉呆了两天，唐繼虞的先头到达沙浦的北岸，白崇禧也到了中渡县城（距东泉六十里）。我在电话中和他商量，他主张用他的主力由中渡绕过沙浦江北岸，配合正面作大包围的攻击。我主张把他的主力调到正面，增强正面的攻击，仅以一小部队扰乱敌人的后方。我说：“敌众我寡，当前我正面的兵力尤为薄弱，很难挡得住敌人主力的进攻，如果正面被敌人冲破了，你的大包围不但没有作用（因由中渡绕到沙浦有八十多里路，又不好走），而且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彼此争持得很厉害。最后我说：“我是总指挥，你要尊重我的意见，要服从我的命令！”他才把主力向东泉开拔，以一小部扰敌人的后方。

八月初的一天拂晓，我们决定向沙浦攻击，不等唐繼虞主力全部到来，就将其各个击破。以林竹舫所部担任正面攻击，以鍾祖培所部担任左翼攻击，伍廷颺所部担任右翼攻击，吕焕炎所部为总预备队。自早晨攻击至午后三四点钟，都没有什么进展。右翼伍廷颺部队与敌人争夺一个制高点——白马山，五得五失，还

沒有解決。敵人在沙浦江上架起浮橋，源源增加，情況極為危急。這時白崇禧主力才趕到，把白馬山拿下來，炮兵也在白馬山上放炮，向沙浦江的浮橋轟擊，全綫同時攻擊。敵人全綫動搖了，向沙浦圩退却，想渡江北竄，但浮橋被我炮兵轟斷了，只好束手繳械；有些被擠入江里被水淹死了，浮屍滿江。敵軍約有二千餘人繳械，二千五百餘人被俘，傷亡約千餘人。殘敵向長安鎮方向逃竄，與唐繼虞後續部隊匯合。我軍傷亡亦很重。這是在廣西統一的戰爭中最劇烈的一場。

唐吳殘軍西竄：唐、張、吳所部滇軍經過兩次失敗之後，實力損失三分之一強，但殘部尚近兩萬人。他們退到三江县附近整頓後，並沒有北向貴州退却，而是由融縣、羅城向慶遠西進。我們忖度他們的企圖：第一是想由慶遠經都安縣、隆山縣、武鳴縣，與南寧龍雲部隊匯合；第二是想由慶遠向河池縣、東蘭縣、鳳山縣西進，循着唐繼堯以前走的道路回雲南。但是當時貴州的盧焱（廣西人）、周西城已經轉向與我們合作了，他們退向貴州，必有顧慮。因此我們不去尾追，而將主力撤回柳城縣，渡過柳江，在其南側平行西進，直趨慶遠，以阻斷其竄往南寧的道路。果然在慶遠附近又作了一次很激烈的戰鬥，他們才向西退走，回到雲南。

我在柳城生病很厲害，要回梧州醫治，將軍隊交由白崇禧指揮追擊。白崇禧說：“敵人雖然兩次戰敗，但剩下的力量尚不可輕視，必須再有一兩次激烈戰鬥，才能將其粉碎。我不是推卸責任，恐怕你回去之後，士氣要受影響呢！不如你帶病在前方，由我負實際指揮的責任。”可見我們對滇軍一點也不敢輕視。我說：

“我不但要回去醫病，最主要的還有籌餉問題，沒有飯吃怎能打

仗呢？”他再没有什么說的。我回到梧州，病虽然好了一些，但前方要餉的电报似雪片般飞来。自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到一九二五年的七八月，整整一年，各方的战事沒有停过，真是罗掘俱穷了。正是走头无路的时候，南宁前方来了一个电报，說是城里的滇軍偷运出一大批烟土，約有二十多万两，为我截获，真是喜出望外，絕处逢生，把我的难关渡过了。云南盛产鴉片烟，部队向外省出發的时候，軍中都带有很多的鴉片烟，也有軍队自己的，也有商人的。軍队走得越远，获利越大，比如在昆明一两烟土，带到广州就可获利十倍。有些是把烟土折合当地价格，当作餉銀發給士兵，叫做“黑銀”。南宁的滇軍也許是知道下广州是沒有希望了，就把烟土卖了出來。那时烟商是主要的商人，商会会长个个都离不开鴉片烟的关系，他們有方法通过战綫銷向各方，但这次被我們截获了。

范石生的整軍和楊綏的被害：范石生自南宁失败后損失很大。他深知道他的軍队腐爛，士气不振，就决心在对峙的时候徹底加以整理。我把在柳州两次战役中俘获的云南兵三千多人，全部送給他补充缺額。他的整軍首先是戒烟。范、楊以及范軍其他高級將領沒有一个不抽大烟的，我有时到他司令部商量問題，都是睡在烟舖上同他談話的。上次南宁失败、夜間撤退的时候，范軍士兵把烟灯都点亮了，就好似一支很大的提灯队。他們烟癮發了，就睡在路旁撑开雨伞遮風，抽几口再走。我以前讀《二十年目睹的怪現狀》形容八旗兵說：每个兵有两枝槍，一支是大槍，一支是烟槍，不料几十年后我看見的范軍也恰是这样，真是可笑可嘆！戒烟自然要由他們自身做起。其次是訓練和构筑防御工事。楊綏在范軍是一个指揮者，对部下要求过严，有时不免处罚

不当，部下的怨恨都集在他一人身上。据说他下令限期构筑工事，但在他视察的时候工事尚未做好。他大怒之下，就把那些部队长罚跪在阵地上，大骂他们，並限令要部队在两小时内把战壕挖好，否则还要重办。他走后，那些部队长说：“山高石多，就是两天也筑不成战壕。”他们就議定把楊綦杀死。范、楊住在一个关帝庙里，一天晚上一群官兵拥入关帝庙。范石生知道情形不好，想出来拦阻。那一群官兵把范石生推开说：“軍长，不关你的事。”他们把楊綦拖出庙外，打成半死。那一群官兵去后，楊在風雨下大声呼救。范慑于官兵的声势，也不敢施救，楊綦就这样地死了。后来楊綦的两个兒子认为他父亲是范石生有意害死的，他们为父报仇，在昆明把范石生打死了（那时范已不做事，住在昆明）。

龙云退出南宁和范石生回云南的失败：龙云之固守南宁，是等待唐繼虞在柳州方面的胜利，然后会师下广州。他知道唐繼虞在柳州失败，逃回云南去了，他也就退出南宁，逃回云南。范石生軍和我軍在后面追击。范石生就想乘胜回云南驅逐唐繼尧（这是一九二五年中秋以后）。范石生回云南是否得到大本营的同意，我不清楚。如果大本营有計劃要范回云南驅逐唐繼尧，一定会命令我們协同他进兵云南，但我的确沒有得到大本营的命令，而仅是以朋友的关系相协助。当时范石生見龙、唐的狼狽潰退，他的驕气和自信又十足了。他对我們說：“貴軍追到边境就好了，云南内部我已联络好，我一进去，孟友蘭（是当时云南省内最有力量的軍人）就会响应。我驅逐唐繼尧是沒有問題的。”他这样說，一方面是自信力很大，以为他一定可以单独回云南，一方面是怕我軍同入云南，将来霸住云南不走，于他不利。他是个

多疑的人，在那时环境之下这种顾虑可能是有的。我們那时真是弄得精疲力竭，内部又待整理收拾，不要我們同去正是求之不得，也就只送到边境，由他单独回云南去了。

范石生軍进入云南广南府附近，与龙云残部作战，孟友闓不但不起而响应，反从他的侧面加以袭击。范的全軍几乎尽灭，退回广西境的恩隆县整理，剩下來的仅有二千多人。一九二六年的秋天（那时北伐軍已克武汉），范石生回到南宁見我，我請他吃飯，他斟了六大杯茅台酒对我說：“季寬兄，今天没有什么可說的了，你够朋友的話，同我喝完这三大杯酒！”我只笑笑，也没有什么可說的。我把三大杯茅台酒喝完后，当夜發了急性盲腸炎，几乎把命送了。他的残部不久也开往湖南。第一次滇桂战争就这样結束了。

第二次滇桂战争

第二次滇桂战争發生于一九三〇年的秋天。在这以前的云南、广西的局势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九二五年唐繼堯軍隊入侵广西，沒有成功，潰敗回云南；范石生乘胜率兵回云南，也沒有成功。云南仍然是唐家的小天下。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軍北伐，过了长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唐繼堯部下的軍长胡若愚、张汝翼等主张順从南京，改变云南独立的状态。他們以反对唐繼堯为名，压迫唐繼堯，欲夺取政权。唐繼堯見情形不好，不得不將他的兄弟唐繼虞解除职务，避往国外，並把省长的位置讓出，由省議會选举胡若愚为省长。在那年（一九二七年），唐繼堯也就因病死了。云南部队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若愚为首的，一派是以龙云为首的，唐繼堯死后，他們

彼此就火併起來。因而引起川軍（刘文輝部）入滇，黔軍（周西成、猶國材部）入滇，云南局面非常混亂。經過一兩年的混戰，結果龍雲勝了，統一了云南。蔣介石委龍雲為省政府主席兼軍長。從此云南是龍雲的天下，站在蔣介石方面。

一九二九年秋，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與張發奎聯合反對蔣介石，出兵廣東，攻打廣州，與陳濟棠、陳銘樞、朱紹良等部隊作戰，失敗後退守廣西。在廣西的戰事雖互有勝敗，但梧州為陳濟棠的軍隊佔領，玉林為呂煥炎部佔領（呂原是李、黃部下投靠蔣介石的，蔣任命為廣西綏靖督辦），李、黃、白、張僅保有桂林、平樂、柳州、南寧的殘破局面，繼續反蔣（經過情形很複雜，另題寫出）。一九三〇年夏天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馮玉祥、閻錫山都參加反蔣。蔣介石全力對付馮、閻，武漢空虛。汪精衛來電要廣西出兵長江，直搗武漢。其時黃紹竑尚在右江的恩隆縣（即平馬）與紅七軍李明瑞部對峙着，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三人就決定以全部出兵湖南，直搗武漢，廣西各地能守則守，否則全部放棄，並要我迅速放棄右江，回南寧繼續出發。我沒有參加會議，有意見，但不能不服從大眾的決議。我通過賓陽的時候，余漢謀的軍隊已經很迫近，隨即佔領南寧柳州的公路，電信交通就隔絕了。

蔣介石知道我們的計劃和行動後，一方面命令陳濟棠的軍隊佔領賓陽，截阻我們南寧方面的部隊北進；一方面命令龍雲出兵廣西，攻打南寧，搗我們的後方。

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唐生明（八軍系統）乘虛佔領長沙，向岳陽前進。蔣介石縮短戰綫，固守岳陽，李、白、張、唐的力量有限，不敢進攻。同時蔣介石又命令陳銘樞、陳濟棠的部

队由广东佔領了衡阳，把我与李、白、张、唐截为两段，李、白、张、唐不能不由长沙撤退。我們在衡阳作战失败，退回广西，实力大受损失。

云南为什么再出兵广西呢？这固然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不能不服从，最主要的是因为云南的军队太多了，本省养不活。他們在一九二五年侵桂虽然失败了，仍想重园旧梦。这时他們以为我們军队全部都进入湖南，广西各地沒有兵力防守，可以垂手而得。于是就任命卢汉为总指揮，率領四个师（师长孙度、张冲、魯道源，卢自兼一师）入广西，先佔領百色，沿右江直下，攻击南宁城，不久就任命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南宁城我們仅有韦云淞所部两三千人固守，滇軍屢攻不下，包围坐困了半年有余，直到那年冬天，我們由湖南潰败回来才去解围。

南宁城被滇軍围困半年多的期間，粮食沒有了，拿黑豆来充飢，仍然固守不肯投降（后来广西军队用黑豆节来紀念南宁的固守）。我們在桂林、柳州稍事整理之后，即以主力去解南宁之围，由白崇禧任总指揮。

那时余汉謀部队佔領宾阳，宾阳在柳州、南宁之間，不先把宾阳收复，怎样能去解南宁的围呢！我們知道余汉謀的力量相当强，工事也相当坚固，攻击是不容易的，乃以一部佯攻宾阳，主力从宾阳北方进入上林县。那时滇軍佔領武鳴县城、高峰隘直到南宁城之綫，我軍以一部从上林县佯攻武鳴城和高峰隘，主力則由上林县与宾阳县之間的小路偷入南宁、宾阳路上的五塘，向南宁前进，与城内守軍内外夹击，把围攻南宁城的滇軍击潰了。南宁之围解了，滇軍向右江撤退。

我軍的行动，滇軍不是不知道的，他要求余汉謀增兵駐五

塘。余汉謀口头上答应了，但是不实行。滇軍以为余汉謀与我們暗里有勾結，故意放开五塘讓我軍去打他。其实当时我們与余汉謀並沒有勾結，而是余汉謀在宾阳被我軍佯攻牵制住了，不敢派兵到五塘。滇軍的实力並未大受損失，但他誤認為陈济棠、余汉謀与我們既有勾結，滇軍就沒有胜利的希望。这是撤退的主要原因。

滇軍沿右江北岸整队撤退，我軍銜尾追击，追到恩隆县附近，滇軍猛烈反攻，把我軍击退了。我軍因子弹很少，要避免激战，白崇禧就把部队渡过右江南岸，隔江向百色追击前进，結果是我軍先到达百色（后来我們叫这次追击是隔江竞走追击）。滇軍从百色城的东北方轉到百色通貴州路上的邏里圩整頓。卢汉在那里把四个师縮編成四个旅，把多余的士兵遣散了，把多余的坏槍械焚毀了，然后退回云南。第二次滇桂战争就这样結束了。

註：第二次滇桂战争其中某些情况是与龙云委員、卢汉委員談后写的，可能有遺漏和錯誤。

刘鎮华的一生

米 暫 沉

刘鎮华这个既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的軍閥，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河南解放、刘茂恩（刘鎮华的五胞弟）率領其残部和全家逃往台灣为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北洋軍閥統治时期，刘鎮华作了八年陝西省长，兼了三年督軍，还加上围攻西安八个月（同时围攻三原六个月）。国民党統治时期，刘鎮华作了長時間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茂恩又作了河南省主席。对于刘鎮华的起家和活动加以叙述，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謹以陝西人的身份，就个人記憶所及，加以叙述。但我对于刘鎮华在大革命以前这一段历史知道得較多，因此着重叙述这一段；刘鎮华在北伐以后的历史以及本文叙述不尽翔实的地方，希望熟悉情况者再作补充。

以出卖民党、投靠袁世凱起家

刘鎮华，河南巩县人，清末附生，兄弟七人，他居长。辛亥前他由当时直隶省保定府的法政專門学堂監獄科畢業后，充任河南省法政專門学堂的庶务长，参加了当时反滿民族革命的活动。由于他是豫西人，民党派他担任和王天縱等人的联络工作。

陝西的辛亥起义，發生在那一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九

月初一日），是武昌首义以后响应最早的省份之一（另一省是湖南，也在同一天，其他地方都在此以后）。而河南由于清政府的统治力量较强，虽然在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初三日曾在开封闹过一次，但经清政府捕杀了一批人就被镇压下去了，一直没有搞起来。

陕西辛亥起义之后，清政府派了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当时陕西军政府派了秦隴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和敌人在陕豫边境进行拉锯战，潼关失而复得者三次。在张钫第一次打出潼关的时候，刘镇华、丁同声和王天纵等河南民党人士，率领豫西一带的民间自发武装组织先后参加了张钫的秦隴复汉军，并随同张钫的部队对清军第二镇王占元部、第六镇周福林部和毅军赵倜部共两万余人作战。

刘镇华参加张钫部队后，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决定裁兵减政，原因是军队太多，系统复杂，地方的财力实际上负担不了；另一原因是当时以为皇帝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用不着这样多的军队，若干军人纷纷解甲归田，或者辞去军职，前往日本留学。

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是由原来的正规新军改编的而外，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方的自发武装组织，其中以豫西一带人为最多，原来就是跟刘镇华、王天纵这些人来的。

在裁兵方针之下，张钫部队需要裁下来四五千人之多。一下子裁编下来这么多人，如事先没有适当的安排，势必影响到地方治安。当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以刘镇华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并把裁下来的军队改编为豫西地方部

队，分駐在豫西河南府屬、汝州屬、陝州屬二十二县（即現在的閿乡、灵宝、陝州、新安、澠池、洛阳、巩县、汜水、嵩县、登封、临汝、宝丰、魯山、郟县、卢氏等县）。因为这一地区靠近嵩山，就把这一支部队名之曰鎮嵩軍，归豫西觀察使統轄。这样，刘鎮华就以豫西觀察使兼了鎮嵩軍的統領。統領之下編三个标，第一标分統柴云陞，第二标分統张治公，第三标（即騎兵标）分統慈玉琨，此外还有一个砲兵营，全部共計四千余人。

刘鎮华对于清末官場鑽营奔走、投机取巧的一套非常嫺熟。他既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兼軍事的地位，又有豫西一塊地盘，就一方面对袁世凱表示忠順，取得袁的信任；一方面整飭与扩充鎮嵩軍的部队，以厚实力，因而不久就搞成了一个小的軍事集团，成为豫西一隅的封建主。

袁世凱和民党鬧翻之后，發生了所謂二次革命。黄兴派楊体銳前往豫、陝聯絡民党，策划反袁。楊体銳带了黄兴致刘鎮华和陝西民党負責人张鳳翽、张鈞的信件，路經河南，先見了刘鎮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轉往陝西。作为民党的刘鎮华，在楊体銳走后，却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楊体銳，把楊帶給张鳳翽、张鈞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凱告了密，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卖了民党和把他介紹給袁世凱的当年直接长官张鈞。刘鎮华就这样取得袁世凱的信任，进一步参加了进步党，成为袁世凱盜国称帝的忠实拥护者。陝西督軍张鳳翽的垮台和张鈞的被袁世凱一度拘禁，都与此有关。

一九一三年白狼（亦称白朗）在豫西起事之后，刘鎮华首当其冲。因为他对白狼剿办不力，被袁世凱下令撤职，戴罪圖功。到了白狼在陝甘受挫、再回豫西、行将瓦解的时候，刘鎮华在

陝、豫交界的富水關、太平溝打了一仗，結果吃虧不小。及至白狼在魯山病歿，劉鎮華派人掘屍梟首，而對他的上級報告，却說是他如何派人秘密打入白狼內部，偵知白狼行踪，因而派部隊里外夾攻擊斃的。劉鎮華就這樣騙得袁世凱的相信，明令開復原官，授陸軍中將，並得到勳五位的表揚。從此，劉鎮華進一步露出頭角，成為袁世凱面前的一位紅人。後來雖有人向袁揭露劉鎮華謊報軍情，但袁念其在富水關作戰尚稱奮勇，免予置議了事。

投機取巧，盤踞陝西八年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盜國稱帝，激起了全國人的反對，而劉鎮華却始終支持袁世凱。當時陝西的督軍是袁的親信、被稱為“陸屠戶”的陸建章。陸為了對袁效忠，在陝西殺人如麻。著名的陝西民黨王紹文、南南山、張深如等十八烈士，就是被陸建章殺掉的。陝西民黨以井勿幕為首的護國戰爭，在陝西叫做“逐陸之役”。在這次戰爭中，因陸建章的兒子承武（少文）所率領的“中堅團”在富平縣被胡景翼打垮，陸承武本人並被活捉，陸建章迫於他的兒媳（當時吉林督軍孟恩遠的女兒）大鬧，不得不請出地方大紳景涵九、郭希仁、寇錫三等和英國浸禮會的邵牧師出來調和。條件是：一方面陸建章讓出陝西督軍給陳樹藩，另一方面，陝軍交出陸承武，並保證陸的家族生命和財產安全離開陝西。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二十章中所說的情況（見該書第二冊202頁），與事實不符。

陳樹藩當時任陝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因剿辦白狼有功，是陸建章剪除異己後剩下來的一支陝西部隊。陳樹藩曾對陸建章遞過門生帖子，對陸極其恭順。陳一方面樹立了獨立旗幟，驅

取得督軍的地位；一方面为了对得起老师，护送陆建章携其眷屬和在陝西掠奪的大量金石、字畫、古玩、烟土，滿載了三千余輛大車，浩浩蕩蕩地出了潼關。

陳樹藩竊得督軍地位之後，就倒行逆施起來。在袁世凱死後，他有一個電報還說“項城為中華民國不祧之祖，共戴之尊”，引起了陝西人極大的不滿。以後段祺瑞當國，陳樹藩以保定速成學生的資格，作了安福系反動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成為督軍團活動的重要分子之一。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冬，就發生了以耿直、曹世英、胡景翼、張義安等為首的反對陳樹藩的戰爭。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就成立了以于右任、張鈞為總、副司令的統一的陝西靖國軍。

一九一七年冬天靖國軍圍攻西安的時候，陳樹藩岌岌不可終日，就以陝西省長的地位，換取得劉鎮華率領他的鎮嵩軍入陝來支援。這個時候，劉鎮華也早已投到段祺瑞門下，和陳樹藩屬於同一派系（安福系）。陳、劉既商量好這樣辦法，段祺瑞自然同意了。於是劉鎮華率領了他的鎮嵩軍開進了陝西，表面上對陝西人說他是出來調停，實際上，他一到陝西就擔任了陝西省長的職務，並立即派出鎮嵩軍增援陳樹藩的部隊，到鄂縣和張義安作戰。

陳樹藩借外力以自保，引起陝西人的極大不滿，也成為陝西省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六年長期禍亂的根源，在陝、豫兩省間種下一個時期內互相報復的種子。

一九一八年冬，北洋政府為了消滅在當時比較進步的北方靖國軍，動員了八省的軍隊，向陝西靖國軍發動了總攻擊。劉鎮華的鎮嵩軍就成為八省軍隊中的豫軍。此外還有直軍張錫元、奉軍許蘭洲、甘軍陸洪濤、川軍劉存厚、綏遠軍、晉軍等，連同陳樹

藩的陝軍共為八省軍隊。在這樣複雜的混戰中間，劉鎮華以省長而且領有一部分軍隊，極盡其縱橫捭闔之能事，從而擴大了他個人的勢力。

一九二〇年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打敗了安福系之後，為了擴大直系的勢力，以閻相文為陝西督軍，帶領第二十師（師長閻自兼，後改任閻治堂）、第七師吳新田、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後改為第十一師）入陝驅逐安福系殘余勢力陳樹藩。就在这个时候，劉鎮華一方面秘密向直軍表示忠誠，願意幫助直軍解決陳樹藩；一方面仍對陳樹藩表示支持。最後，他出賣了陳樹藩，使直軍很快地佔了西安。劉鎮華的省長地位不只沒有受到影響，而且趁火打劫，擴充了他自己的力量。

閻相文作了陝西督軍，整天抽大煙不理事，甚至許多日子不起床。馮玉祥代替了閻相文的職權，陝西人叫做“馮煥章包辦了閻煥章”（閻相文也號煥章）。劉鎮華看准情況，一方面在馮玉祥面前表示艱苦朴素，听命唯謹；另一方面對閻相文、閻治堂、吳新田却大量供給煙土，在一起吃、喝、嫖、賭，百方拉攏。對於閻相文、馮玉祥、吳新田、閻治堂周圍的一些人物，劉鎮華也並沒有放鬆工作：大一點的，固不必說；就是秘書、參謀、副官乃至馬弁之類的小人物，劉鎮華也都能處得很好，對他們稱兄道弟，送這送那，以至於替他們安排家務，體貼入微。劉鎮華在同這些人相處中，表現出驚人的耐性，這些人往往對劉鎮華當面下不去，但他從不計較這些所謂小事，因而這些人和劉鎮華都很接近。

一九二一年夏馮玉祥誘殺了陝西一個軍事頭目郭堅，使陝西的軍事局面陷入僵持狀態而一時無法處理，吳佩孚對閻相文罵的

很厉害，加上馮玉祥不断向閻相文要餉，逼得閻相文不久就吞了許多大烟自杀了。

閻相文自杀之后，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当时有許多陝西人判断，以馮的作法，刘鎮华这一回恐怕再維持不下去了。但其結果並不如此；刘不只維持住他的省长地位，而且在馮离开陝西时，还把督軍交給了刘鎮华。

前边說过，刘鎮华非常嫻熟于投机取巧、鑽营奔走的一套，在陈树藩作督軍的时候，刘鎮华和陈树藩一样，穿着长袍馬褂，扣子不扣。到了閻相文入陝以后，刘鎮华看清楚“馮煥章包办了閻煥章”，就很快地改变了办法，穿一套布制服、布鞋，很早地就起来跟他的軍隊上操場。甚至于基督教的礼拜堂里，刘鎮华也常去，至于邀請馮玉祥由外地弄来的一些著名基督教人士如馬伯援一类人物到他的部队講話，更是常事了。到馮玉祥接任督軍的时候，刘鎮华居然成了馮的結拜弟兄。有时开什么大会，刘总是跟馮一同出席，状甚亲密。馮在大会講話的时候，常常当面贊揚刘省长的政績和为人。这些事实証明，刘鎮华已取得馮玉祥的信任。

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發生的时候，馮玉祥奉曹、吳的命令，帶領他的第十一师开往河南和赵倜作战。馮在临行以前，他的督軍职务既沒有交給陝西人，也沒有交給和他一路到陝西的直軍第七师师长吳新田和第二十师师长閻治堂，而是交給了刘鎮华。这其間固然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曹、吳的意見，吳新田、閻治堂在直系的資历尚浅，刘在陝時間已久，且有一些軍事力量等等，但馮玉祥在这一处置中还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这說明刘鎮华投靠直系的成功，更說明馮玉祥对刘鎮华的信任。从此，刘鎮华成为陝西的督軍兼省长、陝西省最高的統治者，一直延續到一

九二五年，达三年之久。

“刘兼座”的“政績”

“刘兼座”在八年省长、三年兼督軍的这一期間，在陝西究竟作了些什么事呢？

一、在軍事上，刘鎮华以陝西人民的血汗养活与扩充了他的鎮嵩軍，拐回头来用鎮嵩軍打陝西人。从一九一七年冬天跟陈树藩打张义安起，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和閻治堂、吳新田打楊虎城使靖国軍最后結束止，刘鎮华的部队是靡役不从的，对陝西人作了残酷的屠杀。此外，他还拉攏收編一部分为陝西人所反对的軍人敗类，如将麻振武（即麻老九）改編为鎮嵩軍第六路，就是显著的例子。

二、任用了一批河南人在陝西作官發財。根据当时陝西郵政局（那时鉄路还不通，也沒有銀行）的統計，由陝西給河南、特别是河南巩县、嵩县的匯款数字，特別突出，匯水之高，据郵局的職員談，是極少見的。这說明刘鎮华及其部队在陝西剝削的一斑。

三、在政治上，刘鎮华自始至終是拉攏在当时的政治分野上屬於保守落后的一批官僚文人，来和比較进步的地方人士相对抗。如以馬凌甫为省議會議长，並由馬轉而組織起一部分右派議員，当时有所謂“馬腿”、“馬尾巴”、“馬头”等等，以支持他的政权。比較进步一些的議員則組織了“正誼社”来反对刘鎮华的暴政。此外，以刘楚材为建設厅长，勾結陝西旅外学生团体“进化系”的落后分子，利用他的胞弟刘老六在欧洲留学的方便，以官費或私人津貼拉攏收买陝西在欧洲的少数留学生。他还

杀害了陕西进步人士彭仲翔（世安）等。

四、在文化教育方面花样更多了，刘兼座是常以他在陕西文化₂与教育方面的建树自負的。这里只談几件突出的事情：1.刘鎮华任內所委任的教育厅长先后有郭希仁、馬凌甫、楊西堂、景志傅等落后人物，致西安的教育情况，死气沉沉，远远地落后于刘鎮华統治地区以外的渭北和陕北。2.和郭希仁一批落后人物大搞孔教会，命令各校学生参加祀孔。3.以陕西人民的大量金錢，成立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西北大学，聘請他的河南老乡傅銅（佩青）来作校长，安插了一批落后文人和河南老乡。4.最有趣的是在一九二四年那个时候，刘鎮华还“好心地”为陕西人請来康有为到西安“講学”。康到西安后，刘鎮华待以上宾之礼，他躬亲陪同康聖人（当时陕西人是用这样带有諷刺性的名子称呼康有为的）坐着轎子遊覽古蹟名胜，到处作詩題字，在孔教会講学等等。这还不算，有一天，省长公署通过教育厅长景志傅命令西安各校师生到易俗社听康聖人講演。当然，对于康有为这样的人，西安的学生也並不怎样陌生，在教育厅的通知公佈以后，学生群情譁然，認為“刘兼座”在和学生开玩笑。經過学校当局的說服动員和威吓，学生们既不敢不参加，也还想借此机会看看“骨董”。那一天是教育厅长景志傅主持大会的，“刘兼座”也站在台上。經過主席对康有为的道德文章大事吹嘘一番之后，康有为出台了，白髮白須，穿着一件兰緞长袍、青馬褂，头上带一頂瓜皮帽，帽頂上綴一个很大的紅色帽結。他这种怪样子一出現，立即引起学生們的哄堂大笑。康聖人倒沒有有什么不安，“刘兼座”看見情况不好，站起来很严肃地命令学生鎮靜听講。康聖人开腔了，他滿口广东話，因而請了一位陕西富平人张某作翻譯。康講的是“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的“則”。康第一段剛講完，翻譯正在翻譯的時候，學生們就紛紛退席。劉鎮華命令門口的衛兵阻止，這還不行，有的學生從窗子跳出去跑了。最後劉鎮華命令軍隊包圍了易俗社，這才勉強留下稀稀拉拉的一些人聽完了講演，这一幕好歹就此了結。更糟糕的是康聖人此番到陝，不只吞沒了許多人請他鑑定的金石字畫一類文物，而且還準備把西安臥龍寺一批宋版佛經帶走。消息傳出之後，引起了陝西省內外學術文化界人士的反对，電報、傳單、宣言、警告等等文件滿天飛，一時反对康聖人盜經問題，鬧得滿城風雨。結果是康聖人盜經不成，悄然离陝以去；“劉彙座”也弄得非常难堪。

投奔閻錫山，伺机再起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結果，在北方出現了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為首的國民軍，推出安福系頭子段祺瑞為執政。劉鎮華在這個時候，就命令他駐在豫西的部隊解決了吳佩孚的一些軍隊，以表示他和國民軍的合作與擁護的“誠意”。於是，劉鎮華又背離了直系，再回到安福系。

一九二四年冬，當胡景翼被任命為河南軍務善後督辦、沿京漢綫南下的時候，劉鎮華所屬的憨玉琨部（這時已編為第三十五師）駐紮在鄭州和黃河南岸，希圖阻止胡景翼南下。因胡部已派另一支部隊由鄭州黃河下游北岸渡河佔了開封，並在黃河以北的漳河打敗了直軍寇英傑部，憨玉琨才把他在鄭州的部隊向西撤退，集結在洛陽以東地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景翼到鄭州就了督辦職務。

胡就取以後，為了統一河南的政治軍事，首先需要和劉鎮華

研究解决憨玉琨的驻地问题，曾经请张钫从中调解。胡的条件是：让刘镇华把憨玉琨部调到陕西，胡部在陕的部队调到河南，互换防地，使彼此的军事行政都能统一起来。这样，陕人治豫，豫人治陕，互相帮助与合作，为地方做些有益的事情，照说，问题是可以这样解决的。但是，憨玉琨坚决不同意，刘镇华表面上依违两可，实际在支持憨玉琨。原因是：刘镇华在这个时候，主要以陕西人民的血汗，已经把他的镇嵩军由原来的四千余人扩充到十万以上，远比胡景翼当时的实力雄厚，加上又有段祺瑞对刘的某种支持。于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初，就爆发了所谓胡憨战争。

战端既启，刘镇华以出巡为名，把军政职务交给吴新田，他自己督飭在陕西境内所有的镇嵩军去增援憨玉琨。经过黑石关、虎牢关等地的几度激烈战斗之后，战事很快地以刘、憨失败而告终。结果，憨玉琨在嵩县发狂以死，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运城，成为閻錫山再一次对付国民军的工具。

刘镇华到了山西运城，被閻錫山收留下来，到有利时机再放出去，作为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的筹码；并且掌握到像刘镇华这样一类在军事政治上有作用的人物在自己手头，对外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或者作为对外讨价的工具。閻錫山收留下刘镇华后，不到一年时间，又把他放出去打垮了岳维峻。跟着閻錫山又收容下岳维峻，又一年工夫再放出岳维峻到陕西。隔了两年，閻錫山又把馮玉祥诱骗到了山西，然后再放出馮玉祥和他一路反蒋。老奸巨滑的閻錫山是玩惯了这一套手法的。

刘镇华在山西受到了閻錫山的优待。閻答应在一定的時候对刘镇华帮忙。在直奉两系軍閥吳佩孚、张作霖酝酿联合消灭北方国民军的时候，刘镇华通过閻錫山和张作霖、吳佩孚取得联系。于

是刘鎮华又回到直系，而被任命为豫陝甘剿匪总司令。

卷土重来，圍攻西安

一九二六年初，河南督办兼国民第二軍軍长岳維峻率領他的部队败退到豫西、准备回陝西的时候，刘鎮华便以豫陝甘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在豫西招集散在各地的鎮嵩軍旧部、土匪、紅槍会、大刀会，並以閻錫山供給的少数槍支和大量山西兵工厂造的炸弹，把这些烏合之众武装起来，在陝州、灵宝地方，打垮了岳維峻的部队。岳維峻只身逃往山西，成为閻錫山的俘虏。当时的陝西軍务督办李云龙（虎臣）和国民第二軍第三师师长田玉潔，因到河南援应岳維峻，也只身由灵宝过河經山西，化装逃回陝西。

刘鎮华就这样很快地編組成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部队，計张治公一軍、王振一軍、梅發魁一軍、柴云陞一軍、张得胜一軍，此外还有一些直屬部队和特种兵。刘鎮华指揮这一支十万人的部队西向潼关进發，演出了一場历史上少有的圍攻西安八个月的残酷战争。

在这个时候，陝西关中地区的情况是这样：

国民軍第三軍第三师楊虎城的部队，因为不屬於国民第二軍岳維峻的系統，始終未离开陝西，依然是一支建制完整、战斗力非常强的部队，当时正在西路和吳新田的第七、第八两师作战。

除楊的部队以外，其他陝西軍隊几乎全部屬於国民第二軍系統，当岳維峻和直奉两系軍隊作战时，所有精銳部队都开出潼关到前綫作战。这时留在关中地区的几乎都是一些留守部队，系統極其复杂，力量也非常分散，沒有人可以統一起来指揮作战。而

由关外缴械归来的军人，虽然满腔悲愤，但败军之将，惊魂未定，急切中还顾不得筹划如何抵抗敌人。

加上在陕西境内还有和敌人勾结的内应，一方面是当年“刘兼座”所豢养的一批所谓地方大绅，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散佈失败谣言，以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少数军人已经和刘镇华有了勾结，如在同州的麻老九匪部，当刘镇华以往在陕西的时候，曾被刘收编为镇嵩军第六路，胡憨战争之后，由李云龙又收编过来。就在这紧急关头，麻老九再一次接受了刘镇华的编制。驻蒲城的蕨章保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上述情况之下，陕西东路门户——潼关就不战而为敌人所有。潼关不守，从潼关至西安近三百里间，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到了四月初，刘镇华的匪军就兵临西安城下，著名的坚守西安战争，从此开始。

当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西安城内只有督办李云龙所属第十师的一个旅、四个独立团和陕西陆军第四师衛定一部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共计还不到五千人。李云龙刚由关外归来，一部分人建议暂时放棄西安，徐图整理反攻。就在这样举棋不定的时候，西安一批过去受刘镇华豢养的地方大绅就组织了一个什么“和平期成会”，派出代表去见他们当年的“刘兼座”表示欢迎。为了使刘镇华更体面一些，他们请刘镇华稍停一下，等西安原来的李、衛部队全部撤走之后，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刘雪帅”（刘镇华号雪亚，当时一部分人乃至吴佩孚给刘的电报都这样称呼）进城。刘镇华从这些所谓地方大绅方面已了解到西安城内的情况，满以为西安已在掌握之中，自乐于在盛大欢迎之下，来一个入城式，那确实体面多了，也就同意了这样的办法。

刘鎮华原来所率领的鎮嵩軍，本来就是豫西一带的一个惯匪集团，和孙士貴、王泰、崔二旦之类並沒有本質上的区别。鎮嵩軍过去在陝西各地駐防情况，陝西人是領教过的，不过那时畢竟还叫做軍隊，而且有它的正常供給制度，刘鎮华为了維持他的統治，也还不能不加以約束，因而作恶还有一定限度。但这一次情况变了，从出台的人物来看，还不外是张老幹（治公）、柴老八（云陞）、王老五（振）等人物。因原来的鎮嵩軍已在胡憨战争中潰散，急促之間，又搞起十万之众，分子构成更極其复杂。他們在号召的时候且有“打到陝西去升官發財”的說法。加上当时刘鎮华虽然在吳佩孚領導之下，但吳也並沒有那末多的錢給刘鎮华打發这十万人的开支，事实上刘鎮华也就不能不讓这些烏合之众“就地征發”了。这末一来，刘鎮华部队所过之处，廬舍为墟，陝西东路各县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灾难。

刘鎮华的部队对陝西人民大肆屠杀，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胡憨之战刘鎮华就失敗在陝西軍隊手里，所謂刘鎮华的高級幹部，都是身遭失敗的人，時間很短，記憶犹新，到这时候进入陝西，具有翻身报复的思想，因此对陝西地方蹂躪更甚。

刘鎮华匪軍的暴行，激起了陝西人民的憤怒；陝西人民要繼續生活下去，就必須和刘鎮华匪軍拼命。人民的要求，很自然影响到陝西軍人，于是各軍事領袖在陝西三原开会，研究联合抵抗問題。

前边說到，楊虎城的国民軍第三軍第三师在当时是陝軍唯一的建制完整的部队，不只战斗力極强，而且和当时陝西的进步力量合作得很好。当岳維峻、李云龙、田玉潔被刘鎮华截阻在豫西的时候，楊虎城在西路得到消息，立即放棄了对吳新田的追击，

把部队撤到三原和临潼、渭南河北地区，准备出兵潼关，接应岳维峻被困之师。但是因为岳部在灵宝、陕州失败很快，而麻老九在同州作了敌人的内应，以致潼关又告不守。因此，现在所要考虑的已是西安守不守的问题了。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当时陕西进步力量（即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一九二四年夏天，在陕西就有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当时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负责领导的是魏野畴、雷晋笙。到了一九二五年，学生运动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以吴新田部顾琢堂旅打伤陕西省第一中学学生为开端的驱逐吴新田运动，陕西青年开始走上了革命战线的第一线，和杨虎城的部队配合起来向敌人斗争。到了这一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五卅”惨案发生以后，更把陕西的青年运动推向高潮，和全国青年运动打成一片。当时就在三原杨虎城部队驻地成立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指挥全省学生运动。随着驱吴运动的胜利，青年学生运动有了轰轰烈烈的开展。

另一方面，杨虎城的部队里一九二五年在耀县设了三民军官学校，学校部分军官是杨部保送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並任命陕西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为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吕佑乾、刘含初都在学校教政治课。杨的部队就这样和进步力量密切地联合起来。

在敌人兵临城下、谣言繁兴、部分地方大绅筹备欢迎刘镇华入城、当局者撤守未定这样危疑震撼情况之下，杨虎城召集他的高级将领李子高、姬匪百、孙蔚如、冯钦哉、魏野畴等人在三原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结论是：刘镇华在吴佩孚支持之下，大举入陕，这是吴佩孚、张作霖整个反动军事计划的一部

分。姑無論就当前的全国形势來說，或就陝西人民的願望來看，对刘鎮华給以迎头痛击，都具有革命意义。以当时的軍事力量密切和群众的革命运动配合起来，胜利是有把握的。

楊虎城就根据上述分析，在渭北进步力量热情支持与西安各进步团体欢迎之下，率領了他的一部分軍隊很快地进入西安，稳定了战局。这是刘鎮华初料所不及的。

西 安 攻 守 战

楊虎城的先头部队是四月十六日从西安北門进城的。正在等候西安紳士欢迎入城的刘鎮华，發現楊虎城的部队（这一部队自从一九一七年参加靖国軍起，部队的軍帽是紅圈，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特殊标志还保存着；刘鎮华原来率領的鎮嵩軍一到陝西，就和戴这样軍帽的部队作战，繼續不断地互相对垒达七八年之久，因之極容易識別）从三原向西安移动，大为惊讶，立即命令他在三树弯一带的前綫部队向西安东部进攻。原在东部的守軍，受到压迫，紛紛向城内撤退，情况極其危急。楊部入城部队沒有来得及休息吃飯，就出东門应战，才把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至此，刘鎮华对于被欢迎入城的比較体面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开始向西安城的南北两方面移动，准备採取包围西安的办法。

楊虎城率領他的幕僚和衛队等于四月十八日由三原到达西安。这个时候，三原、西安間大道南段的东側，已經受到敌人的威胁了。几天之后，西安的东、南、北三方面已为敌人包围起来。

楊虎城及其部队的进入西安，稳定了西安的人心。根据当时

敌我的力量估計，决定作长期固守計劃，开始在城外各要隘和城墙上构筑工事，分別派兵固守。

到了五月十五日，敌人佔領咸陽、西安間的三桥，西安遂陷入四面包围之中。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止，西安和外界完全失掉了联系，不只人的进出断絕了，而且因当时部队設備很差，城内守軍沒有无綫电設備，于是連通訊聯絡也完全断絕了。在这一长時間內，为了对外打通一条交通綫借以了解情况，虽曾組織过几次突击，終以受到敌人的强大阻击而沒有成功。因此，只好根据最初所估計的总的国内政治形势，根据陕西人民的願望，以革命的热情，和装备較优、数量大于自己十倍的敌人“盲目”地打下去。

敌人在将西安四面包围之后，繞城一周挖了寬深各六公尺的外壕，並加筑围墙一道。从此，除飞鳥外，再也沒有人可以越出包围綫一步了。长时期的战事，就从此打了下去。

西安是主要战場，敌人的絕大部分兵力就放在这里，进行繼續不断的攻击。敌人用以包围攻击西安的兵力，約計七万余人；而城內的守軍，根据兵站的統計，还不足一万人。敌人在吳佩孚补給之下，加上閻錫山大批重火器的供給，装备远較守軍为优。就在这样敌众我寡、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守軍坚持八个月之久，終于取得最后胜利。在八个月中，有下列几次重要战斗：

一、东关的地道战 东关战場，因地形关系，从战争开始一直到胜利为止，始終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敌人設在韓森塚的砲兵群，就专以东关我軍陣地为轟击目标，並在城外掘地道多处，企圖轟炸城墙。楊虎城部的衛队营奉命担任东关防务，在城下挖掘壕壕，专门防御敌人的地道轟炸，敌人几次挖掘地道，都被我軍

發覺，予敵以重大打击。

二、东北城角之战 七月二十二日，敌人在砲兵掩护之下，以敢死队一千余人由东北城角架云梯登城，梯上悬白布赏牌，编有号数，由柴云陞署名盖章，並加盖关防，第×号云梯第一名赏洋一千元，第二名赏洋八百元，第三名赏洋五百元，以鼓励进攻，同时在护城河下掘地道涵洞输送援兵，直薄城下的少数敌兵且已上城。城上守军仓卒应战，短兵相接，战况极其惨烈。楊部补充第一旅旅长姬匯百、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都带着自己的衛队加入战斗。战斗从上午六时开始，一直延續到下午五时，才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甚众，我軍亦牺牲极大。孙蔚如司令在这一战役中受了伤。

三、小雁塔的爭夺战 小雁塔为我軍固守南城重要据点，由李云龙部刘文伯旅防守，敌人先后集中重兵攻击佔領过两次，均經我軍組織反攻克复。这是南面的主要战斗。

四、西北城外大白楊、潘家村的突围战役 我軍为了打通一条交通綫，与三原的李旅长子高、涇阳的田师长玉潔、咸陽的姜旅长宏模取得联系，曾几次組織突击部队进行突围。最主要的是九月二十日的一次，先由各部队挑选精銳近一千人，由李、楊总副司令移往西北城角的广仁寺亲自指揮，向城北大白楊、城西的潘家村分途进攻。激战三日，佔領了大白楊、潘家村等处。終以敌人集中重兵反攻，我軍在惨重牺牲之后，不能不尽棄前功，仍退回城內。

除以上主要战斗外，吳佩孚在汀泗桥、羊楼司、汉口、汉阳連續失敗之后，把他的空軍轉移到北戰場。九月二十六日敌空軍曾到西安上空低飞示威，投擲炸彈，發散传单，对李云龙、楊虎

城的首級懸賞十萬元，以誘惑恐吓。

三原为陝西渭河以北重鎮，即楊虎城入省以前的司令部所在地。楊率队入省后，即以三原防务交給他的第五旅旅长李子高和陝軍第二师师长田玉潔。刘鎮华以梅發魁为北路总指揮，並加上陝軍叛軍麻老九部，拼湊成一个师又六个混战旅，由渭南渡河，向楊部馮华堂、王玉柱部及丑彥俊、甄寿山、张祥生等部在相桥、田市、櫟阳、小石等地的部队进攻。后来，刘鎮华以久攻西安不利，轉欲先取涇阳、三原，以絕西安的外援，遂再加派王老五（振）所部，加入渭北戰場。至此，三原以东地区的陝軍被迫撤退。敌人于六月二十六日兵薄三原城下。八月五日以后，三原亦陷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争的艰苦，敌人在战地的姦淫烧杀情况，和西安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時間稍短而已。十月初，馮玉祥部孙良誠的援軍到达陝境以后，刘鎮华为了准备和援軍作战並巩固后路，十月十二日才被迫撤了三原之围。我軍在三原戰場和敌人作战，先后达六个月之久。

在敌人包围西安的期間，駐咸阳的李云龙部姜宏模旅，駐兴平、鳳翔、醴泉一带的衛定一部的党玉崑、党海楼、王宝發、陈發荣等部，在四月和八月曾經联合起来，組織过两次援应西安的战斗，終以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而且装备極差，結果都被敌人阻击退回，对西安守軍沒有發生重大作用，最后只能在咸阳和敌人隔河砲战而已。

坚守西安紀实

以下再叙述保衛西安战争中几个具体问题：

一、部队的統一指揮与团结問題：如前所述，原在西安城内

的軍隊，已經有兩個不同體系的部隊，一為國民軍第二軍第十師李雲龍部，一為陝西陸軍第四師衛定一部，現在再加上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楊虎城的軍隊，就有三個不同系統的部隊了。論地位，則李雲龍是當時陝西的軍務善後督辦，但是剛從河南鏖羽歸來，驚魂未定，究竟要戰要走，胸無成竹，而且他的精銳部隊，已在河南損失殆盡，留在陝西的為數無幾，戰鬥力較差。論實力，則楊虎城是保衛西安的核心力量，而且有進步力量的支持與合作，政治上的号召力很大，主張向極堅決。衛定一向來是另外一個系統，地位和李、楊都不能比擬。凡此情況，劉鎮華都了如指掌，而且正針對這種情況在做文章。因此，大敵當前，如何統一指揮與團結合作，已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了。楊虎城在這裡表現了極其謙虛與團結的精神。前邊提到，在劉鎮華入陝的時候，關中地區的陝軍只剩下楊部這一隻最完整而戰鬥力又最強的軍隊，楊本人帶領進入西安的兵力約五千餘人，而李雲龍、衛定一兩部在西安的人數總共還不到五千人。在分配防綫時，楊的部隊擔任敵人攻擊的重點東北兩個方面，李部擔任南面，西部壓力較小，由衛部擔任，並為了避免誤中敵人聲東擊西的奸計，採取了分片包干的辦法。楊虎城為了團結李、衛，在開將領會議時，提出取消國民第二軍、第三軍名稱，一律改為陝軍，以李雲龍為陝軍第一師師長，在涇陽的田玉潔為陝軍第二師師長，他自己任陝軍第三師師長，衛定一仍任陝軍第四師師長，並推戴李雲龍為陝軍總司令，楊自任副總司令。這樣的安排，統一了軍事指揮，團結了李、衛。為了軍事上的統一，楊虎城命令他的部隊把從靖國軍開始時就戴的紅圈軍帽取消，和李、衛部隊取得一致。這些具體措施，對堅守西安的取得最後勝利發生了重大作用。

二、發動群眾問題：保衛西安的戰爭不只符合於陝西人民的要求，也適應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但照當時的情況，不僅西安城內有所謂“和平期成會”的紳士在活動，而劉鎮華的大本營十里鋪地方也還收容有一批他過去在陝西所豢養的政客文人，最著名的有馬凌甫、等幾個所謂“土窯七賢”（因在十里鋪地方，以土窯為住所，故名），他們里應外合，活動很力，加上守軍中又有一些動搖分子。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缺少進步的群眾力量的配合與支持，將會對戰事發生不利影響。前邊說過，那時陝西進步的群眾組織已有了相當的基礎，而楊虎城就是在進步群眾的支持與歡迎之下進入西安的，軍事力量和群眾結合起來，這是戰爭所以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據記憶所及，當時西安城內的國民黨——改組後國共合作的組織，非常活躍，設有國民黨俱樂部，由王授金、趙葆華負責。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有黃平萬、雷晉笙等人；團的負責人有吳化之等。此外，有學生聯合會、青年生活社等團體，負責人有王林、王超伯、王文彬、張秉仁等。婦女組織的婦女協會，當時特別活躍，人也較多，計有李馥青、王觀德、王觀政、秦德君等人。在堅守西安中，這些組織在發動群眾、支持軍隊方面做了極其重要的工作。如在五卅慘案的一周年，在西安已被敵人四面包圍的情況下，西安的進步團體在易俗社召開了群眾大會，一方面是敵我对打的隆隆砲聲，一方面是大會高呼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口號聲，聲勢非常雄壯。在楊虎城支持之下，西安被圍期間，各學校始終沒有停課，暑假期間，因外地學生不能回家，在學生聯合會主持之下，成立了一個大規模的夏令講習會，各校師生參加的達一千餘人，學習方式是講授社會科學，分組學習與討論，這在西安是空前未

有的事情。所有这些群众活动，不只对坚守西安发生了配合与支持作用，而且为坚守西安胜利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整个革命运动树立起骨干，因而一九二七年春天，西安的革命活动比之其他地方，显得特别热烈活跃。

三、坚守与投降问题：在刘镇华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放在陕西人面前的只有坚决抵抗与俯首就降两个前途，没有第三路可走。“和平期成会”的士绅们的所谓和平，实际就是投降的另一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在当时具有极大的诱惑作用。特别是到了战事后期，食粮告罄、死亡相继的情况之下，敌人以和平为名而实际是诱降的活动，使许多人发生动摇与困惑，似乎是敌人倒愿意和平，而西安当局却非打仗不可，因此才使得西安乃至陕西全省人民遭受到惨重的牺牲，牺牲的责任就应当归之于当时主张坚守西安的人们。在一九二六年冬天，所谓“和平期成会”分子，就以这样说法煽惑人心，从事活动，甚至竟有人向陕军总司令面前提出类似质问的意见。当然这种宣传与活动受到进步群众的坚决反击，学生团体针对着所谓和平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揭露了他们的阴谋。就在这样战争与投降、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杨虎城坚决地支持了进步群众的意见，枪毙了主张和平最力的西安大绅褚小瑟。这一事件，镇压了投降活动，是坚守西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所谓和平问题了。

四、食粮问题：在坚守西安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食粮问题。西安是陕西省会所在地，人口比较集中，那时城关居民约计十万人，一向靠各县供给食粮，经常的储存量最多只能供给三个月时间——这是刘镇华认为坚持围困、就可以不战而胜的主要根据。在这个时候，除进城的军队而外，西安近郊乃至附近各县的

人民忍受不了敌人的姦淫烧杀，大量的人群，扶老携幼，逃入西安避难，这一批临时进入西安的人口，据估计达七、八万之多。迨敌人将西安四面合围之后，不允许任何人逃出城去，曾经有几次城内难民企图出城就食，都被敌人射击，受到伤亡而退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于作这种试探了。食粮供应，给当局带来了没法解决的困难：既要顾到军需，也要顾到民食，在初期还勉强可以兼顾，如设些粥厂之类；到了后期就没办法兼筹并顾了，甚至到最后发生了军民争食现象，引起了社会上一定程度的不满。在保卫西安战争胜利之后所举行的革命大祭会上，杨虎城送给死难军民的一付挽联这样写着：“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这正说明了他自己的心情。食粮问题，在夏天和秋天，还不算怎样严重，当时也还可以找到野草、树叶之类聊以充饥。一进入冬天，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一向用作肥料的油渣，已成为比较好的食料，只能对机关团体分配一些，一般居民是不容易取得的。于是，所有可以吃的动物、皮革制品、中药铺的某些药材，都被吃掉。加以时值严冬，人民在饥寒交迫之下，因冻饿而死的很多，据当时警察局的统计，每天早起收集死屍常达到一千具之多；以死屍充饥的事情，也并不奇怪。在战争胜利后，检收死难军民遗体、遗骨五万余具，在城内的革命公园内堆了两个大塚，由西安军政各界和居民负土掩埋，因名之曰“负土坟”，至今仍为遊人凭吊的所在。

在保卫西安战争进入后期、更加艰苦的时候，陕西人民得到了虽然还很遥远、但确实足以鼓舞人心的消息：一方面是北伐军节节进展，刘镇华的主子吴佩孚节节溃败；另一方面是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归来，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冯並率领全军参加

了国民党。这些消息说明敌人总的形势在崩溃，革命的力量在发展，增加了陕西人反刘胜利的信心。

五原誓师以后，馮玉祥的部队经过宁夏入甘，派出孙良誠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馬鴻逵、孙連仲、吉鴻昌等部合計四个师、六个混成旅，經固原、平凉东下，到了十月初旬，前鋒到达陕西兴平。于右任且随同先头部队在十月十二日三原敌人潰退后不久就到了三原，組織了国民軍第二、三联軍总司令部。在西安以外的所有陕軍有了领导中心，也有了消灭敌人的勇气。

但是这些情况，被围在西安城内的軍民却毫无所知，依然在飢寒交迫、度日如年的情况之下和敌人战斗。到了十月十五日，孙良誠的先头部队和于右任领导下的陕軍开始向咸陽地区的敌人进行总攻，西安軍民已能听见西北方面的隆隆炮声，其欢欣鼓舞的情况，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

敌人畢竟还是頑强的，城外援軍孙良誠的部队经过南口挫敗，千里赴援，疲憊不堪，最初还受到相当的損失。記得当时有这么一件事：

孙良誠援陕总指挥部有俄顧問——那时是这样称呼苏联专家的——賽福林随同作战，孙良誠在軍隊受到挫敗以后，准备暂时退却，把这个意見和賽福林商量，賽福林立即很严肃地对孙說：

“什么叫做援軍？西安許多万軍民被敌人围困了这么久，日日夜夜在盼望我們，我們一失利就要退却，将何以对被围困中的軍民，我不同意这样計劃。”孙良誠这时仍坚持他的退却主张，賽福林顧問最后对孙表示：“我沒有奉到退却命令，你要退却可以，但請你先把我的槍斃了，否則，你就不能退却。”这样一来，孙良誠沒有办法，才又繼續进攻。苏联軍人的这一种精神，引起了陕西

人的敬仰与感谢。经过猴儿寨、三桥四十余天的几度激战，敌人仍然继续顽抗。最后，因正面攻击无效，才派出奇兵一支沿终南山北麓向东迂迴，抄袭敌人大本营十里铺，加上城内守军的出击，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刘镇华才率其匪军开始撤退。在这一天晚上，西安城内的全体军民兴奋得几乎很少有人睡觉。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还不亮，军民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约而同地走上大街欢呼，成千累万的茫无目的的人群湧出城門。有家屬亲戚朋友被围在西安的陕西各县人民，在援军开始进攻的时候，就带着吃的、穿的跟着军队，准备送进城去，在这个时候也湧进城来。出出进进的人群，把各城門和大街到处塞满了。出城和进城的人们不管認識不認識，也都互相招呼，相对一笑；甚至于城外卖吃食的小販，让人吃东西可以不要錢。在大量食物运入城内之后，久經飢餓的人们，在最初几天以内有一下子吃得过多因而致病乃至致死的事情。

刘镇华的败军狼奔豕突地沿西安潼关大道向东潰退，互相踐踏，途为之塞。陕西东路各县的人民紛紛起来，向刘镇华的匪军进行不断的袭击，討还了他們的血債。

刘镇华一直跑到河南陕州，才开始收容败退下来的残部，就分別駐在灵宝、陕州一带，从事整頓。

刘镇华在北伐以后的几幅画象

一九二七年二月，馮玉祥到达西安，成立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駐陕总司令，着手整頓部队，准备东出潼关，会师中原。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获得了喘息机会。当时他看到吳佩孚已經从武胜关以南垮了下来，而奉军的部队已到

郑州，就派人和奉軍联系，希望向奉軍投效。奉軍方面並且派当年請刘鎮华到陝西作省长的陈树藩（垮台后一直住在大連、天津）到刘鎮华处，作奉軍的代表人。于是，刘鎮华又离开直系，投降了奉軍。

在直奉軍节节失利、馮玉祥的部队开始出潼关向东前进的威迫之下，刘鎮华赶快把他的部队撤向临汝、魯山、郟县、宝丰一带，避开風头，坐以观变，最后又脱离了奉軍，决定請张鈞出来向馮玉祥說話，表示希望回到辛亥前后他所求屬过的国民党。刘鎮华把这叫做回到原来的“老路”。一九二七年夏，馮玉祥到了开封之后，經過张鈞的疏通，刘鎮华到开封去見他的盟兄馮玉祥。据說，刘鎮华到了馮玉祥面前，战战兢兢，誠惶誠恐，双足立正，向馮作了九十度的三鞠躬，每鞠躬一次，口里說一句：“鎮华罪該万死”。馮以后对人說：“雪亚頗有悔悟。”

刘在开封見馮之后，在开封住了一个時間。那时馮部將領群集开封，刘鎮华就在这个时候大肆活动，請客、送礼、賭錢等等一齐都来，時間很短，居然使馮部一些高級將領对他印象很好。有一天楊虎城和孙良誠、石友三等人在一起談天，順便提到刘鎮华的情况，石友三就对楊說：“我觉得刘雪亚这个人很不錯。”楊听了頗为愕然。

刘鎮华既投降了馮玉祥，馮便把刘的部队拨归东路軍总司令鹿鍾麟指揮，駐在开封以东的柳河。在直魯联軍褚玉璞、李宝章、徐源泉、孙殿英、张敬尧、袁家驥、刘志陆、潘自和等八个軍于一九二七年冬天大举进攻豫东的时候，刘鎮华部的姜明玉在战綫后方睢县、宁陵叛变，把馮玉祥派到刘部作副总司令的郑金声擄走，送給张宗昌。郑被张宗昌槍毙在山东济南，这就成为

一九三二年九月郑繼成替父报仇、在济南杀了张宗昌的公开理由。姜明玉的敌前叛变，使河南东路整个战綫受到严重的影响，連駐在归德的东路軍总司令鹿鍾麟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这时楊虎城部队的位置，正在刘鎮华部队的前边，得到这样消息，大为震动。

一九二九年六月，蔣介石到北京会見閻錫山，北方將領紛紛到北京見蔣，楊虎城和刘鎮华也都到了北京。楊住在西城的花園飯店，有人告訴他說：刘雪亞也在北京，問楊是否願意去看看，楊拒絕了。有一天刘鎮华却来到花園飯店看楊，他們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先后对打达八年之久，这是第一次見面。刘鎮华一見楊虎城，一面極热烈地握手，一面說：“对你老兄佩服極了，还是老兄高明，今天特来表示敬佩，希望多多指教。”短于詞令的楊虎城，一时竟答不上話来。刘鎮华見楊以后，連楊的隨員也都分別拜訪一次。刘鎮华对于官僚政客的一套，确实熟練極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馮玉祥的將領由宋哲元、孙良誠領銜通电反蔣，刘鎮华这时已把他的部队交給他的胞弟刘茂恩（刘老五）帶領，随同唐生智对宋哲元作战。十二月唐生智称护党救国軍反蔣的时候，刘鎮华指使刘茂恩率領所部撤入山西，投降了閻錫山。

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刘茂恩跟閻、馮打蔣，当豫东战事正酣的时候，刘鎮华又指使刘茂恩在戰場上誘縛自己的朋友万选才（閻、馮委任的河南省主席），獻給了蔣介石，背叛了閻、馮。

一九三四年刘鎮华以刘茂恩的軍隊为資本，以政学系楊永泰为后台，作了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冬楊永泰被刺消息传

来，刘鎮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由安庆坐船去到武汉吊楊，在船上作了一篇祭文，已有苦塊昏迷、語无伦次的現象。他到了武汉一下船，急急忙忙就到楊永泰的灵前，可是一声还没哭得出来，立即神經失常，对楊永泰的女兒口称嫂夫人，弄得楊氏的家族頗为难堪。

刘鎮华的安徽省主席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才由刘 尚 清 接替。

軍閥末路和人民的裁判

抗战开始以后，刘鎮华这个神經病患者逃难到了西安。距西安围城事隔了十多年，但是西安人並沒有忘怀当年刘鎮华所給予他們的災难。就在刘鎮华东柳巷临时住所的門前，經常有当年受过災难的人們率領着一些小孩子唱西安被围期間一些民間流行歌曲，如“西安被围八个月，老百姓死了四万多”一类。並且当时还有一些陝西軍人因为过去曾經在灵宝、陝州遭受过刘鎮华匪軍的侮辱，以后又被围困在西安，对刘鎮华的仇恨特別深，他們計劃找刘鎮华到西安革命公园的死难軍民的負土坟前叩头致祭。刘鎮华的家族看見情况不对头，赶快把刘鎮华搬走，最初計劃干脆离开陝西，迁到四川居住，后来因种种原因，不得已而迁到陝南城固。城固当时是西北联大（由北京师大、平大改組而成的）所在地，刘鎮华在那里經常胡說胡鬧，已成为当时当地的笑話資料。更奇怪的是刘鎮华对联大一位女教师經常写信求爱，甚至去找这位女教师糾纏，吓得这一位女教师惶惶然不知所措。在日軍大举进攻河南、洛阳淪陷之后，刘茂恩在豫西卢氏县就任了战时河南省流亡省政府的主席，胜利后搬回开封，刘鎮华也就迁到开封居

住。解放軍第一次解放开封时，刘茂恩化装潜逃，刘鎮华依然住在开封，被解放軍在龙亭下边捉住，遣送回家。解放軍不久撤出开封，刘茂恩这才回来筹划全家逃走的问题。到了开封第二次解放，刘茂恩再一次逃出开封，就把他的家屬全部集中到上海，不久就逃往台灣。刘氏弟兄七人，除老二早死外，其余弟兄都跟着逃走了。聞刘鎮华和刘茂恩已在台灣先后死去。

刘氏弟兄在巩县家乡多行不义，人緣極坏。一九二三年刘鎮华以陝西督軍兼省长的身份，帶了大批人馬，回巩县老家埋葬他的父亲时，当地二十里以內的人民互相約定不帮忙，不送礼，使刘鎮华頗为难堪。全国解放后，巩县人民要和刘家算帐，因为找不到对象，就掘开刘鎮华父母的坟墓暴屍洩憤，仇恨之深，可以概見。

豫剧名演員常香玉和刘鎮华同是巩县人，而刘鎮华又是常香玉的祖父的学生。当常香玉开始演戏的时候，刘鎮华怕丢了他的面子，極力反对。但是这两个巩县人，对于地方救济公益一类的事情，常香玉总是慷慨帮助的，而刘氏弟兄不只一毛不拔，而且在地方欺压善良，剝削农民，在当地成为一个显明的对比。

1959年11月24日

徐 树 錚 之 死

吳 錫 祺

徐树錚是北洋派安福系政治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一九一六年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的时候，徐树錚以陆军次长和参陆办公处（这个办公处，是执行大总统——陆海空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负责人的身份，执掌了军令和军政的大权。他为段运筹决策，有“小扇子军师”之称。段内阁一切重大措施，往往被他所左右。他在段的信任之下，独断专行，目空一切。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军人、政客，无不攀附这个段内阁的中坚人物。

馮玉祥虽亦出身于北洋系统，并且在第六镇任下级军官时曾经受过段祺瑞（第六镇统制）的赏识，与段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因馮秉性耿介，不随流俗；在政治上又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肯俯仰随人；而在治军方面，更是当时北洋军阀中一个特出的人物，因此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和歧视。又因为馮与陆建章有密切的关系（馮在第六镇时，陆为第六镇协统，对馮多所奖掖和提拔，並以其内侄女为馮妻室；馮在滦州起义失败被执时，得陆多方掩护，始免于难；陆任陕西督军时，馮亦率部随陆入陕，並由团长提升为旅长），而安福系的徐树錚等则与陆夙有嫌怨，因此，徐对馮始终抱有猜忌的态度。又由于馮在四川响应云南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之役，认为他以北洋军人而附和南方，益为徐等所

不滿。

一九一六年秋，馮率第十六混成旅由四川調駐廊坊，徐樹錚、傅良佐（與徐同為陸軍次長）等即在駐地、餉項和被服等問題上多方與馮為難。他們借口財政困難，要裁減十六混成旅的兵員，接着又要將十六混成旅的一個團調往甘肅，借以拆散和削弱馮的實力。由於馮不肯接受這些辦法，因而觸怒了徐樹錚，下令免去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職務，以夙與安福系有拉攏的楊桂堂（過去曾任第十六混成旅的團長）繼任旅長。馮的被撤，並非段意，撤職令下達以後，段始聞知，但又不便收回成命，乃改派馮為直隸南路巡防統領（巡防營為腐敗不堪的地方隊伍）。不久，張勳復辟運動起，馮始乘機回到十六混成旅，參加了討伐張勳之役，恢復了旅長的職位。一九一七年，孫中山宣言護法，北伐戡亂，福建督軍李厚基為護法軍所擊敗，連電段祺瑞告急，段即派馮率部援閩。馮部開至浦口，即按兵不動；旋又改派援湘，馮復在武穴宣布獨立，通電主和，因之受到撤職查辦的處分。經曹錕從中斡旋，始改為革職留任，戴罪立功。馮在重大壓力下，乃不得不率部開往湖南的湘西一帶。一九一七年的冬天，徐樹錚又在天津誘殺了馮的多年知遇長官陸建章。因此，馮與徐之間不僅存在着政治上的矛盾，而且还結下了私人的仇恨。

一九二四年十月江浙戰爭結束後，徐樹錚因在上海不能立足，乃出國作政治活動。不久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為徐發表了考察政治專使的名義，叫他以段本人專使的身份在各國進行外交活動。徐在國外活動的期間中，從法國訂購了一批軍械，擬歸國後以此為餌，聯絡孫傳芳，打擊馮玉祥，以鞏固段祺瑞的政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初，徐剛一跨進國門，回到上海，就發表了恢

復舊國會和擁段為總統的政治主張，並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聯合起來，使北洋派趨于大團結，推段為唯一領袖。接着徐去杭州與孫傳芳取得聯繫後，即北上至天津。在這以前，馮與段之間的鬥爭已日益尖銳化，馮並且命令北京警備總司令兼警察總監鹿鍾麟逮捕了安福系曾毓雋、姚震諸人，吳光新、朱深等亦逃往天津。段祺瑞知馮、徐之間惡感甚深，得悉徐樹錚到津之訊，立即派人阻徐入京，免生意外。但徐並不以此為意，竟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入京見段，並且為了証實他的專使身份，還郑重其事地舉行了一次向國家元首——段祺瑞公開謁見的儀式，以進一步向各國進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活動。

在徐樹錚到京後某一天，北京警備總司令部接警察廳電話報告：“在西直門車站發現形迹可疑者數十人，身穿便衣，暗携武器，由張家口來京，在西直門車站下車，請示處理辦法。”警備總司令部當即命其扣押解送司令部處理，解到後方知是陸建章之子陸承武帶人來京進行暗殺徐樹錚的活動。據陸承武說，他在張家口聞徐樹錚由津到京，即請求馮玉祥助其為父報仇，馮即從手槍隊撥給士兵二十名，化裝隨同來京，擬伺機暗殺徐樹錚，以報殺父之仇。

徐到京後，出入警備甚嚴，陸竟無從下手，乃請求鹿鍾麟于徐來警備司令部拜訪時預先通知，以便在門前予以狙擊。鹿恐招物議，不允所請。十二月二十九日，鹿得悉徐樹錚在京事畢，定於是日乘車返津。鹿知陸承武行刺之事並未得手，即對人說：“陸承武連這点子事都辦不到，虧他还帶了這麼多打手，真是‘癩狗扶不上牆去’。”隨即以電話報告給駐在張家口的馮玉祥，馮沒有立刻表示意見。約兩小時以後，馮才來電話告鹿：

“处置徐树錚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鹿說：“这个问题太大”，馮厉声說：“天塌了有柱子接着！”时徐树錚所乘专车已由北京开出，鹿乃急命參謀处与丰台車站联系，得到的答复是：

“車已开过丰台，計时尚未到达廊坊。”鹿又以电话向馮报告，馮当时尚有些犹豫。鹿說：“小徐一走，从此多事，如决心幹他，仍可用电话命令张之江执行。”馮意乃决，即命鹿轉达。鹿即以电话对駐在廊坊的张之江传达馮意，要张就地执行这一任务。张謂：“此事重大，不宜魯莽。”鹿說：“这是命令！”张即派參謀张鉞率衛队馳往車站守候。少頃，徐专车到站，张鉞率衛队士兵登車对徐說：“张师长請专使下車，有事面談。”徐辞以无暇。张鉞乃命衛队拥徐下車，甫出站，即执行枪决。

鹿得到廊坊电话后，立即派人告知陆承武，要他于当夜赶往廊坊車站。陆在梦中惊醒，知徐已被处决，即对来人說：“还需要我去嗎？”来人說：“你不去怎么行？非去不可！”陆不得已，乃連夜赶至廊坊扮演了一个为父报仇的角色。徐树錚被杀的第二天，各报都登載了陆承武替父报仇的新聞，实际上北京警备总司令部早在事先拟就了这一新聞报道，借以掩人耳目。这一消息传至段祺瑞耳中时，段曾放声大哭。

距徐树錚被杀后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徐子徐道邻拟在法院控訴馮玉祥非法杀害乃父，以当时反动派头子們均杀人如麻，深恐引起清算旧債的糾紛，經人疏解，其事遂息。

一九三五年參謀團入川前後

吳 晉 航

劉湘被紅軍擊敗，赴南京乞援

一九三三年一月間，工农紅軍第四方面軍由陝南入川，在通、南、巴山區建立了根據地，得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擁護，聲勢日益浩大。當時駐在川東北一帶的田頌堯、劉存厚、楊森等部都紛紛電蔣介石及劉湘告急。紅軍進取綏、宣以後，全川震動。十月間，劉湘由蔣介石任命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川省各軍均歸其節制調遣。劉湘便委定鄧錫侯、劉存厚、楊森、田頌堯、王陵基、李家鈺分任六路總指揮，分道大舉向川北紅軍根據地進攻。當時他還大言不慚地宣稱，不要三個月便能全部“肅清”。

王陵基的第五路號稱五萬人，為此次進攻的主力。但是軍無鬥志，民有怨心，師久無功。劉湘感到焦急，認為各軍都想保存實力，大足影響作戰，必須物色一可以統一指揮的人物主持軍事。劉湘最敬奉神道設教的老師劉從云，各軍將領因敷衍劉湘，也有不少是劉從云的及門弟子，於是劉從云便被劉湘禮請出任“剿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成為劉湘理想中唯一適當的指揮“剿赤”的人物。

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雖亦迷信道教，但反對劉從云，認為劉謊言亂政。劉從云因其不附己，當將任委員長時，就假借神權，

謂王在刘存厚撤职以后，向蔣活动升任二十三軍軍长职位，企圖脫离刘湘，命刘湘調王回成都。王被扣留，禍几不測；后由刘之督办署參謀长袁彬、秘書长杜明輝極力請求，刘始将王交由袁、杜負責監視，並准王移住杜宅，另以唐式遵繼王为第五路总指揮。此是一九三四年三月間事。

同年六月，紅軍出击，攻克万源，唐式遵所指揮的所謂刘湘主力，潰不成軍，唐式遵且失踪二日。当时軍中感事詩極多，現仅能記其中两句：“試向长壩山头望，无数冤魂怨二瘟”（唐外号二瘟），意謂唐調度乖方，致促成此敗。刘从云出任委員長，駐节南充，自称便于居中策应两方。其命将出兵，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为一般所未聞。某次命潘佐师截断紅軍后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則面临大山，又遇断岩。以电话向其請示，則回話責說：“你不晓得軍隊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請示人員气極，答以“是不是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柄。刘从云突聞前綫大潰，即仓皇乘飞机逃走，致全綫不可收拾。

唐式遵既失聯絡，刘从云又复远走，各路告急。刘湘得此敗耗，而又无兵增援。当其輕信刘神仙，早引起各軍及部屬非难，一旦敗坏至此，參謀长郭昌明历来反对以神治軍，更反对信神易将，憤与爭論，咄咄逼人。刘湘亦盛气相凌，与郭拍案爭吵后，愧憤出走，乘車离开成都。当时合署騷然，传遍全城，繼知刘仅在軍需处取款五千元，車向东行，乃由署內电知东路各县加派人員护送。

八月二十五日刘湘抵重庆后，始悉綏、宣方面唐部得范紹增师孟旅收容，並未全軍复沒，唐式遵仍回到部队。紅軍亦未穷追，在

渝僚友复向其婉陈利害，地方人士並代向蒋介石呼吁。蔣严电責以“大义所在，大責所归，豈能以一走了事。”刘湘亦感到事尚可為，走无所之，但是又以本身实力和川省財力实不能支持危局，渡过难关，重庆地方銀行每日挤兌，岌岌不可終日，必須先探明蒋介石的支持是真是假，究竟到何程度。于是密电其驻外代表邓汉祥、邱甲分向楊永泰、何成濬試探与先容。他一面亲到万县布置前綫，一面即准备亲去南京乞援。九月八日，刘湘电呈南京，內称：“局势敗坏至此，远非意料所及，自审心力已瘁，突难繼續任职。此次离省，原拟微服东下，詎料一經抵渝，前綫敗耗頻来，益趋严重，人心震恐，市面撼搖，糜烂崩潰，即在目前。湘目击心酸，允暫留渝，願以在野之身，权支危局。現綏、宣吃紧，六、四路相繼告急。百孔千疮，补苴无术，湘决赴前綫視察整理，期能暂时稳定，以待中央处置。”

蒋介石魔爪想伸入四川，蓄意甚久，但过去形格勢禁，未能得逞，現在刘湘財竭兵潰乞援，当然是侵入西南的絕好时机，何能放过。刘湘提出的“三要”，即要款、要彈、要权，邓汉祥在楊永泰那里得到消息說，蒋介石为了“剿赤”，一定支持，今后怎样作，最好当面請示。刘湘对外援情况既已完全了解，乃于十月二十三日由万县轉到成都，通电复本兼各职。蒋介石亦同时严电川中各將領切实合作，立功贖罪，另由刘湘拟定“剿赤”計劃，先呈中央核定，並先行發給川軍炮彈五百發、槍彈二百万發。

刘湘当时以二十一軍原有防地負担全省作战費用，最感困难的还是財政問題，地方銀行發行地鈔二千五百萬元，突无一定的准备金。刘湘此次出走，八月二十五日到渝后，二十八日即在銀

行公会召集商会及銀錢业負責人講話，謂“剿赤”已久，迄无进展，民不堪命，財政愈来愈困难，这些都是引咎辞职主因。經众挽留，刘始表示不离渝、不辞职，仍希望大家共支危局。九月五日和九月十日，督办署負責財政的刘航琛即分別向銀錢业联合公庫筹垫急用軍需一百五十万元，向商会筹备借四百万元。筹款未交足前，以需用甚急，迫不及待，商由二十五家行庄每家借用期票十四万元。刘湘在軍事和財政双重压迫下，于十一月十七日去汉口轉南京。

蔣介石派參謀团入川，逐步加紧控制

刘湘亲到南京乞援，可以說是蔣介石侵入四川的胜利，在刘湘当日固屬不得已而出此，但蔣介石亦何尝不另有他的打算。当时中央紅軍已由湘入黔，蔣介石明知刘湘疑惧满怀，既不应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高。刘湘抵南京后，蔣介石頗加优礼，並授意南京政府要人多与周旋。刘湘提出的“三要”，亦得到相当結果，械弹的补充固无問題，蔣並允給五百万元作为“剿赤”經費；为了整理川省財政，还特准發行四川善后公債七千万元。蔣一方面催刘成立省政府，統一川省行政財政，以表示倚重；另一方面特組成參謀团入川，以賀国光为主任，协助刘湘促各軍貫徹命令。賀国光湖北蒲圻人，系四川速成軍校学生，与刘湘及所部將領大都同学，感情既孚，推动自易。惟在組織省府問題上蔣曾提出以康澤任保安处长，刘仍婉拒，蔣亦不复强，改以費东明任保安处长。秘書长邓汉祥，民政甘績鏞，財政刘航琛，建設郭昌明，皆刘旧部；教育为楊全宇，乃刘湘为敷衍汪精衛而作的安排。川中各軍无复有人参加。

刘湘此次在南京得有結果，應該說是得力于楊永泰的維護。但邓汉祥回到四川后曾談到：“楊卿（楊永泰字）不認識老甫（刘湘字甫澄），說‘你的伙計是个刘璋’，（此語我得之于陈芷町）。”邓有辯才，蔣素喜之，曾語楊多与邓談。邓在西南关系多，“刘璋”一語是否別有作用，不得而知，因蔣介石挖牆脚，固不限于武人。

賀国光任參謀团主任，刘湘在南京即已商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中賀即率參謀团全部人員和宪兵一团到重庆。參謀团甫經成立，貴州軍閥二十五軍副軍長兼川南边防司令侯之担因紅軍进入遵义，放棄防务，携同家眷並帶有大批行李和十余万两烟土到渝，致重庆市面人心浮动。參謀团即令知刘湘先将侯之担扣留，电京請示。蔣介石复电，着将侯之担撤职交參謀团看管，並一面电貴州省府查明侯之担迭次敗退、失地丧师情形，再予严办（參謀团职权不仅限于川省，所有川、滇、黔、康四省关系較重大的問題皆能过問），一面即商令刘湘以廖澤所部进驻貴州松坎，以郭勋祺、潘佐等部进驻赤水，防止中央紅軍入川。廖澤以临陣畏縮，被撤去第一路指揮及副师长职，保留旅长，戴罪立功。上官云相率中央軍裴昌会等部亦相繼抵渝。

二月中旬，四川省府在重庆成立，參謀团在川輔導，各軍皆表示願交出原有防区的政財两权。刘湘即据以电陈中央，报告川省政权业經統一；並將全省划为十八个专区，专员虽由省府保荐，其实不少早經蔣介石內定。

三月下旬，紅軍突破川北嘉陵江防綫，田頌尧部潰不成軍，其余各路亦相率后退，蒼溪、閬中、南部、劍閣、梓潼、彰明等县同时为紅軍攻克。江油被围，綿阳告急，全川震动。时蔣介石

在貴陽，楊永泰在重慶。楊認為非從嚴處罰前綫高級將領不能樹立威信。劉湘乃約楊永泰到北碚密議。劉湘首先提出，嘉陵江不守，田頌堯所負責任最重，過去與羅澤洲即一度互相推卸責任，曾由中央分別給予處分，但仍毫不奮發，實無希望。楊永泰即問：撤田不難，所部應交何人統率，其他川軍有无反響？劉湘力荐孫震足以繼任。楊再追問劉能否負責，不致別生枝節？劉湘表示願負全責。楊即同意電蔣介石照辦。四月二日，蔣在貴陽來電：“二十九軍軍長兼川陝邊區‘剿匪’督辦田頌堯免去本兼各職，听候查辦，所有部隊責成該軍副軍長孫震收容整編，孫震記大過一次，戴罪圖功，仍查明此次擅棄河防長官分別議處。”田頌堯遵令解職，鄧錫侯、楊森、李家鈺各部即不敢不固守前綫以待增援，戰局始逐步穩定。楊晒軒旅堅守江油，復得到蔣介石嘉獎。

當時民間有這樣一首歌謠形容各軍負責人：“紅軍過了河，羊子奔索索（四川土語，形容楊森欲逃不能），冬瓜遍地滾（田頌堯綽號冬瓜，形容其走頭無路），猴子摸腦壳（鄧錫侯綽號水晶猴子），矮子拿鞭打（李家鈺綽號李矮子，又是邊防軍），劉湘喊活捉（當時紅軍有此口號），請問委員長，看你又如何。”這几句民間歌謠不僅反映了四川人民對這些軍閥的無情的嘲弄，同時也刻劃出他們在紅軍威力之下惊慌失措的狼狽相。

蔣介石既插手四川，決不只是一時利用劉湘，而是要長期掌握西南，在參謀團順利進川、打下了初步基礎后，進一步作法，自然是逐步深入，逐步收緊。四川省政府成立后不久，蔣介石即提出：為了扶助川政統一，中央與地方配合得更好起見，參謀團已不能適應需要，應即改設重慶行營。一九三五年夏，行營成立，由蔣介石親自主持，賀國光調參謀長，楊永泰兼秘書長，實際上

處理問題大都取決於楊。行營設置以後，蔣就再進一步提出：省府既經健全，為了便於行使職權，應自重慶遷回省會成都。劉湘雖留戀老巢，不願離開，但是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不去成都，大勢所迫，亦只好遵令西行。

蔣介石懂得地方軍人的專恣跋扈，是由於財權兵權集於一身，同時也摸清劉湘當時最困難的是財政金融，遂以扶助的姿態先建立財政監理處，派關吉玉任處長，川省財政廳長劉航琛任副處長。在防區制尚未根本廢除的情況下，省府要統一全省政、財兩權，必須依賴中央；而要清償以前所負的債務，更需要中央。於是四川的軍需政費，從此由財政監理處核發。

重慶是四川唯一的商埠，也是劉湘經濟命脈所在，經營多年，劉湘凡需巨額現金時，都是依靠劉航琛在重慶市場活動。參謀團入川以後，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對地方財政當局作了新的估價。劉航琛過去凭借政權所玩弄的一套非法票據把戲，此時財監處如不同意即無法周轉，窮相畢露。有時財監處雖代為轉請，一經財部批駁，則推緩之詞亦旁。劉航琛利用市場慣用名稱所立出的票據，據我的回憶，從六月中旬到八月中旬，短短三個月，即有所謂交換証、寄存証、承兌証、匯划証等等。銀錢業公庫被迫同意，明知畫餅充飢，亦不能不一轉再轉，暫時維持信用。即劉湘自身所辦的川康銀行及劉航琛負責的川鹽銀行還賴金融同業緊急貸款，才能勉強維持。最後拖到八月下旬，才由銀錢業代表協同省財政當局呈准財部，以川省預算外的禁毒罰金作担保，發行川省府清償短期債券一千一百五十萬元，償清以前欠款；債券分二十四個月，每月付本息一次。財政部指出，重慶金融業必須具呈保證以後所有非法票據如匯划証等等永不再發，才能得到解決。

刘湘为了挽救財經信用的破产，六月間曾由省府命令在成都征收房捐。四川旧軍人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联合拒征，刘湘急欲筹款，一度派人監視尹、胡諸人住宅和行动。事聞于蔣介石，命令撤去監視人員，刘湘以省府威信为詞，拒不接受。此事說明在財經方面的矛盾已到表面化的阶段。

地方銀行為省府設立的金融機構，發行地鈔約二千五百萬元左右，準備金根本不足，由於軍事緊張，財政枯竭，久已發生擠兌風潮，重慶曾因擠兌發生過墻倒死傷事故。九月十日，行營突然宣布地鈔一律八折，由中央以申鈔收回，以後不准行使。各地市場頓陷混亂，商家倒閉甚多。萬縣商幫曾因此停止收交，內江在群情憤激之下，竟將地行搗毀。當時渝申匯水本已達一千一百五、六十元，財部既備足大量申鈔，只須一面接管地行發行，一面用匯兌方式收回，市場即可無擾，持券的貧苦大眾亦不致遭此慘重損失。乃財政部利用維持地方金融之名，促使刘湘信用破產，而不顧慮到影響所及，貽害全川，用心可謂毒辣。

財政金融方面，刘湘既已無余力掙扎，蔣介石乃更進一步在峨嵋山組織軍訓，凡中上級軍官均分別調訓，第一期縣級幹訓人員亦必須參加，蔣並親往主持，意在麻醉、收買川省軍官及幹部。在這一段時間里，蔣介石對於西南各省互相間的關係和四川各軍的內容，摸底工作做得甚多，同時更配好鑰匙，便於相當之際打開僵局，自信勝算已經在握。這時中央紅軍業經北上，四川軍事遂暫告一段落。

蔣、刘矛盾尖銳化和川軍整編會議

參謀團一經入川，刘湘即感到如芒刺在背。一九三六年十二

月十二日张学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变时，刘湘如释重負，川軍駐在西安的黃慕顏随时有消息到成都，平素反蔣的刘湘亲信傅常、张再等都主张立时响应，行动起来，将成都的軍校、警衛团繳械，把行营的一般人員分別扣留。刘湘本已跃跃欲試，邓汉祥独不贊成，密告刘湘：“蔣介石留在成都的几个人，我們要解决他們很容易，必須看蔣介石最后怎么样。我还主张不但不围繳、不扣留，还落得先去慰問他們，如果真是到蔣介石完蛋，那就简单得很。”刘湘同意他的說法，就照他这样做了。后来蔣介石被放回南京，刘湘賴有这一番虛伪的周旋，才有詞自解。当时重庆方面，刘湘的許紹宗、周成虎等部已对中央人員和部队采取敌对行动，許紹宗在重庆江北，周成虎在南岸，不但放步哨，还都在大做工事。市民对蔣介石並不关心，可是对快要發生軍事的現象确是大感恐慌。行营的賀国光因为与許紹宗和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等是同学，每日低首下心去随同他們吃喝嫖賭。蔣介石被放出来以后，情形就大变了。經過这一次事变，蔣、刘的斗争更是越来越尖銳。

在整編會議前，即一九三七年四月間，康澤駐重庆浮圖关办軍訓，中央軍与川軍已有不能相容之势，双方夜間放哨，戒备甚严。軍政部长何应欽承蔣意旨，即对刘湘指示六項办法，刘認可而迟迟不行。六項办法是：1、綏署駐重庆部队限一旅七营；2、重庆附近廿一軍部队撤駐合川、江津、璧山各县；3、下东城、开、万各县限于三旅，不再增加，更不应做工事；4、重庆浮圖关、虎头岩等处工事一律撤銷；5、川軍必須自动使軍隊国軍化，政治中央化，中央保証川軍当局軍事政治地位，促进川省建設；6、国軍軍訓人員一部分人地不宜，中央同意改組，即以

刘湘推荐的楊芳毓为主任委員，仍与賀国光主任商办。

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蔣介石与刘湘矛盾發展到最高峰，决定要召开川軍整編會議。很显然，这是參謀团入川后最主要的措施，也是刘湘的最后一道防綫。刘湘欲拒不敢，欲从不顧，卢作孚、邓汉祥等均因此而仆仆于重庆、南京間。邓錫侯、刘文輝、李家钰等先后电蔣介石，表示贊成整編會議，並各有代表預向顧祝同有所接洽。顧为保定軍校学生，与邓、刘有同学关系。刘湘既被迫同意举行整編會議，即决定七月一日在重庆召开。蔣介石指定何应欽为主任，顧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員邓錫侯等十九人。刘湘清楚認識到这次會議是对彼而發，其左右亲信頗多阻之者。刘初拟採取贊同开会、但本人不亲出席的办法，繼又覺如此必触蔣怒，将更为不利，以邓汉祥与何应欽关系甚密，乃商邓先向何試探，再决定是否应中途托病折回。

开会之日，何应欽以下皆着軍服，以示隆重。刘湘后至，独戴博士帽、穿长衫，当时各方認為刘有意鬧考，印象極坏。川中各軍亦早知蔣介石整編目的何在，当何应欽在会上說明这次會議重大意义后，李家钰即首先發言，指責刘湘于所部在前綫作战时，以負責长官而在后方勾結所部，影响軍心。經何应欽婉詞制止，會議始照程序进行討論。會議中达成的決議主要的有三項：1、川軍兵額太大，必須縮編十分之二；2、川軍应国軍化，团长以上軍官必須由中央直接委派；3、川軍軍餉必須每月由軍政部点名發放。會議进行期間，值“七七”事变發生，何应欽匆匆返京，會議便草草結束，因而最后一幕終未揭开。

在整編會議未开会前，我知道有些情况对于刘湘确是不利的，如唐式遵、王纘緒都表示过对刘湘不滿，王纘緒通过康澤关系

要好蔣介石，曾獻策扣留劉湘。唐式遵于开会前來晤劉文輝時力說：“劉湘對友軍嫉視，對部下猜疑，他統一川政以後，于地方並無好處，今天應該有苦必訴。”唐走后劉文輝即告其參謀長王靖宇，王說：“唐話不可盡信，還須注意甫澄是否有意向我刺探。”

劉湘在未到重慶以前，曾以“整編極所擁護，所部相隨有年，知之較深”為理由，要求將團長以上軍官由其開單送請中央加委。蔣介石為了要開成會議，欲擒姑縱，表示可以同意。劉湘亦深知所部高級將領早有二心，遂借口中央有指示，將全部旅、團長大肆調動，以便于自己完全重新掌握。改編后，潘文華曾慨嘆說：“我今天的軍長只有幾個勤務兵。”因此，人多謂劉湘的整軍是得到蔣介石的幫助的，但是實際上蔣介石是要在川軍出川后再來徐謀分化。

一九三七年十月劉湘與鄧錫侯各率所部東北兩路出川抗日，劉湘于翌年一月中旬病逝漢口，川事又轉入另一階段。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

一九三六年成都事件

何 北 衡

成都事件又叫“蓉案”，同臧本事件、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北海事件等一样，是“九一八”以后日本軍閥的特务浪人到中国各地制造或挑起、用来做侵略中国口实的一系列事件之一。这一事件是在蒋介石势力打入四川一年半之后發生的，内容是：日本外务省派人到成都筹备領事館，成都群众游行示威，表示抗議，蒋介石的特务乘机打死日本人二名、打伤日本人二名，企圖嫁禍地方，逼走刘湘。这一事件的内容比其他那些单纯系日本特务浪人制造的事件，要复杂一些。

当时四川的政治情况

四川是一个軍閥割据、防区林立的省份，名义上隶属于南京蒋介石政府，实质上是各防区軍閥各自为政，榨压人民，扩充实力。一九三三年刘湘打败了刘文輝以后，他的实力及防区佔四川之半。但是刘湘的軍隊在万源、城口被紅軍打败后，刘湘才不得已于一九三四年冬季到南京去投靠蒋介石。蒋介石任命刘湘当四川省政府主席，並立即趁势布置实力，以控制刘湘。其重要措施如下：

1、在重庆設軍事委员会委員長行营，發号施令，指揮川、康两省軍民各政。

2、在峨嵋山办訓練团，輪流調訓軍官和行政人員，进行收买。

3、在成都設中央軍官学校分校，訓練軍官生数千。

4、派康澤率領別动队入川，分駐成都、重庆等地；並指定康澤主持四川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軍事訓練。

5、派交通兵团第二、第四两团駐扎和往来各公路。

6、派宪兵第三团駐重庆，第五团駐成都。

以上这些措施，旨在用来鉗制刘湘，自不待言，特别是別动队总队长康澤是川籍黄埔生，自特为蔣亲信，到处横行无忌，和刘湘所屬軍政两方摩擦尤甚。

事件的起因

一九三六年八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通知刘湘，謂日本外务省决定要恢复成都日本領事館，所派駐成都領事野村即日来川。

領事是商务代表，本来只应設在通商口岸，而成都並未开为商埠，自不应有外国領事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成都却有日本、英国、法国等領事。后来日、英領事撤去，但法国領事还存在。据南京政府川康外交特派員吳澤湘說，这是由清代沿袭而来，那时由于重庆外国領事有时到成都和四川总督办理交涉，曾准他們在成都租個房屋，作为临时住所；領事去后，留置人員收轉文件，后遂蒙混称呼为領事館，云云。

野村一行人等到达重庆后，住在重庆日本領事館內，要先派隨員四人去成都筹备恢复領事館事务。刘湘曾电重庆市政府轉告重庆日本領事，以关于成都日領館問題，成都民众紛紛反对，情

緒激昂，恐保護難周，希望日人暫緩前往。但日人悍然不顧，深圳經二、渡邊洗三郎、田中武夫、瀨戶尙四个日人于八月二十日由重慶去成都，住驛馬市大街大川飯店。当即由警察局派巡官、警長和警士駐大川飯店严密監護。

川省當局的布置

劉湘當時因患胃病不能辦公，省府事務由秘書長鄧漢祥代行。鄧漢祥于八月二十一日召集成都警備司令蔣尙朴、市長鍾體乾、省教育廳長蔣志澄、警察局長范崇實商議對待日人辦法。鄧漢祥認為外交部既不敢拒絕，省政府亦不便出面阻止，但成都市民確甚懷疑恐懼，上海四川同鄉會亦來電反對。當時決定由民眾遊行示威，省政府根據人民請願，一面電請南京外交部嚴正交涉拒絕，一面電重慶劝阻野村緩來。只是民眾遊行示威，必須严密維持秩序，防止發生事端。當時商定：普通市民由市政府轉知各區街保甲注意，學生方面由教育廳轉知康澤注意（因為成都學生正由康澤和別動隊幹部集中施行軍事訓練），成都治安秩序由警備司令部及警察局負責維持。八月二十四日正午，市民隊伍開始遊行示威，經過大川飯店門口時，高呼口號，並推代表面詢日人來意，表示堅決拒絕設置日本領事館。遊行隊伍經過省府門口時，呈遞不准日本在成都設置領事館的請願書，由鄧漢祥接受，允立即切電外交部嚴正拒絕。至此，遊行民眾即開始分頭散去。

突 變

將近傍晚，在新都縣集中受訓的學生大批趕到，在北門和中央軍校學生會合，亦舉行遊行示威，共一万余人。這樣浩大的隊

伍，又吸引了沿途的民众挤在两旁和跟在后面，人数更多。学生队伍去到大川飯店，要冲进去。警察人員一面劝阻，一面急电报告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警备司令蔣尚朴首先赶到劝解，学生不听，並擲石块打碎蔣的汽車玻璃。蔣甚憤怒，口称不管，乘車而去。学生們把蔣哄走之后，便去冲击飯店大門，里面的警察拼命抵住。警察局长范崇实赶到驪馬市大街南口时，滿街学生和市民，壅塞不通。范就一人挤进去，挤到大川飯店汽車房附近时，有些人已将汽車房大門推倒，正在寻找汽油来烧房子。范向前制止后，又挤到大川飯店大門对面，向一家鋪戶借板櫬一条，站在上面，劝学生們維持秩序，並表示他可以把日本人押解出境。他喊了几遍，普通市民开始走散，忽然学生队伍中出来一人，将板櫬推倒，范跌了下来。即有学生队伍中的队长口吹叫笛，从怀中掏出一张紙条，高喊“打死日本人”。立刻由中央軍分校軍官学生带头，把大門推倒，冲进飯店，和警察們扭作一团。又有一部分学生冲上楼梯，警察抵挡不住，步步上退。学生冲上楼去，把門窗、器具搗毀。躲在楼上房間中的四个日本人見势不佳，也从房間里冲出来。带头的叫深圳經二，膂力甚大，一手抓住警长来做挡箭牌，招架学生的棍棒，带着其余三个日本人冲下楼梯，奔到飯店大門。街上学生上前堵住，深圳經二夺得童子軍棍一根，抓住警长，夺路而走。渡边洸三郎紧紧跟着，冲出重围，向北逃走。經過成都县政府大門时，渡边洸三郎跑进县府大門，企圖躲避，被看門人推出，关了大門。恰值学生們赶上，把他打死。深圳經二一手抓住警长，一手揮动木棍，走到了正府街。学生們紧紧围住，不敢逼近。深圳經二站在街边，环顧冷笑。不提防后面一人爬上屋簷，用砖瓦猛力下擲，正中其脑門，倒在地下，学生上前

把他打死。这时田中武夫和瀬戸尙两人在大川飯店門口，被学生围住，打得头破血流。恰值范崇实赶到，分开学生，首先把田中武夫拉到驛馬市大街南口，交汽車送往警察局。范再回轉大川飯店，瀬戸尙已經重傷，倒臥街沟。学生認為已死，遂即离去，当由街民抬上汽車，送往警局。两人在局略事包扎，換去血衣，即送到刘湘的綏靖公署軍医处治疗。两人知道已經脫險，开始說話，据称瀬戸尙是南滿鐵路对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會計，其他三日人都是武士道，深圳經二的劍道上丁第五段，渡边洗三郎和田中武夫的柔术也有二段以上的功夫。显然，他們都是屬於日本軍閥特务系統。

在学生围攻大川飯店的同时，春熙路的交通公司和益晋、恒宝两商号亦被群众搗毀。这三家商店是被認為販賣日貨的。群众当中有些是成都的百貨商店和絲綢业人員，日貨常常威胁他們。除日本人死伤之外，警察局的督察員刘竭、科員徐竞允、警长王茹材、警士陈伯林、李銀州、陈仲文、賈治平、李平安、刘士清，亦都受伤。

两个紧急會議

打死日本人的当夜，复兴社和C C的幹部們在康澤的重要幹部叶介仁的住宅开了一个联席會議。叶宅电灯徹夜通明，开会的人天明才散。据偵查报告，这个會議决定：

- 1、联电报告蔣介石，說刘湘暗中派人打死日本人，以圖增加中央对日外交的困难，建議免刘湘的省主席职务，以謝日人。
- 2、由C C幹部电請其首脑推荐康澤繼刘湘任四川主席。

以上两份电报当时即發出，經刘湘的偵察电台收得其密碼电

波。

打死日本人的第二天（二十五日），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召集市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开会，商議善后措施，决定：

1、用棺木将两日人尸体盛殮，停在出事地点，以备日方来人查驗。

2、由警备司令部提出已經判处死刑、即将执行的囚犯二名，作为當場捕获的兇手，在出事地点槍毙，仍用棺木装殮，放在日人棺木之前示众，並备日方来人查驗。

3、由刘湘密电南京政府，严正指出康澤部屬叶介仁等指使学生打死日人的情形。

南京政府的措置

事件發生的第三天（二十六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由廬山回南京接見日本总領事須磨后，立即电令川康外交特派員吳澤湘由重庆飞成都，准备接待日本調查团。同日南京中央社發表消息称：“八月二十四日成都民众暴动，捣毁大川飯店，益晋、恒宝两商号及交通公司，軍警受伤，打死日人二名，打伤二名，原因是四川匪踪未靖，反对政府分子从中策动，借以增加中央外交应付之困难。”同日刘湘接到南京政府行政院来电称：“查敦陸邦交，曾經政府飭遵有案。該省成都市內忽然發現人民毆击外人事件，虽屬意外事件，防范究有未周。当地軍警負責人員保护不力，自应依法惩办。仰即查明人名及办理情形，电呈候核。”此外，张群也給刘湘和邓汉祥私电，表明南京政府並無处分刘湘的企圖，叫刘湘安心。

八月二十八日，外交部特派調查員邵毓麟、專員楊开甲由南

京飞成都，进行查案。

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政府重申睦邻命令，令文如下：“查我国人民对于友邦須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論行为，早經明令在案。最近四川成都竟因人民暴动，發生毆击外人情事，殊违政府睦邻之旨。除严飭主管机关迅速妥为处理外，茲特重申前令，仰各切实遵守，勿得违背，此令。”这就是过去反动政府在外交上一貫的卑躬屈节的可怜相。

在华日本机关人員的动向及受伤日人的談話

八月二十六日，重庆日本領事館派志波嘉六和日本医生三人由重庆飞成都，立即赴川康綏署軍医处探視受伤的日人田中武夫和瀨戶尙。八月二十七日，志波嘉六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称：

“余等抵成都后，即往慰問受伤之侨胞田中武夫及瀨戶尙二君。田中受伤較微，精神頗佳，对不幸事件犹能記憶，詳述当时情形，語言明亮。据謂：二十四日午后三时，有人至大川飯店詢問渠等来蓉之任务，当答以系商人及新聞記者，全系游历性質，与設領事件无关。各人听取此答語后，乃全体辞去，並未發生他变。瀨戶君又称：至午后五时许，渠等还在飯店二楼休息，突来民众約万余人，聚集大川飯店内外，人声鼎沸。旋聞門窗玻璃破碎声，知大川飯店为暴徒搗毀。斯时駐大川飯店之軍警力量薄弱，无法制止暴徒，当将四人护送至三楼，加以保护。登楼未久，暴徒又拥至三楼，将全楼杂物悉行搗毀，秩序大乱。渠等即于此混乱状况下，被暴徒拥出飯店，在大街之中东冲西撞。暴徒愈集愈众，渠等四人及保护之軍警均被冲散，不能相顧。經過此等扰动，渠之神經已經昏乱，后来始悉由軍警护送到医院矣。又据田中

云：冲散后，渠在人群中正无法解脱之际，忽被一体格肥壮之绅士将其扶持挣扎，始得脱险，嗣后方知此绅士即为公安局局长。”

八月二十八日，田中武夫向中央社记者发表的日文书面谈话，节译数点如下：1、第一次群众多人，于二十四日午后来到饭店，询问我等来历，我等出示护照，即有人起立演说。此项演说得到胜利，群众退出。2、第二次群众来时，室内黑暗，公安局员数名保护我等，努力防护，卒因众寡不敌，不克奏效。3、我等被群众押至街心，赖范局长制止群众，我生命得以保全，对范先生之奋斗，表示谢意。

田中武夫和瀬戸尚于八月二十九日由成都飞往上海。

調 査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调查团由上海飞到成都。该团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松村为首，包括海军中佐中津成基、陆军中佐渡石近、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並有大阪朝日新闻中支局中村正五、大阪每日新闻中支局知花信量、同盟社汉支局岡本房男、满铁汉支局新田高博等。他们同往开棺验看深圳经二和渡边洗三郎的尸体，同时也验看了被枪决了的刘成先、苏得勃二人的尸体，均拍摄照片，再同到军医处慰问受伤的日人田中武夫、瀬戸尚。

八月二十九日，日本调查团通过外交特派员，得到四川省政府的同意，传讯有关人证，如1、大川饭店的经理、账房、茶房和工人；2、驛馬市大街和正府街的街正及事件现场附近的居民；3、值勤的警官、警士。该团成员分别询问，纪录言词，询问重点，是想找出民众示威游行和政府方面的关系及证据，但毫无所获。

八月二十九日，松村、糟谷廉二和海陆军武官等，赴四川省

府拜会刘湘。松村首称：奉日本政府外务大臣有田及川樾大使之命，来成都调查成都事件，承四川省政府保护並予便利，表示感謝。对此次不幸事件，双方均表示遺憾。有一日本武官态度傲慢，把脚跷起放在沙發椅子的扶手上面，經吳澤湘提請其注意礼貌，他才把脚放下来。

尸体的处理

● 深圳經二和渡边洗三郎的尸体，由松村等决定，在成都文殊院火化。九月一日松村等携带两日人骨灰由成都飞往上海。

交涉結果

成都事件發生后，日本軍閥当然認為又是一个絕好机会。有田外相談話、海陆外三相會議等等，做出种种威胁中国政府的姿态。九月三日广东北海又發生日本間諜被杀事件。

成都事件的解决，据张群通知刘湘說，政府承認了九条，其中重要的是：1、成都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撤职；2、賠償死者撫卹費每名白銀三万两，伤者每名三千一百两，由四川省庫立即匯往南京；3、政府向日本政府道歉，保証不得再有类似事件發生。其余为取締仇日刊物、禁止抵制日貨，等等。

十二月三十日南京中央社發表消息一則如下：

“中日外交談判中，关于成都及北海两案，外部与日大使館当局經数月折冲，茲已完全解决。三十日上午外交部司长高宗武持张部长去照至日使館，而該館一等秘書官須磨則于下午持川樾大使复照至外交部，双方正式換文結案。”

虹 桥 事 件 的 經 过

董 昆 吾

一九三七年我在上海任上海市公安局蒲淞警察所所长，沪西越界筑路和虹桥飞机场一带都是属于我所的管区。“虹桥事件”发生时，在公安局方面，我是代表者，在地方警察方面，我是责任者，这事件的处理我是全部参加的，所以我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和经过印象很深，记忆特别清楚。现在根据我的回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叙述于下：

上海是我国华东的军事门户，又是商业枢纽，日寇对于上海，垂涎已久。一九三七年夏季，日寇想要继上海“一二八”战事之后，再次挑衅，发动攻势，借以达到它实行占领上海的目的。当时上海情况非常紧张，但是根据《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的规定，只许中国在上海驻保安队，而不许驻扎正式军队，因此，我国陆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便换上上海保安队的服装，由南京开进上海市；驻守沪西虹桥飞机场的，就是八十八师的一个连。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下午五时余，有驻在上海闸北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中尉军官，乘着一辆带蓬的军用汽车，由日本士兵驾驶，沿着沪西的虹桥路，由东向西，开足马力，飞驰奔驰，意图开到虹桥路的西头，冲进虹桥飞机场的大门（虹桥飞机场的大门面向东开，正对虹桥路）。当他的汽车驶近飞机场的门前，要想冲进大门时，该场守兵（陆军八十八师一个连）看

見那輛汽車來勢凶猛，攔阻不住，不得已，由場內開槍。該汽車受到場內開槍射擊，欲退不能，遂向右轉，沿着飛機場的東面鐵絲網圍牆外面的碑坊路向北行駛。鐵絲網內的守兵預先筑有簡單射擊工事，他們在工事內對着這輛北駛的汽車，連續開槍射擊，將這汽車擊毀於碑坊路上。日本軍官在汽車內中彈斃命，開車的日兵下車向東北方豆地里逃遁，跑到百余公尺處，為該處正在修筑工事的守軍擊斃。

我於這事發生後，隨即趕到飛機場。當我到達現場時，只見這輛日本海軍陸戰隊的汽車，車頭向北，停於碑坊路上，距離飛機場正門約百余公尺，車身上的彈痕如同蜂窩一般。乘車的日本軍官屍體，已被守兵由車內拉到車外，剝去衣帽靴襪，並將屍體開了膛，臟腑腸肚，狼藉戶外，其狀甚慘，不忍目睹。那時該場守兵正在手持鐵鎬，欲將屍體掩埋。我當時目睹這種情況，知必演成嚴重交涉，當即一面加以制止，一面用電話報告公安局（局長蔡勁軍）轉報市政府（市長俞鴻鈞）。

當這事件發生時，該飛機場隨即將槍击日本海軍陸戰隊汽車、射死日本軍官事報告上海警備司令楊虎。楊即提出該司令部已經判處死刑、尚未執行的囚犯一名，給他穿上軍衣，綁上裹腿，拉到飛機場的東面鐵絲網內擊斃，以為對這一事件的交涉留有站腳地步。

當晚九時許，日本海軍陸戰隊、日本領事以及所有各國駐滬領事都到現場。市政府派一通曉日語的張秘書為代表，公安局派我為代表，會同與日本方面辦理交涉。當場駕起電燈，在現場上由日軍和所帶軍醫人員開始驗屍，檢查傷痕，登錄記載。我和張秘書以“起初是這輛汽車意圖沖進飛機場的大門，不聽守兵攔

阻，並先向場內守兵開槍，击毙我方守兵一名，場內守兵為自衛計，才向汽車開槍”等理由，向日寇交涉。但那具被击毙于鉄絲網牆內的囚犯尸体，虽然穿着軍服，綁着裹腿，終以囚首垢面，頭髮、指甲都过于长些，裹腿的打綁，也不象軍人做的，而且中彈的方向，也不符合。因此，当被日軍檢驗識破，这具死尸並非場內守兵。当时徹夜驗尸，双方激辯甚烈，日寇强橫激憤，气势凶惡，激辯到深夜，沒有具体解决而散。翌日晨，日本陆战队將它的官兵尸二具和破汽車一輛取回，当日夜間日寇陆战队已作好准备，把坦克車等停列于閘北日寇海軍司令部的門前，拟定于八月十日从上海閘北開火，进攻上海市。但由于駐沪各国領事的要求，日寇允許推迟四十八个小时，讓各国侨民迁入租界区内。八月十三日晨，日寇軍从閘北開火，挑起了上海“八一三”战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

一

周总理近来号召大家撰述近代史的资料，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理应起来响应此一有意义的事情。

根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示，撰写材料时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这是十分明达的决定。因为这样，大家写起来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文史会把再造派（孙科）列为资料参考题目之一，我是再造派的一分子，虽然在神经衰弱病中，也亟愿把这一派的种种经过，不讲究词藻，简略地、忠实地写出来。我只是代表自己，不敢代表其他再造派人士。因为再造派的人们，在抗日战争中即分化，解放后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可以说早已风流云散了。

二

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的文人巨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因政治上理由，只能在野，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欧洲考查政治。当时青年国民党员王昆仑、鍾天心、譚小岑同我，一共有几个人，拥护胡汉民，梁寒操则追随孙科。因此关系，胡、孙两人在出国时特别嘱咐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给这些人经济上的支持，在上

海办刊物、办报纸。李济深是桂系军人首脑，政治上拥护胡汉民、反对汪精卫，而当时汪精卫同蒋介石在暗中又合作了。有了经济来源，于是我们就在上海办了一个《再造旬刊》和《民众日报》，附有一个小印刷所。《再造旬刊》最初由锺天心负责编辑；以后锺到英国去留学，由梁寒操编辑；最后梁去南京随孙科做官，由我代梁为编辑。《民众日报》由谌小岑、程元斟两人负责。据我的记忆，《再造旬刊》的命运大约是一年半，《民众日报》的寿命约为一年。刊物同报纸垮台的原因是：第一，胡汉民从欧洲回到南京，又形成了胡、蒋合作，中断了汪、蒋合作，胡做了立法院长，孙科也回来做了铁道部长，他们没有再叫人在上海办刊物的必要了。第二，李济深被蒋骗到南京而被扣，两广政局大变，我们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自此以后，王昆仑、梁寒操、锺天心、谌小岑、程元斟同我这一批人，便被人叫做“再造派”，而我们也以此派人自居。

三

南京定都以后，我们这批人看出了蒋介石军阀的本质，必然走上独裁的道路。蒋的嫡系部下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对于我们也是敌视的。当时我们希望国民党在胡汉民的领导之下，一方面排斥汪精卫那一批所谓“左派”，一方面使蒋介石限制在只主持军事的地位，把国民党再造一番。所以《再造旬刊》一贯鼓吹国民党有再造的必要，后来居然还提出一个“再造方案”（由王昆仑主写）。对于南京政府，我们也以在野派的地位（最初是符合胡、孙以及李济深的政治需要的），在刊物上加以不客气的批评。汪精卫一派人，虽然把蒋介石从下野中捧上了台，徒然被蒋

又利用一次，並沒有在南京分享政权。汪派的主将之一陈公博，当时就在上海办了一个《革命評論》的刊物以及大陆大学。陈公博的理論，是鼓吹工农及小資產階級联盟，政治上成为国民党的改組派。《再造旬刊》是主张所謂全民革命的，反对《革命評論》的理論，認為他們不是三民主义，並且批評所謂工农及小資產階級联盟是馬克思主义的翻板。这一类文章在《再造旬刊》上，梁寒操写得最多。这种对立的情形，在当时政治上也頗引起人們的注意。

四

胡汉民同汪精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因廖案的关系，由好朋友一变而为政治上的仇敌。为了打破汪、蔣合作，胡汉民、孙科在欧洲提出了一个試行五院制的提案，蔣介石認為可以利用，便被接納了。当时我們一批年輕人，認為胡汉民不應該为反汪之故而做蔣的御用工具。因此在胡回国的時候，由王昆仑、鍾天心两人，从上海迎胡于香港，同胡一同坐海船回上海，預期利用在輪船上的空閑，由王、鍾交出我們一批人的联名信，希望胡北上，仿照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提出对党政軍的大政方針，一方面接近群众和青年，以大政治家的地位要蔣接納主张，才去南京，否則不如留在上海做在野派的領袖。不料胡完全不肯采取这种做法，最后說了一句私話：“你們要曉得我不去捧他（指蔣），自然有人（指汪）去捧他呀。”這句話，使当时幼稚而天真的我們，知道了政治上底子里是怎样一回事了。从此，我們便对胡汉民灰了心。一方面既不可能，一方面我們也还不願意，所以沒有追隨胡到南京去做官。鍾天心去了英国，王昆仑同我在《再造旬

刊》垮台以后，便先后到日本去住了一年光景。

五

胡汉民在南京做立法院长的两年多时间中，帮蒋介石打败了在湖北的桂系，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在河南的唐生智，又打垮了閻錫山、汪精衛及西山會議派在北京的扩大會議运动。对于这些事，我們都不以胡为然，因为帮蔣在軍事上成功，就是讓蔣在政治上一天比一天更独裁。蔣在打垮了扩大會議之后，召开所謂訓政时期的国民大会，想制定大权在握的約法，由蔣做总统。胡对此不贊成，蔣对胡也翻了脸，一九三一年二月底把胡扣留在湯山。这个时候，王昆仑、鍾天心同我几个人，恰巧都在南京。孙科看到胡那样替蔣卖力，竟得到如此下場，也决心反蔣了。胡在被扣中秘密传出話来，希望孙科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策动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另組反蔣政府。胡並且願意同汪精衛派合作，同蔣系的国民党分家。这正是我們当时求之不得的事，十分兴奋，願意为这些反蔣的預定目标而努力。从这个时候起，再造派的朋友們，便一心一意地拥护孙科，而孙科的政治影响及地位，也因扣胡之事而重要起来了。在孙科离南京前，叫鍾天心先去广东，叫我同麦朝枢（与李济深有关系的人）去沈阳秘密拉攏吳铁城，叫吳也反蔣而拉住张学良，以便在两广展开反蔣局面时，东北也加入。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为代表先去香港同汪精衛秘密接头。汪精衛的改組派在扩大會議失敗后也正在走头无路，当然一拍即合了。該年的五月，汪精衛、孙科以及国民党的一切老老少少反蔣分子，云集于广州，宣布成立党的非常會議及两广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幕中，孙科在党政方面的發言权

比汪精衛都大。梁寒操做非常會議秘書長，鍾天心做宣傳部主任秘書，王昆侖做《中央導報》主編，我做非常會議秘書而派赴上海秘密工作。汪精衛對我們十分客氣，幾乎開口就說他的改組派“同你們再造派應該多多合作”，似乎把我們捧得很高的樣子。

六

非常會議的兩廣本在計劃出兵討蔣，不料突然發生“九一八”事變，國難開始，使得寧、粵兩方不能不謀和而對付外患了。蔣派陳銘樞、蔡元培等人為代表，答應釋放胡漢民、李濟、居正等人，蔣自己願引咎下野。兩方先在上海開和會，然後廣州結束非常會議。汪精衛、孫科、鄒魯等人代表非常會議到了上海，同蔣派的代表開寧粵和平會議；胡漢民等人，已經自由地到了上海。這個時候，我們幾個朋友拼命地拉攏胡、汪、孫三個國民黨文人巨頭合作，西山會議派的元老覃理鳴（振）同我們有同樣的想法，由文人大團結而制止蔣不能再獨裁，誰也不再被蔣利用。胡、汪兩人當時口頭上答應得很好，而實際上畢竟還是各懷鬼胎，我們在政治上又太天真了。

一九三一年底，蔣宣布下野，孫入京做了行政院長。為時不到兩個月，財政上蔣派宋子文暗中搗蛋，孫內閣陷於一籌莫展之境。胡漢民由上海去香港，做兩廣軍人的政治后台人物。汪精衛同蔣介石早有勾結，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對日抗戰時，汪同蔣突然在杭州會面。蔣又復職主軍，讓汪繼孫為行政院長，又一次証明了國民黨文人大團結根本是幻想。一九三二年這一年，我們幾個人隨着孫科在上海，生活上也靠孫維持。蔣對孫在上海並不放心，隨時暗中有人來拉攏。這時國難已日益嚴

重，孙也无意再去两广或香港走胡的路綫。在我們的奔走下，孙科約集一些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員，提出了一个“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內容主张制定宪法，开放政权，讓国民党以外的党派，都能公开平等活动。对于此案，蔣認為可以利用，汪表示无所谓，胡暗中不贊成，实际最不痛快的是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此案因蔣首肯而通过，CC派已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权，以后不由一党专政，等于叫CC派失势，因此陈氏兄弟更痛恨並排挤以孙科为首的我們一派人。孙科以政治主张被接納为理由，于一九三三年初到南京就任立法院长；我們几个朋友都当了立法委員。立法院負起草宪法的責任，但上面有国民党政治會議的直接控制，我們虽然心想制定一部比較民主的宪法，事实上就不可能。后来出籠的所謂“五五宪草”，我們虽然也是起草委員，但內心並不贊成；不过大家既做了官，只好随波逐流了。

七

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替非常會議做秘密工作时，曾同日本的少壮軍人武官田中隆吉有过接触。我深深感觉到日本人对中国的內爭或內战热心的程度，竟超过中国人。从事实中我也体会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真是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極的。我們这一批人，从一九三三年做立法委員起，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四年中，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收入上相当优越，頗滿意于那种官僚生活，一方面不滿意蔣的步步对日妥协、对內独裁，理想与现实太不調和了。在此期間，我們几个朋友都曾分別到两广以及华北各省，想寻找政治上的新出路。当时我們覺得蔣不会决心抗日，而除蔣以外，又找不出代蔣的人或势力，內心

里有徬徨无主之感。

西安事变这件事，当时真是一个突然的大变化。事变一发生，我们一批朋友实在兴高采烈，以为蒋的生命必有问题，独裁被打倒，抗日也有希望了。事变的结果，竟由张学良亲送蒋回京，完全出乎意外。当然，事后我们逐渐明白中共决策的英明，认识了延安对于促成全国一致抗日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同苏联恢复邦交，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同情救国会的七君子，孙科都表现得很积极。我们在孙科旁边，也起了一些推动的作用。总之，经过了西安事变，全国抗日的政治形势已形成，不由蒋介石以及CC派人们再想对日妥协了。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前面都发见一条非走不可的大路，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八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爆发，蒋介石为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起来抗日，中国的局面从此走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既起，孙科在一年多中间，曾两次被派到苏联为特使。苏联不但在精神上大力地支持中国，在军事上、物资上也给予很大的帮助。如果当时没有苏联的飞机及人员在前线替我们出力，武汉的陷落必然会提早半年。我们几个朋友十分兴奋，各人就各人的关系，发挥一些奔走呼号的作用。那时社会上座谈会很多，只要不是与CC派有关的，我们都一概参加，实行“有力出力”的原则以自慰。汪精卫派同CC派暗中都是反对抗战、希望同日本妥协的，他们形成一种投降运动的政治暗流。我们同一切进步分子呼应，打击这种运动。德国大使想调停中日之战；汪派陈公博赴意大利，企图以国际法西斯力量阴谋中止抗战。结果汪精卫及大部分改组派人

們，竟因陰謀不得逞而走上了漢奸的道路，真是國民黨人的恥辱。在爭取持久抗日的意義上，我們追隨孫科，當時頗為努力。延安的報刊以及中共負責人，那時常常有“賢明的國民黨”應當如何如何的說法，我們對此非常听得進去。那時這個說法確也對我們發生了推動作用。

九

在抗戰八年的中間幾年中，我們在抗戰初期的興奮情緒已趨低潮，大家又沉悶了。蔣介石不但不因抗戰而重視民眾，開放政權，反而因形成了他是“民族英雄”之故，更加自高自大，政治上也更為所欲為了。經濟上法幣日益貶值，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集團一天天長大，犧牲的是全體人民以及蔣系以外的異己分子，得大利的是圍繞獨裁的最少數人。社會上則發國難財的商人最活躍，靠薪水生活的公務人員一天比一天清苦，形成了小資產階級的沒落。我們一些朋友也難逃這種命運，不但政治上煩悶，連生活也成問題了。

一九四四這一年，蔣系軍隊在南北前綫各地打了敗仗，政治上日趨法西斯化（成立中央訓練團，軍統、中統勢力加大），前後方人民痛苦加深，重慶政府抗戰的局面有土崩瓦解之勢。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以及軍隊司令史梯威將軍，一致不滿意蔣的法西斯，主張開放政權，不應歧視延安，想推動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孫科在此時與高斯往還甚密，我們幾個朋友（梁寒操除外）又興奮起來。同我們主張一致的立法委員于振瀛、許寶駒、左恭、屈武、譚小岑等人，從旁推動孫科做國民黨革新派的領袖。當時孫科頗得蘇聯、美國及國內各黨派以及一切進步人士的好

感。因此，孙及我們也就大遭蔣系的側目。蔣以流氓的作風，压迫罗斯福召回高斯及史梯威，並以投降日本为要挾（日本那时拼命想同蔣妥协），罗斯福竟然照办。美国对重庆的压力和緩下来，政学系的张群、吳鉄城等替蔣暗中拉住孙，結果孙不能坚持斗争，使我們以及許多对他抱有希望的人大为失望。

十

抗日战争八年間，再造派的几个朋友們就分化了。蔣介石看中了梁寒操，先叫他去新疆拉盛世才，好象加以重用的样子。后来叫梁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正是孙科想领导国民党革新力量，为各方民主人士所推崇的时候。宣传部当时的論調同孙科的論調是对立的。因此，孙对梁大不滿意，梁也就变为蔣系御用文人之一了（可以說是陈誠派的蔣系）。王昆仑在“九一八”后开始閱讀进步書籍，抗战后与中共方面往还頗多，从事民主运动，走向左的方面来了。鍾天心因为广东人的关系，在孙科旁边逐漸比我們更亲密，政治上也就以孙的意志为意志了。尤其是回到南京以后，孙竞选副总统以及主持行政院的时候，鍾天心是替孙最卖气力者，他担任了水利部长。截到現在，他对孙还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講，他可謂全始全終的孙派了。在重庆的时候，我是站在王昆仑、鍾天心中間的一个人，我对中共沒有認識，总觉得共产党党性太强，同时对苏联也有誤解，所以不敢走王昆仑的路綫。但是我对在重庆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有好感，也側面做了一些有利于民主运动的事情。基本上我覺得孙科不能坚持做国民党革新派領袖，同蔣党分家，內心里頗为悲哀。当时我心理上的中間状态，与我后来从事所謂“第三势力”运

动，政治上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误，的确是分不开的。大陆要解放时，我又逃到香港从事第三种势力的活动。我看到第三种势力的文人和国民党文人差不多，精神上感到苦痛。由于我不甘心在香港饿死或自杀，所以我在一九五六年投奔祖国来了。

巴黎和会期間我国拒签和約运动的見聞

叶 景 莘

一、外交委員會的产生和結束

北洋政府时期有过三个外交委員會。第一个是巴黎和会将开时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成立的，設于徐世昌总统府里。这个会因为反对签凡尔赛和約而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自行結束。第二个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初黎元洪任张紹曾組閣时設立的，委員長为黄郛，我是委員，但这个委員會並未开过会，我不知会址何在，会的存在时期亦很短。第三个大約是在一九二五年段祺瑞执政时或在較早些时設立的，委員長为汪大燮，他的惟一任务是邀集几个通晓国际法和熟悉条約的委員編一部不平等条約类編，将不平等的条件分类編列，以供修改不平等条約时的参考。这是他的宿願。类編印出后，会即結束，我未参加这个委員會。

現在我要叙述的是第一个外交委員會的事情。一九一八年十月徐世昌被选为总统就职，十一月十一日欧战停止，十二月一日外交部长陆征祥出国赴巴黎和会。他先到日本与日首相商談，离日上船时就發現丢了一个公事箱。国内輿論本認為陆非外交人才，且为签订《民四条約》者^①，頗为不滿。陆出国后，外交次长陈箴代行部务，他資历甚浅，声望不高，一般人都認為不足以应付局勢。于是梁啟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議在总统府設一

个外交委员会，任外交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徐採納了，並以孙宝琦、熊希齡、陆宗輿、李盛鐸、林长民、王宠惠、沈瑞麟、陈籙为委员，林长民兼事务长，我是管秘書事务的事务員。徐世昌原是个極圓滑的老官僚，他虽被段祺瑞拥上台而自己並無实力，所以要拉攏各党派以增加他的势力。那时他已聘林长民为他的顧問，林劝他請梁啓超赴欧洲游历，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为中国游說，徐也採納了。这个外交委员会設在紫光閣西南角旁边的几間小房子里，虽在总统府內，与府的办公处是隔离較远的。除汪、林二人及事务員們每日到会外，委员常来並对会务关心的只有熊希齡一人，王宠惠亦有时来，其他委员来开会时都是敷衍态度。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对和会的政策都是由委员会决定的，专使来电都是由外交部送委员会的，但实际上並非如此。重要的来电确是抄送給委员会看的，但未必是全部。

外交委员会成立后，汪、熊二人即联合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提案，共五大綱，首列破除势力范围，分目为收回租借地和铁路附屬地，統一管理铁路，撤銷外国邮电机关。其他大綱为取消領事裁判权，关税自主，撤退外国军队，停付庚子赔款。梁啓超出国前，亦来会与汪、熊、林、王等討論了这个提案，以便在外接

①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五月七日午后三时，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內答复对二十一条究竟是否承認。九日，外交总长陆征祥奉袁世凱命照会日使館，对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認。二十五日，陆征祥与日本全权代表日置益簽訂《关于南滿洲及东部內蒙古之条約》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約》，承認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滿与东蒙之权益和繼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

洽。提案經委員會开会討論审查，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一致決議通过，由汪、林二人亲呈徐世昌，奉命交院發。次日由林长民亲交代总理錢能訓，于八日电致各专使，正在陆征祥抵法之日，三日后和会即开始。但以后我們才知道国务院电专使只将这个提案作为希望条件①。

另有一事徐却完全接受了委員會的提議：陆征祥赴法途中与广州政府所派代表王正廷相遇，到法后陆即来电报告代表五人及名次，为陆、王、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顧維鈞、駐荷公使魏宸組。汪看了这个名次甚为躊躇，因为和会只給中国三个席位，如五人輪流出席，怕有时对于和会情形有不接洽处；如由三人出席，則应为前三人，但陆无甚能力，王亦尙无外交經驗，且对和会須南北一致，不知他的主张究竟如何，施則为怕多事的一个官僚，向不活动，这三人恐不足以应付局势。汪、林相商不决，我建議只好把顧提升到第二位，使他当冲，因为顧来电最多，与美国代表方面的接洽报告都是他这个駐英公使打来的，施並無一电；且二十一条交涉后顧所写的英文声明書頗为得体，他亦熟悉那个交涉的經過。汪採納了，即将名次照改，与林同去請徐核定。徐同意了，汪、林回会，通知陈籙到会将新名单交他电發。陈拿这个名单出門时，低声說：“这是要捣乱了。”果然，

① 据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說，外交委員會所拟提案虽經政府于一月八日致电陆征祥令其照办，然被日本探悉提案有鐵路统一案，百計圖謀設法由中国人自动取消。不久，果有交通部总长曹汝霖、鐵路协会梁士詒等忽积极反对鐵路统一案。后竟由国务院再致陆征祥令其勿庸提出該項。陆征祥等遂依国务院前后訓令，作成我国提出和会之希望条件，並將外交委員會所拟提案中鐵路统一一項刪除（見該書下卷頁一六九——一七〇）。

新名單到專使處，王、施大諱，陸寤極，他到瑞士去躲避，就以此事為一原因。但以後在和會上為中國辯論，確以願為最力，並最能說。

委員會所提“破除勢力範圍”大綱里“統一鐵路管理”一項引起了大爭論。提案原文為：

“丙、凡以外資外債建造、已成未成、或已訂合同而尚未開工之各鐵路概統一之，其資本及債務合為一總債，以各路為共同抵押品，由中國政府延用外國專門家輔助中國人員經理之，俟中國還清該總債之日為止。各路行政及運輸事宜仍須遵守中國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揮之。”^①

這個提案的主要目標原是為了收回以外資建築、為勢力範圍骨幹的東清、南滿、安奉、膠濟、滇越各路，因為國家無此實力，故欲統一管理之，又因無贖回之財力，故欲將其資本及債務合為一總債而以鐵路收入還清。但以外債建築的如津浦、滬杭、京漢等各路亦與勢力範圍有關，如不包括於統一管理之內一律待遇，既不易得據有以外資建築各路的各國同意，且恐收入不足以早日償清總債而亦難於舉一總債，因此欲將外資、外債建造各路一概統一之。

外交委員會提案於一月八日電各專使，約一個月後，因中國代表在巴黎要發表包括西原借款合同的中日秘密協定，日使小幡於二月二日到外交部抗議，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登出反對鐵路統一的社論。而交通總長曹汝霖聲明對於統一鐵路案尚待研究，外

① 原註：林長民：《鐵路統一問題》，四頁。

交委員會委員陸宗輿亦稱彼在會本不贊成。先是，稱為舊交通系領袖的梁士詒已有反對統一鐵路的言論，至是乃與稱為新交通系領袖的曹汝霖一齊反對，認為統一即是共管。那時交通部顧問貝克和中英公司經理梅爾思各擬有“萬國鐵路團”私案，是共管性質，反對者即以此種提案與外交委員會提案並論。

二月十八日錢能訓約贊否兩方集會于春藕齋。汪、熊聲明提案與貝克、梅爾思提案無關，最後梁亦表示贊成之意。錢聲明雙方無根本不同之意見，辦法應再詳議。汪推曹、梁提案。三月七日國務院召集春藕齋第二次會議，曹、梁提出破壞原提案的草案，林長民因雙方爭持不下，擬了一個妥協辦法。汪不同意，會后即辭職不復到外交委員會。

平心論之，委員會提案中所舉借總債及延用外國專家輔助經理的條件，是因為當時實際情形不能避免，並非共管性質，但以後是否會流于共管，確應考慮。舉總債時如何方可不受新銀行團的壓迫，更是問題。熊希齡以為此等皆係商訂條件時所當注意，但政局多變，商訂條件者為誰，亦難保證。另一方面，破除勢力範圍單靠要求，無此實力；但不破除則勢將引入瓜分，提案人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理由。要之，原提案人的用意在於破除勢力範圍，並非為私，他們提出由交通部指揮，而當時他們在交通界並無一個立足之點。梁士詒提出已成外債各路不在統一計劃之內，有保持他由於管理和調運鐵路收入而來的“財神”頭銜之嫌疑。曹汝霖在順天時報反對後出場，陸宗輿在第一次春藕齋會議時，竟為高徐、濟順兩路辯護是商業性質而非政治性質，則簡直的與日本“一鼻孔出氣”了。這是贊否兩方主要不同之點。徐、錢則以圓滑手段依違兩可于其間而終偏向親日派。曹、陸被稱為親日派，

汪、熊、林等則被稱為親英美派。

親英美派是一班無拳無勇的知識分子，在國力太弱時，過分寄望於和會，尤其是對於威爾遜的和平條件十四條，以為公理或可戰勝強權而欲借他人之力來保持自己的國土，這只可說是可憐。但外交戰術本當利用形勢和對方間的矛盾。在歐戰中，英無力東顧，日本已幾乎大嚼“獅子”的一份肥肉，戰後美國在海軍方面又與英並駕齊驅，紐約還要奪取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勢力平衡為傳統外交政策的英國，本已利用後來的美國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以保持他所奪取的中国利權，戰後他更得以“血液于海”的甜言，利用日美間的矛盾以聯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對於外交委員會所提破除勢力範圍一項，曾由兩國公使表示贊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爾典都曾宴請爭論鐵路統一政策的當事人而於宴後暢談這個問題，並都聲明貝克與梅爾思的私案與使署無關，他們二人亦不能向和會提出。與美使會談時，汪大燮提出三點：“（1）債權國權限只能及於投資確切，本利有著，其他不能過問；（2）執行之權完全歸中國政府，他國不得過問；（3）為使資本家安心起見，可設立評議部，以便稽核或建議改良。”^①其中第三點是因為當時鐵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虧欠而提出的。林長民曾刊印一本《鐵路統一問題》，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詒曾表示應當保存勢力範圍而“賴均勢以求存”，他的機關報也發出了這種言論。當時我曾寫了一本《撤廢勢力範圍論》小冊子送各處以辟之。

汪大燮辭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徐世昌屢次慰留，亦不肯回

① 原註：林長民：《鐵路統一問題》二十三頁。

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与英、法、俄、意訂立了繼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的¹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絕签和約。英代表劳意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則已因阜姆港問題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讓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紛来，林长民乃亲到湯山悬汪回会視事。

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賽和約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讓与日本。五月一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約，則对撤废領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賠款、关税自主及賠償損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較有把握，亦是問題。他怕将来与战敗的德国直接交涉失敗，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會議决定不簽約，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發。但二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簽約，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潛去报告他。三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結束会务，並自草自繕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約司长錢泰接收。林密电梁啓超並請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囑發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輝校长，說“政府主签，我們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請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隨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經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頁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記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問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說：“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馬車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會議。北大学生原定于五月七日

(即一九一五年日本發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紀念日)游行，于是決議將日期提早三日，因而“五七”运动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二、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們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組織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各省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蘊宽十人为理事，並推幹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牘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欽。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煩，郑不能应付，又請英文导报經理梁秋水任秘書。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幹事經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

“五四”运动中，学生被捕三十六人，各校长和汪、熊、王等都請警厅释放，未允。协会决定于五月七日国耻紀念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那天清晨，梁秋水从煤渣胡同东口导报館（今人民日报宿舍）到石虎胡同，路过公园，見园門关闭，門外有武装警察十余人，並架起机关槍。他到会不久，即有武装軍警三十余人进来，在院中站滿。梁問何事，答謂由衛戍司令部警察总厅派来，禁止在公园开会，不遵命即逮捕会员，封闭会所。梁問：“司令部和警察厅是日本机关，还是中国机关？”答謂：“是中国机关。”梁又問：“諸位薪餉是日本的錢，还是

中国的錢？”答謂：“是中国的錢。”梁三問：“諸位知道我們为什么今天要去公園开会？”众答：“不知道。”梁告以是为反对簽和約，又說：“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們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們，……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請快快与我們同去公園开会。”众皆无言，梁請他們进厅休息，餉以茶烟。有一个衛戍司令部人員說：“我告訴你眞話，會員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閉，但公園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梁答謂：“俗語說，‘來者不怕，怕者不來’。”那时會員陸續到了一百多人，梁指道：“自来送死的愈来愈多了。”双方相持許久，那个衛戍司令部人員請梁想个办法。梁沉吟些时說：“如要我們今天不去公園开会，今天必須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那人打了多次電話，最后說，“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但問誰負責。梁說：“我姓梁的負完全責任。”于是軍警散后，會員們整队向天安門进行，在新华門前与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一齐轉向前門，沿路高呼“反对巴黎和約”，散放传单，熊、林二人亦赶到了。會員們一部分到商会开会，一部分到先农壇去开会，下午四、五点钟回石虎胡同而散。

五月八日，北洋政府又頒布彈压学生命令。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講演，被捕的为数更多。但各地民众已相繼起来，罢課罢市，抵制日貨，遍及全国，北洋政府被迫罢曹、陆、章等。六月十日，徐世昌咨两院辞职，但仍通令各省主张簽約。六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电各专使簽約。二十八日簽約之日，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周鯨生先生就是去包围的一个。本来各专使並非无爱国思想，更非亲日派，未必願簽約。陆征祥突是个好好先生，我們常批評他不过是个“大禮官的材料”。他也許会迫于政府命

令去簽，如袁世凱命他簽《民四條約》一樣，但亦不能與曹、陸一概而論。其他專使都是精明機警的，即使專為個人着想，亦未必肯負這個簽約的責任，來蹈曹、章的覆轍。當時各處電專使拒簽的电文有極严厉的。那時陸原是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是總幹事，王寵惠和我是副總幹事，我們于三日以三人名義電陸勿簽，我起的电稿最末說“如簽，回國不利”，蔡以為不應恫吓他而刪去了。但國民外交協會連去三電，第三電全文為“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此外各處去電必有更激烈的，專使們敢犯眾怒嗎？專使寓所既被包圍，于是不去凡爾賽簽約而對巴黎各報發表了一個正式聲明，歷述中國代表團的苦心：如四月四日對和會的抗議，五月六日關於山東條文保留的提議，五月二十六日在保留條件下簽約的正式通知，並舉出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維也納條約簽字時瑞典代表保留三個條文而簽約的前例，以駁斥保留無前例之說；以後中國代表又提出將保留條件作為和約附件，不被接受；又提出在赴凡爾賽簽約前送一保留山東條文的聲明，而和會主席只允在簽字後送去；代表團以簽字後的聲明效力可疑，又提出修改聲明字句，亦不被接受。因此，聲明最後說，中國代表團為正義，為國家，只有不簽約，以待世界輿論之裁判^①。這個聲明是否預先擬好的，不得而知。

拒簽凡爾賽和約，除少數人如曹、陸、章一派外，是全國人民，包括群眾、學生、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統治者或曾充過統治者的一些人的愛國思想和力量聯合起來所造成的結果。

① 原注：麥克莫雷：《與中國訂立的和有關中國的條約協定匯編》，1496頁。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余从清甲辰（一九〇四年）即作革命运动，辛亥时在福州桥南社主建言报编辑，同盟会总机关部亦设在社内，因推余坐镇，故于福建革命活动及光复情况，知之最全面。余在广州任大本营建设部主任秘书时，即欲撰写福建光复史，以征集材料未齐，迄未着手。迨抗战上海失守，政府移重庆，立法委员疏散，余挈眷避居汉皋。翌春立法院在重庆复会，余因船挤先行，及武汉事急，受人匆匆赴重庆，以材料笨重，寄存法租界同乡商铺。及武汉失守，不可复覓。十余年积集，付诸一歎。现余八十一岁矣，记忆力日衰，仅有轮廓存于脑际，及今不图，过此以往，恐仅此轮廓亦将消失模糊。因凭记忆力所及，写之作为国庆献礼，供后之编福建革命史者参考。

第一章 光复的前景

第一节 曙光出现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日人索割辽东。清廷以辽东为其发祥地，且逼近北京，难之，遂有割閩换辽之议，引起閩人极大震惊。后虽改割閩为割台，然台故閩属，台人多閩籍，地理上、经济上关系极为密切，閩人固不能忘怀。而日人得寸进尺，舐糠及

米，閩亦終將不保。又以清廷腐朽貪暴觀之，非仅失台已也，又将亡國。于是開明人士、血氣青年，竟起而談國事，既憤外人之侵侮，尤憤清廷之無能与壓迫，救國目標遂由對外而對內。于時活動可分三派：一、革命派，二、進步派，三、君憲派。進步派人數最多，只有零星結合，設閱書社，辦小學，組織講演會等，目的在於開通風氣，培養後進。君憲派發動最晚。革命派中有下渡文明社、侯官小學校、莆田勵菁學校、連江光復會及高等學校、師範學校中學生。文明社由鄭叔、鄭祖蔭、林斯琛等創設，在下渡十境祠，以閱書社面目出現，內容則為革命機構，借開通風氣之名，與社會上及學校師生具有革命思想者聯絡往來，而下渡小嶺益聞小學校亦為其活動之地，並與省外通聲氣，尤其上海及留學日本同志。又以哥老會有反清宗旨，且在軍隊中具有勢力，謀與結合，先由鄒燕庭設法加入福州復明山堂。復明山堂為福建哥老會最大組織，燕庭加入後，吸引林斯琛、劉元棟、黃光弼、嚴漢民等相繼加入。其中頭目尹蘭亭等因時時往來，文明社漸引謠駭。燕庭又自設共和山堂，散賣票布。林斯琛等以過於招搖，而哥老會宗旨久失，僅成為江湖上秘密組織，不能起政治上作用，殊失所望，因漸停活動。然已為清大吏周蓮所注目，緹騎四出，將興福獄，文明社遂解散。林斯琛數人避往莆田，事靜乃回，秘密組織漢族獨立會，機關設在下渡古榕書院。及中山先生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同盟會，委鄭祖蔭為福建支部長，林斯琛為總幹事，于丙午夏季成立支部；漢族獨立會並入同盟會。

第二節 橋南公益社成立

古榕書院地雖稍僻，耳目較少，然為時久，往來繁雜，鄉人

疑为圖謀造反，始而窃議，終而反对，因又不能不舍棄此据点，採取按区各自关联办法，但过于分散，不便活动。林斯琛因与热心公益負有乡望人士陈能光、郑季明、刘翰侯、林澤人、陈秀榕、王鴻慈商在梅塢設立桥南公益社，推郑季明为社长，社内附設去毒社救火会，时清戊申年也。林斯琛坐鎮其中，一面进行公益，一面筹划革命活动，社員对于公益特有兴趣，成績斐然，去毒救火，尤受称道。桥北各境受鼓动，亦相繼設立公益社，又以事业关联，設立联系机构于桥南社内，名为“社会办事处”。

桥南公益社虽仅为掩护革命工作，然公益事业范围广泛，在在与腐敗政治發生抵触，一方面則借以伸张民气，激动民憤，造成厭惡清廷心理，一方面則暴露清廷罪恶和无能，挫削清吏威望，尤其在外交方面，如力爭收回三府矿权之类，无形中为革命創造很多条件。次則便于注意有为之人，吸引其向于革命，或介紹为會員，就中最起作用者，为与君宪派合办之建言报。

君宪派势力单薄，以桥南公益社乡望甚隆，可为声援，由张海珊、赵桐友为中介，漸相接近。庚戌冬，林长民（宗孟）、刘崇佑（松生）等向桥南公益社建議，合办建言报，社址設在社内，館务亦由桥南公益社主持，推举张海珊主笔。涉春海珊离职赴厦，刘通接充报政，言論趋于革命方面。辛亥三月廿九日广州失敗，建言报以側面法表揚举义，表揚烈士。君宪派本欲利用建言报为宣传君宪工具，却变为宣传革命工具，認為上当，大起責言，然无可如何矣。

第三节 辛亥三月廿九日之慘痛

中华同盟会总部設在日本东京，辛亥二月間，決定攻取广

州，福建同志遣林覺民回閩，征會員前往助戰。覺民三月初至福建支部，即召開會議，決定兩項：一、推劉元棟、馮超驥、劉六符、吳適及元棟所屬郭維亮、林友基，吳適所屬光復會會員前往；二、廣州下后，林斯琛在廈門設法阻止福建軍隊援粵，劉通擔任在福州響應。議既定，吳適回連江部署。覺民在家，廣宴親友，隱示永訣之意。三月十一日，覺民出發赴香港，同行者劉元棟、馮超驥、劉六符、及元棟所屬郭維亮、林友基数人。吳適因會員散處，召集需時，定次期繼往。斯琛以各同志均未到過廣州，且不諳粵語，介紹方應困、李長順加入本會，隨往帶路。斯琛旋亦赴港接洽。及三月廿九日失敗，福建死者三十余人：由日本東京往死事者林時燠、林覺民、林尹民、陳與桑、陳可鈞、方聲洞；由閩往死事者馮超驥、劉六符、劉元棟及連江光復會員，僅郭維亮、林友基、黃以通生還，吳適被逮；由廣西往死事者陳更新，而嚴漢民避入同鄉鴉片烟鋪獲免。吳適率所部二十余人三月廿九早始抵香港，即趁港粵早渡入廣州參加，全數犧牲。吳適逃出小北門，以迷途越兩日被獲，判處斬監候，寄押番禺縣監，夏中遣李質文赴廣州探視並營救。是役，福建中堅分子多死難，精華殆盡，人之云亡，有餘痛矣。

第四節 重整旗鼓

在閩革命同志既痛亡友，益傷國事，決以再接再厲精神，繼承遺志。林斯琛赴滬，溯江訪譚人鳳等計議。時彭壽松鋒芒稍露，聞于布政司尙其亨，欲以利祿誘之，召與溫語，並為介于端方。端方在漢口，壽松商于同志，均主應行，且武漢同志甚多，可以有為。壽松至漢口，與張振武等取得聯繫，旋向端方托詞回

閩接眷，既归即从事运动军队。以同盟会吸收会员甚严，难于发展，乃别设军警特别同盟会，使其侄蔭祥主其事，张祖汉、李焕、黄震白等辅之，先树立中坚，而逐渐广泛收罗，由下而上，由士兵而及官长，由僚佐而及实力人员。另一方面，寿松又运动哥老会各山堂，联合为一，秘语为收通铺，就其中苦水多者组织联络员。苦水亦秘语，谓敢做敢为敢杀人也。

桥南公益社借公益名义，设体育机构，培植武力，吸收仓前山教会学校如英华书院、福音斋等处学生，学校青年亦有加入，使冯金荣兼任教练。

徐锡麟、吴樾、温生才革命案件迭出，清吏尤其大员岌岌惴惴，草木皆兵。黄花岗战役，閩人壮烈牺牲，且多籍紳子弟、优秀学生。革命惊涛骇浪，并弥漫福建政界中。总督松寿思以温和手段，设计缓化；将军朴寿则厉兵秣马，汲汲备战，旗人中文楷等并组织杀汉团。

第二章 光复之情况

第一节 酝酿

光复福建者，湘军之力；运动湘军举义者，彭寿松之力。

清光绪甲申，法军寇閩，清廷派左宗棠率师入閩，所带皆旧部湘军孙开华等。左宗棠病歿，湘军仍留閩，以原有绿营不可用也。湘军遂成福建唯一有力之军队。清廷改革军制，福建军队编为第十镇，时孙开华已故，湘军由其子道仁统帅，因升任为统制。下设协统，许崇智任之（其他尚有直轄于总督如中协、城守协等，其兵力皆微不足道）。福建武备学堂第一期保送日本士官

学校学生畢業回国后，添設炮兵、工程两营，以萧奇斌任炮兵营管带官，林文瑛任工程营管带官。軍隊情况概略如是。

彭寿松，湖南长沙人，父某以武弁随左宗棠来閩，曾任台灣某武职，病歿福州，因家焉。寿松捐貲充福建佐杂，倜儻不羈，好用意气。某年元旦，在湖南会馆团拜，毆打同乡某，为布政司参劾，革职失业，怏怏仇恨清吏，並及清廷，因傾向孙中山革命主张，然无由自进。适福州人士陈不浮留学日本，畢業回国，在船上失足墮海，革命派利用为鼓吹，指为痛憤国事、蹈海而死，發起追悼大会，一般人附之，在泛船浦广东会馆举行，傾动城内外人。彭寿松撰輓联，將髮辮剪附于联，悬挂台柱，並于会上致悼詞。刘通、高鴻異之，相約造訪，晤談数次，見其革命意志坚决，遂成密友。刘通为介于林斯琛諸同志，斯琛等以寿松曾与福州恶少游，及任保甲局，恶少均被惩治，疑之，然亦予留意观察，頗有往来。后寿松移居下渡小岭，过从更多。辛亥三月，乃請其加入同盟会。寿松以革命須靠武力，爭取武力必須从軍警下手，而同盟会难于吸收会員，乃設特別軍警同盟会，运动湘軍。寿松既湘人，又湘軍將門后人，有更深淵源，且系哥老会中人，故游說較易。光汉义旗照耀后，进展尤易。至九月初，軍警全部加入矣。武昌举义，全国震动，寿松偕李質文赴上海有所商，質文並学制手擲炸弹。九月初同归，質文就孤兒院开制，而炸药須鉀氯氧配合，鉀氯氧为新譯的名詞，福州西药房无識者。刘通知旧譯鉄氯氧，乃得購。財力奇絀，工作几不能展开，斯琛电囑李恢向总部借十万元，亦于九月初匯到。至是革命已进入發动阶段。孙道仁初甚犹豫，惟軍隊已全部加入革命，不得不順从，先由洋行买办蔡展庞向林斯琛示意，並要款項后，乃与彭寿松、林

斯琛等在甲板船上会商手續及部署日期等。議既定，却發現軍士每人只有四五發子彈，不能發動，時守屏山軍械庫員兵，亦皆加入軍警特別同盟會，乃偷凿牆垣，于十六、十七兩晚將子彈秘密輸送。于是十九日拂曉炮聲作。

第二节 作战部署和兵力

十八日，統制孫道仁發出部署密令如下：

（一）令二十協協統許崇智為前敵總指揮。

（二）旗界除東門開放以外，湯門以南，環繞旗汛口、大王府、慶城寺、鰲峰坊、觀巷等處與旗界交接各街道地帶，都分布進攻和堵截部隊，以于山為總攻陣地，前敵總指揮部設在于山觀音閣。

（三）由橋南總機關部密報各社團聯甲等，于本晚緊密巡防，嚴守柵門，九時以後，無口令不得犯夜過柵，口令另發（本晚口令為女子兩字）。

陸軍第十鎮駐省垣之兵力如下：

（一）步兵第三十八標第三營兵力有四隊，前左右后各隊由管帶官（即營長，下同）胡季高指揮。

（二）騎兵未成營只有一隊，馬四十余匹，由隊官黃安源指揮。

（三）炮兵營只有兩隊。在戰綫上有德國造最新式克虜伯過山炮四尊。左隊隊官陳桂生，中隊隊官楊國政，由管帶官蕭奇斌指揮。

（四）工兵營只有兩隊，由管帶官林文瑛指揮。

（五）輜重營原有一隊，由隊官鄭坦指揮。

(六) 宪兵营两队分驻城台两区，保衛治安，由管带官俞紹瀛指揮。

(七) 二十协两标新征兵有五营，新兵尚未入伍，各营官长临时混合編成作战，軍官队有孙葆鎔、沈觀恩、王琛、林肇民、沈国瑛等，归总指揮部調遣。

(八) 二十协两标征兵营尉級官长，有講武堂初畢業学生孙本戎、朱震；张祖汉、方毅、郑庆奇等四十余人，临时編入总指揮部作战衛队，称为学生軍官队，归总指揮部調遣。

(九) 延建邵統領徐鏡清奉孙統制电召，率两营部队于十九日早到达省垣，加入作战。

(十) 二十协三十九标第一征兵营駐长門划鰍港，管带官陈錦，又駐馬江管带官吳景震召率全部队伍于十九日下午四时到达省垣。

此外，尚有非正式队伍协同作战，如下：

(一) 先鋒队及差遣队：由各山堂兄弟中退伍及閑散官兵編成，归彭寿松指揮。

(二) 炸弹队、洋槍队：由桥南总机关部将体育会會員分編炸弹队，于是晚随彭寿松上于山作战；洋槍队分为一大队三小队，大队保护仓前山領事館及外侨，三小队分佔大清銀行分行、中洲水亭稅厘局、泛船浦电报局。

(三) 民团义勇队由各社团練勇抽調及自願参加战綫工作者編成，由楊琦、方应团率領参加作战。

敌人之兵力如下：

敌军按八旗編制，上級为参領、协領，次为旗領，共二千五百名。清光緒末，抽选精銳編为捷胜营，兵額二千名。預备作战

时，又組織杀汉团，約五百名，分两队，一为大刀冲锋队，一为汽龙洋油放火队。合計有五千名整。

第三节 开 战

許崇智奉到作战命令后，严密布置，是晚（即十八晚），率队上于山。于山俯瞰旗界，为必爭之地，敌人失此先着，已成为困守一隅之局。彭寿松亦率其組成之先锋队、差遣队上于山作战。寿松並於于山观音閣內設立軍警同盟会办事处，管理临时事务。桥南总机关部，由刘通召集將訓練之体育会會員（多数为学生）告以今晚起义，曷以奋勇，分为炸弹队、洋槍队。編成，适寿松赴于山經桥南社，即将炸弹队交其带往。洋槍队分为一大队、三小队，大队巡防仓前山，保护領事館及外侨；三小队分別佔領大清銀行分行、电报局、水亭稅厘局。另一面通知各社团加紧戒备，發送白布臂章（上書公权二字，盖同盟会印）以为符号，並密传口令。敌方亦积极巡守，佔据水部城樓，並將工艺传習所職員吳和軒抓去斬首，剝腹悬尸以示威。

十九日拂晓，我軍开始进攻。我軍炮兵陣地設在于山，炮弹威力甚大，曾命中將軍署。敌人惊慌，企圖佔領于山，夺取大炮，于山成为勝負枢紐。敌人潛据公立法政学堂宿舍，射击我炮兵陣地，我伤亡十余人，炮营中队官陈桂生面部受伤。后为我軍發現，命炮击毀宿舍，同时高节里叶姓花厅为炮弹所中，發火燃烧。敌人又由杀汉团文楷率冲锋队，从呂祖宮冲至八十一阶集中安奶庙，另一队从太平街山麓白塔寺爬山而上，協合圖跃攻，为我軍痛击，狼狽逃回。自是計穷力竭，惟有出于投降一策矣。

午后零时，敌豎立白布降旗于水部城上，文曰“將軍出走，

停战議和”。我軍認為非誠意，仍繼續炮击。敌人乃豎第二面降旗，掛于于山天君殿前面榕樹上，文曰“請求停火，全部獻械乞降”。許总指揮巡察陣地，見白布飄揚，以遠鏡視之，下令暫停炮击。旋來降使一員，手持白旗，文曰“獻械乞降”，后随挑夫數人扛步槍机柄數担，求見許总指揮。其人系武备第一期正科畢業生吳振翔，与孙、許为師生，由前哨引押至总指揮部。許允所請，派排長陳金魁同往河東街蒙古營前副都統明玉家招撫。去久未回，又派工兵營隊官王嘉凱赴旗界探查。少頃，金魁、嘉凱督押敌方官兵出水部門至南較場呈繳无机柄槍杆及子彈。我軍則于于山大士殿前面安置机槍監視。敌人繳械后，在較場橫列縱隊，向南盤坐地上，每人發給銀洋一元遣回。

第四節 維持治安

方五六月間，时有革命謠傳，人心風鶴。商界及各人士公呈閩浙總督松壽請派團隊防范治安，准批由地方自籌辦理。于是商團首先成立，約有一大隊，請馮金榮任訓練教官。繼者有勞工民團義勇隊，楊琦任訓練教官。而各公益社亦組織團練隊，由各社救火會中撥丁抽練。各鄉保則組織聯甲，設立柵門，按戶抽丁或雇丁輪流防守。林雨時、王鴻慈抽調各救火大會撥丁組織救火大隊，集中一處，以防不測。戰時，彭壽松更遣倉前名營營者率其徒黨協助維持。故敌人無法施其突襲，而宵小亦無從生心。

次日，总指揮部派學生軍官隊方毅、孫本戎、張乃誠等全隊入旗界挨戶搜查槍械，各校學生帶有臂章符號者數十人，自動隨往。聞朴壽避在明玉家，詭稱奉孫統制命請到于山面商善后。朴壽辭以不能行步，众為雇小轎，並由八旗統領德潤陪往，禁于大

士殿客堂，旋由軍警同盟会办事处接收。后彭寿松命其他往，至于山第四炮台边，押送者从后以刀砍之，死于观音閣亭下。

十九日于山之役，炸弹队王清銓、王耀西因深入脱队，为敌人撈杀，王傑功口唇受伤。排长江道森守柵中弹，死在医院。炮兵营雷长兰某，在于山中弹陣亡。炮兵营管带萧奇斌戴假髮穿长衣上陣，作战未久，托称呕血回家，遣其弟其煊到桥南总机关部向刘通报告。工兵营管带林文英临陣逃回六桥乡，船至半江，为邏队撈获，拘送司令部。

十九日早战事作后，閩浙总督松寿吞叶子金自杀于盐道前（在督署后門）高开榜画像店。旗都統胜恩夫妇十九日午后自投花巷司令部請罪，孙統制予以温慰，事定后，資送其全家回籍。鑲黃旗协領兼营务处定煊，十九日晚在室内自縊死。正兰旗参領兼捷胜营管带长志投井，被救，后数日，在馬江海潮寺出家为僧。捷胜营队官郎乐額三个兄弟及全家男女十余人，以煤油浸湿棉被札盖身上，放火自焚。繙譯官何芝田全家投于蒙古营宅內紗帽井，被救者仅男女小孩各一人。滿校教員杀汉团組織者文楷，于八十一阶冲鋒时被获，拘数日，释放。

战事既定，当晚由桥南总机关部以軍政府名义發出安民布告。杉木公会撈葬队清理战区未埋尸体，葬于西山公墓。大吉陞剧班武三花徐春浦掠取皮衣一件，彭寿松立斬以徇，悬首南街郎官巷柵門。

第三章 組織軍政机构

二十一日，彭寿松到桥南社集合同志，整队入总督衙。寿松乘馬領先，同志步从。寿松手执紅旗，馬为旗惊，翻寿松于地，

幸无伤。进衙开会，議定組織軍政府，推举孙道仁为都督。都督府內並設參事員会，掌理民政，推举彭寿松、郑祖蔭、林斯琛、刘通、黄光弼、林晓等十人为參事員，寿松为会长，陈承澤为秘書。設民政、財政、外交、軍务、司法各部，后改为司。郑祖蔭提出名单：民政长、次为高登鯉、刘松生，財长为陈之麟，外长为林长民，皆諮議局中人。郑祖蔭亦諮議局議員。寿松反对，謂革命政权应操于革命党人。其时同志不欲初次發生意見，亦慮寿松夹袋中人多粗獷不諳政治，乃为疏解。寿松亦不坚持，乃照祖蔭主张。祖蔭本福建同盟会支部长，慮与軍警特別同盟会發生問題，力求摆脱，将支部长讓于寿松。會議时郑烈、李倬适由日本赶回。郑烈願任司法，李倬習警察，即将法长畀郑烈，任李倬以警察事务。二十三日在督署大堂举行都督就职典礼，陈設輝煌，衣冠整肃，鳴炮奏乐。孙道仁于乐声中步上礼台，其余参加者依次就位。郑祖蔭代表同盟会授予都督印，文曰“中华軍政府閩都督之印”。孙道仁接受后，即印貼就职紅告示。參事員会亦同时成立。二十五日，在南較場开追悼陣亡将士大会，並慰問烈士家屬及受伤将士。

參事員会本非善制，其后會員更有私自委托他人代理者，組織流于复杂涣散；入春改为政务院，举寿松为院长，郑祖蔭、林斯琛副之。院內設叙官等四局，刘通任局长兼院秘書长，黄光弼任副局长。后林斯琛任盐政监督，又推刘通任副院长。未几，袁世凱国务院以与制度不合，命令取消，省乃特設警察总监一职，位置寿松。

第四章 初政与失败

第一节 初 政

革命党人多只知牺牲与破坏，未注意建设，以为距成功尚远，将留待后之人也。故既无新建设计划，亦无旧政治经验，其所措施，多凭愿望，不切实际，且有应措施而不知措施者，然犹从爱国利民出发。迨后政权全入寿松之手，则日离轨道矣。兹举初政数事于下：

一、废除人民诟病已久之厘金。

二、免旧欠钱粮。

三、盐归官办，废除绅包。清制售盐各限地段，始由商包，后为绅抢。仕宦回家，宦囊充裕，恒企图接当铺、办盐馆，以其润厚且稳也。新政开始，即将盐馆收为公有，原有股本加以审核，发给盐票，按期支还。

四、不发纸币，维持金融稳定。

五、恤偿高节里被焚房屋。

六、选贤与能，重要政务多畀于党外人士，如君宪派高登铨、刘崇佑、林长民，华侨陈之麟，绅士刘鸿寿，旧官吏裴汝欽等，刘鸿寿且畀以盐务专责，虽多人反对，不愿也。

七、考试官吏。

第二节 失 败

彭孙之矛盾：道仁拥有都督名义，寿松则以福建光复系其一手所造，轻视道仁。道仁心弗能善，渐生嫌隙。第十镇军队虽参

加軍警特別同盟會，然皆道仁部屬，且樂道仁寬厚，畏壽松生辣。許崇智為孫部實力要人，戰爭時藩庫存銀為許所取，壽松爭之不得，大起責言，亦構成重大意見。壽松無法制孫，乃自設親衛兩營，由哥老會重要分子張煊、劉輔廷分任管帶，使其子彭厚庵統之。又使其侄彭蔭祥任延建邵道尹，李煥任延平知府，張祖漢任邵武知府，黃震白任建寧知府，更造成對抗形勢。益以失意分子挑撥，政客讒構其間，表面雖未至決裂，內心則仇結愈深，不可調和。

內部之解体：壽松與劉通有深交，且由其介紹入同盟會；鄭祖蔭、林斯琛以同盟會首要，均為壽松所尊敬。政權初立，壽松對三人恒能虛心接納。後壽松受馬絳生挑撥，而壽松左右又多眼短胸窄，以扼于三人，不能逞志，復造謠興謗，遂漸疏遠，獨攬政權，一意孤行，如野馬脫韁，奔逸無軌，外失人心，內亦解体。

蔣黃暗殺案：黃家宸，福清人，倉前山福音齋學生，參加橋南社體育運動，能作激烈言論，頗為壽松所喜。光復前旬日假回福清，光復後旬日始來，請集有數百人，請壽松編營給餉。壽松以事前未奉命令，中間亦無報告，却之。家宸屢求不遂，乃散布仇恨之言。壽松妻李氏從倉前山婦女界獲知家宸圖暗殺壽松，蓋家宸語其女友者。同時偵探隊亦有嫌疑密報。壽松忿甚，命人先殺之。家宸自知危險，求黃乃裳帶其往見壽松，力自辨白，乃裳復從中疏解。壽松意已釋，尚未及收回命令，而家宸于歸途適遇執行者，為所刺殺。蔣筠字子尊，同盟會會員，不知其由何處加入，曾一度在福州作政治運動，組織愛國社，組織拔丁會，得社會上重視。後公立法政學堂成立，入任要職，遂停鑼煞鼓，不再作政治運動。及光復後，畀以縣長，不滿所欲，自負才力，憤怨

不平。知政权掌于寿松，而寿松粗暴，不为人所附，而孙、彭交恶，易于推翻，于是到处演講，肆意攻击，且挑拨閩湘感情，含有排外意旨。寿松左右湘人尽憤，慫恿暗杀之，蔣遂为陈西瓜刺杀于玉山澗河乾。

苏眇公案：某报蓄意攻击寿松，冷嘲热諷，吹毛求疵，甚至无風起浪，塗脂抹粉。及苏眇公主笔政，尤其凌厉猛烈。寿松憤不能堪，乃封閉該报，並逮眇公审讯，責打屁股。

蔣、黄暗杀案發生，激起京沪同乡憤慨，非驅逐寿松不可。苏事發生，並引起京沪报界不平。

任馬絳生之錯誤：寿松錯誤由引用馬絳生在幕后始。馬絳生者，安徽人，奸佞巧詐。清时以道員在閩候补，費緣任鑄幣厂长，以舞弊被劾。清廷派陈璧来閩查办，置之于獄。光复释出，寿松以为能，引置左右，一切规划均出其手。寿松虽参加革命，而其本質固驕恣貪戾，得絳生逢迎，专橫益甚。及政运将末，寿松知为众所不容，聞中山先生在沪，亲往迎迓来閩，冀移轉一般人觀念，並得广东及各省同志声援，維持其命运，然而噬臍无及矣。

岑春煊来閩：京沪同乡非去寿松不可，北京同乡集会討論时，陈衍稍为寿松辯护数語，几遭毆打。遂由刘冠雄轉陈袁世凱派岑春煊以鎮撫名义来閩，迫逐寿松。寿松曾为春煊屬員，春煊至，駐馬江，不进城，遣人諭寿松离閩。寿松虽欲抵抗，而能为效力者无几，同志均劝其暫行息肩。陈子范知孙道仁不可靠，寿松一去，福建革命势力随失，即由沪赶回，劝抗拒，后知势不可，乃太息而去。福州各界有力人士，慮寿松蛮幹，糜爛地方，且計寿松生活尚薄，难以成行，建議商会筹十万元贖之，寿松乃往香港。行之日，身自披彩，各界組織仪仗，欢送至馬江。岑春煊旋

亦离閩。不久，袁世凱任命張元奇為福建民政長，革命政權遂移于官僚與後來軍閥之手。

鎮撫之余波：蔣、黃案在上海喧闐時，林斯琛謂蔣、黃有取死之道。在滬鄉人忿斯琛為彭壽松辯解，乃故為變易斯琛原語，謂斯琛認為蔣、黃“死有余辜”，用以激怒一般鄉人，且指斯琛為參加暗殺者。壽松去后，遣鄭得元等代表蔣、黃家屬向法院告訴。首席檢察官丘某（似名得士）極力羅織，提起公訴，逮押斯琛于看守所。林森主張請上海律師許作屏來閩辯護，法院以現行法未有律師制度，拒其請，乃推劉通、黃光弼為辯護人。承辦審判官亦從各方面了解其非突，予以無罪判決。丘殊不滿，提起上訴，以逾上訴法定期間被駁，案得結束。

尾 聲

翌年即公元一九一三年七月，方聲濤、林虎在湖口獨立，通電各省。劉通、黃光弼等與許崇智謀脅迫孫道仁通電響應。許崇智部署甫就，將取道上游入江西，而湖口已失敗。許遁去，孫道仁電袁世凱請罪，袁復電溫慰。越兩月余，國務院電令密逮鄭祖蔭、劉通、黃展云、嚴漢民數人，各附以罪名，劉則被指為著匪。時鄭祖蔭任都督府軍法課課員，即就逮。劉通任都督府民政秘書，是日適未進府，及晚回家，聞孫派人請，即進府，晤祖蔭，得知國務院電令。劉通逕出府，擬分告展云、漢民。比到家，展云已逮捕。急赴丙午俱樂部遣告漢民，漢民已不在閩。林前銘邀劉通匿其家。林炳璋及軍法課課長沈珂為祖蔭辯白，孫為疏解，並及劉通。孫因據電國務院，得無事。涉冬，劉冠雄率李厚基一旅入閩，孫道仁旋調赴京。革命遺燼，至是亦熄。

附 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名單

主任委員：范文瀾

副主任委員：李根源
顧頡剛

委 員：王伯祥
叶恭綽
刘道衡
李祖蔭
陈修和
何干之
罗任一
浦熙修
章士釗
戴 濤

王世英

王家楨
向 达
米暫沉
李培基
吳研因
齐燕銘
罗隆基
翁文灝
章伯鈞
楚溪春

楊东蓀

邓哲熙
刘大年
邢贊亭
陈 达
吳晋航
郑洞国
周亚衡
翁独健
覃異之
閻宝航

申伯純

叶景莘
刘 斐
李仲公
陈公培
呂振羽
邵循正
赵世兰
徐彬如
黃紹竑
戴正华